

自治的制度縱或限於至低限度，亦證明其對於兒童與青年的積極性與活動能力的發展是有用的。若遇學校有完善的設備，則這制度便可成爲蘇維埃的教育制度之值得注意的特點。在此事例中，這不僅增進兒童的活動能力，且甚至於教誨較幼的兒童，以使其成爲共產主義的訓練所欲造就的組織者與集體主義者。但亦可遇到各種個別的事例，覺得兒童的積極性不是啓發新社會的建設者，而是啓發此種煽動家而已。而教師則既受各班人數過多之苦，且又多每人必兼數班功課，以致不能實行其所必需的指導，於是自治便成爲純粹的幻想，並祇是幫助教師以厲行紀律而已，不然，則如革命初期的那樣放肆，使有效的學習絕無可能，並完全喪失其教育的價值。

往往吸收全體學童與學生參加自治活動的目的不能實際達到。時常自治在事實上祇限於一小部分活動的學生，此等學生或因此從純粹的求學的觀點上是最困苦的學生。於是選舉的位置多少是被一小集團的人永久保持着，這小集團真正地成爲一種官僚的團體，而發展官僚所特有的自負與高傲的癖性。這些事例是代表此種制度之失敗的另一例子。在學校或大學裏的自治之共產黨、共產青年團或兒童先鋒的領導權，時常要對這種發展負責。

當共產黨人討論到他們的教育方法時，他們時常反覆地說：「學校必須與實際生活發生最密切的聯繫」對於法庭、工廠或市場作時常的參觀，是求學工作的一部分，甚至在最低的小學班級裏亦是如此，對於各種革命紀念日的慶祝之參加，甚至較小的兒童亦望其能夠實行，雖在最近最低的兩個年級之從八歲到十歲的兒童得

免參加街上的遊行，而僅在校舍內舉行念紀會。兒童時常被指派去參加工人俱樂部或委員會的常會。年齡較長的兒童，可在附近的工廠、作坊或國家農場，以幫助推廣識字運動或設立看護所的方式，實際參加工作。至於高等技術學校與普通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則以幫助組織讀書室與俱樂部為建立此種聯繫的一種方法。鄉村的學校甚至能按此同樣的工作路線更容易地參加農村的的生活。以此等方法期望學校能成為社會生活中之有用的與積極的要素。兒童先鋒與共產青年團團員，有使整個學校或大學插足於其附近各地的日常生活之內的特殊任務。一般人相信兒童是免不了要與生活接觸的，且如果不採取積極的方法以建立這些聯繫，則其所接觸的必定是壞的方面，並具無組織的狀態。俱樂部與各種研究社是設在校內的，但是不在學校的正課以內，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運動，是組織這些聯繫的主要媒介。

蘇維埃教育制度的軸心，就是統一的勞動學校，並因此共產主義教育的基礎首先是勞動，勞動二字在蘇聯憲法上的意義，不祇是簡單的人工勞動，而是「一切生產的與社會有用的努力，治理家務亦包括在勞動的函義內。」以勞動為基礎，可信兒童長大起來對於現在將有一種特殊的認識與了解。勞動又可使兒童從其幼年時期起即能引入於人生之社會有用的勞動活動中。所以對於勞動的重視，不僅在研究勞動的過程與其組織的方法，而且要在每人的體力與心力依年齡大小而能做到的範圍內實際參加工作。這種參加必須是自覺的，且須有社會上的認識，並必定要能引起內心的推動力與熱情，此等推動力與熱情，能把校內對於種種美麗的事物之無情

感的研究，一變而為走上生活道路的方法的與各種自信心和想像力的鍛鍊——這是他們所解釋的。同時，其從事的方法又必須是充滿毅力、熱忱與革命的熱烈情感。

由共產黨人與各職工會的正式代表所組成的教育人民委員會之「國家科學參事會」於一九二三年最後決定的關於勞動學校低年級的確定的教學大綱，就是要實現上述關於學校的一般概念。這機關又統制一切用以實施這些大綱的教科書，並終於一九二七年重新編輯初等教育的教科書。這些大綱在理論上是要一切學校必須執行的，但可預料物質上的條件，將使此種新計劃不能完全應用，尤其是在鄉村區域。這些計劃顯然是實驗性質的；並邀各方人士對此種大綱之應用的可能性，作極廣泛的討論，且使此種討論繼續到數年之久。這已顯然的了，這種討論的結果，將使這些大綱有所修改，其中某些特點會即刻予以重大的更改。但是這些大綱亦必發生重要的影響，且其各種基本的原則，將繼續為共產黨在教育方面的政策之基礎。

「實事分類」教學法 (the complex method)，或設計教學法，是這些大綱的基礎；勞動學校的低年級，已廢除按科目分配的教學大綱。在革命前的初等學校裏，所採用的科目是於宗教的科目之後，按次序繼以通常的讀、寫、算的練習。直至一九二三年，這舊的教學大綱仍採用於大多數的學校中，祇把其首要的科目——宗教——廢除。現在課程的基礎，則是題目與問題。這些題目是由學童與教師於某一興趣點的範圍以內選擇出來的，這就是「實事分類」(complex)。對於「實事分類」的一個簡短的定義是：「從現實採取出來的許多事實，並以一

個確定的概念或題目爲中心，加以分類。」在蘇維埃的教授法上，實事分類必不可僅是興趣的中心，這必須是日常生活中活動的中心。讀、寫、與算的練習，則是實行這個設計的過程中所必需的。

勞動學校之正式的教學大綱，把學習的科目分成三大類。在刊印出來的教學大綱提要中，有三組平衡列出：第一組的名稱是「自然」，第二組是「勞動」，第三組是「社會」。第一年的學童研究一年的四季、家庭的日常工作，與家庭和學校的關係。在第二年級，則自然的研究，包括空氣、水、太陽、星球、與家畜；兒童所住居的鄉村或城市方面的日常工作亦提出研究；而且城市與鄉村的行政制度，亦爲兒童們所研究。至第三年級，「勞動」與「社會」二組，涉及經濟活動、行政制度，與本城市或本鄉村所在地的區域史。在第四年，即勞動學校初級的最後一年，蘇聯和其他各國的國民經濟，以及蘇聯的政府組織與其他各國的政府組織之比較，及人類過去生活的狀況，都是「勞動」與「社會」兩組的內容，並以在「自然」一組下關於地理與人體生理的研究爲基礎。

此後三年的教學大綱，條目更爲詳細，但其所根據的一般方針仍屬相同。爲勞動學校第六年級，即爲十四歲的學童用的第三組關於「社會」的題目中，其教學大綱定出如下的學習題綱要：

工人與資本家。工資勞動與資本。私有財產與勞動。工人階級的狀況。地主與資本家的聯盟。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的共和獨裁制。資本主義。競爭。生產的混亂現象。勞動與資本間的鬭爭。英國的憲章運動。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者宣言表示工人階級的意志。工人的國際協會。第一國際。工人奪取政權的企圖。巴黎公社。第二國際。藉

罷工來鬪爭。職工會。各種政黨。俄國的資本主義。封建的殘餘。君主政體。在一九〇五年與在一九一七年的鬪爭。這關於一個特殊年級適用的正式教學大綱的提要，足以表示這班學童按其計劃所學到的是那一種材料。相信這種方法能藉有系統的觀察、搜集事實、利用書本、陳列館等等，以養成與發展自動工作的、勞動的、科學研究的習慣。這種教育方法的目的，特別是在發展兒童在政治與行政團體裏工作的習慣，而此等習慣又藉參加上述的各種大會與藉個人的與集體的執行某些社會任務，而得進一步的增進。各種研究社、團體、合作社、俱樂部、參觀的組織，與在各種紀念會及在壁報的出版上的參加，都是補充在這些教學大綱下的工作之學校的活動。

關於設計教學法的實際工作的例子，在此不能詳細舉出討論。有一次看到一羣學童作鄉村的調查，其結果以文字的形式寫出，並廣收每個兒童所供給的材料，這報告讀起來極饒興趣，且同時具有很實際的價值。我們應注意：例如在研究「你的家」一類的題目中，唯物主義的觀點是很重視的。一個教師報告道：「母牛」這題目引起許多業戶更注意母牛的養畜，因此便可得到社會有用的工作。對於這種教學法之最嚴重的批評，是說這方法不能給兒童以讀、寫和算的真實訓練。這些訓練原是希望其能為研究這題目的一部分工作。因為這些訓練被置於次要的地位，所以就時常加以忽視。革除根據這些訓練的舊的教學大綱之訓令，太被許多教師執行得呆板了。設備的不足，各班人數的過多，初級小學之四年課程，在鄉村學校中因到課的不經常，實際的學習時間不過兩年的縮減；與最後教師因這新的教育方法所負擔過重，均使此種教學法不能在實際的事實上完全應用。當

一九二六年各高等教育機關重新採用入學試驗時，很多的投考者於俄文及數學兩科之不及格，明顯地表示這新的教學大綱至少在其所實施的環境中是有弱點的。最後，祇須注意一個最普通的事實：許多教師雖或對此新的教學法是極表同情的，但不能在事實上來應用。因為教師要一人兼管幾班的功課，並有時每天要上八小時課，所以他就沒有能力來指導按題目的研究。

凡遇新的教學大綱與新的教學法能多少美滿實行的地方，其學童似能非常自立並甚至是積極自動的。他人走進教室裏，並不使其學習的工作中斷，而且當被問到的時候，兒童們都很熱烈地談論與解釋他們的工作。他們對於目前政治問題饒有興趣，以這樣年齡的兒童能有如此表現，使作者覺得這幾乎是反常的事情。兒童在街上與在革命紀念日的慶祝會中，表顯上述的一種積極性，誠與革命前在俄國所看到的情形大不相同。但亦有一個劣點，即在他們的面容上與在他們的問題和評語中表示過於嚴重。一種溫和形式的「流氓主義」亦常在兒童與青年中發現。

適用於正式的教學大綱的各種教科書的編輯，是受對此教學大綱負責的機關之統制，或至少受其指導。在最近幾年來對於各種教科書的供給大加擴充，前此教科書供給的不足，實是一種錯誤。藉這些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原則與適合於蘇維埃政策的教科書之助，教師們能給學童以適當的指示。這些教科書的編者通常是共產黨黨員，而且為這些蘇維埃小學生讀的選文，都要以給予共產主義的訓練為主。幾乎在兒童讀本之最初的幾頁，即

以列寧的生活與工作向兒童介紹；勞動的過程亦在前列的幾章中提出討論。這些教科書之一般的内容與着重點，都與教學大綱所定的相同。這些書都是按勞動學校的各年級與等級分別程度深淺來編定的。至於技術學校與高等學校用的教科書，後來將予以論述。

國家科學局所定的教學大綱，雖適用於四年制的及七年制的勞動學校的整個學程，但不能適用於九年制學程之最後兩年。這最後的兩年是在不久前加上的，要在特殊的職業部門上給以職業的訓練，並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教學大綱。對於工廠學校，農民青年的學校，與特殊的工人學校，都同樣各有其特殊的教學大綱，在此按科目的課程編制仍予採用。在高等技術的與普通的教育機關，其教學大綱亦按科目來編定。在一切這些教學大綱中，「社會的研究」是各種科目之一，並把蘇維埃課程中之歷史科與公民科編入這科目之下。研究此等科目的鐘點定出非常之多；在大學中一種社會科學的最低限度是必修的，甚至在科學的專門學校裏亦是如此。在這裏可把維護這種社會科學的最低限度之行於高等技術學校的論據，作一扼要的敘述；這些論據同時可以解釋公民科之在低級技術學校所得的地位。在大部分以社會化的大規模工業為基礎的新社會的建設條件中，專門家或技術專家必須在其四周的與正在按新路線建設的社會裏所進行的一切事情中，能明顯地站定自己的立場。國家的社會活動，是在蘇維埃體制中的工程師、醫師、農業專家等等所不可避免的。這些技術專家必須使之能握到了解一般的社會勢力與蘇聯特有的社會勢力之關鍵。了解現在所進行的一切事情的門徑，即在對於這些社會勢

力的研究，利用科學分析之已著成效的各種方法，並把這種分析所得的結論運用到實際的生活上。這種方法就是「馬克斯·列寧的方法。」若沒有這種方法，做醫生的就祇能是其本行的一個狹小的專門家，並不是現在蘇聯所進行的國家建設努力的一個自覺的參加者。無產階級的國家所需要的一種專門家，乃是具有下列知識的人：

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發展史與工農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鬪爭史，領導這鬪爭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勞動階級武裝信條的原理，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現時代，蘇聯無產階級與其政黨之政府的與經濟的建設之成功的理論與實施。

這個長的引語可作為「社會的研究」之課程內容的簡短綱要，施行於高級的中等學校與技術學校以及高等的教育機關。

對於年齡較輕的學生，社會科學各種功課的目的，是在乎把現今的條件與各種問題引用到學校的工作裏，並同時給他們以一種「社會的科學的發展」，使他們認識社會生活的法則，且幫助他們成為新生活的建設者。其前途既具有如此實際的目的，則要在所限定的時間範圍內，對歷史與社會的研究定出有系統的課程實為不可能。共產黨人說，從前的學校以犧牲現在為其勾心鬪角的政策；他們自認是犧牲過去的，因為在發展革命鬪爭的觀點上看來，現在比較重要些。為要示明現在的文化是人類歷史上所有一切之最後成績起見，教科書與教學

大綱均把原始的及此後各時期的文化提出來與現在的文化比較。但其所着重的必須是下列的一類題目：工業革命、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兩種社會，或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東方、古代希臘、羅馬帝國、中世紀、改良政策、人道主義、基甫時期的俄羅斯與新城市的俄羅斯——這一切題目除了為舉例與顯示的材料外，都必須略過去。在大學裏特殊的歷史工作中，這些題目將提出來研究，或者個人得按其將來的文化興趣選擇這些題目之中一來研究。

為這些課程所編的教科書，都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編著的。這類教科書中通行最廣的一書，是瓦爾扶松所著的「社會研究概要」(M. Volfson, Outline of the Study of Society)，這本書的序言寫道：

本書的目的是在馬克斯主義的見解上說明社會，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的定律，及其在衝突與運動中的內在的勢力之一般的觀念；並使讀者了解勞動者的社會，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得到解放的道路。

這位著者又加上說：「如果此書能供給後進的青年以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的武器，則著者甚為欣幸，這些後進的青年正要代替老的戰士，並親密地參加於新世界的建設中。」假如為篇幅所允許，可扼述這本書的精華，以示明這著者如何把歷史的與現在的事實呈於吾人目前以達其目的：這是頗饒興趣的。這本書的第一句說：「人與其他一切生物一樣，都從其周圍的自然界得到每件東西。」在第十七頁則把階級鬭爭的問題寫出來；並且第一章的結語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要素」上指出階級鬭爭的不可避免。第三章述「經濟形式

與社會關係的歷史。」其末後的一段是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論「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一章中有下列的語句：「全世界的工人已在過去與現在努力爭取無產階級的獨裁，祇在蘇聯是例外，該處無產階級革命已把政權轉移到勞動者的手中了。」一句結語寫道：「所以，無產階級的目的是共產主義；其方法則為階級鬭爭，資本主義秩序的毀壞，並以無產階級獨裁為過渡時期的方法。」這些引語是從這本書的第十版引錄出來的，且該版印行達五萬分。這本書共有三百五十頁，售價低廉，祇定價六角。

在職業的訓練中，造就一種具有多方知識的工作人員之目的，使技術的熟練受着犧牲。例如電機工程的功課有六十種科目要研究。其理想為一個工程師應訓練為不僅懂得一種專門技能，並因此對於生產的各種較廣泛的問題須有更好的了解。近來已有一種趨勢，懷疑此種方法是否聰明，要減少科目的數目以及分配於公民科的鐘點。高等學校的學生功課的負擔很重。最近曾有一次問答的調查，表示工作時間太長，睡眠的時間太短，健身的運動時間很難得到，而在公眾的與公民的工作時間則很多。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很壞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每月用費大約從十金元至十五金元。在關於這次問答調查所發見的學生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條件的討論中，最普通的意見是：對於學習太注意了是反動的；認為學生應「養成建設工作的熱情」，或如一個發言人所說的，「在每一細小的事情中尋求世界革命。」

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學校與大學的學童及學生，都使之與環境的生活接觸，並以種種方法使之與「生產」

發生關係。許多年齡較大的學生已是職工會的會員，並有許多人是共產青年團團員或黨員，且以其均爲此等組織的成員，故希望他們能負起並完成一定的公民任務。工人學校裏的學生，在其學習的幾年中有從事於某種公民活動的義務，特別是在放假的期間，他們須在假期回到其所選派的團體，並作報告。工廠學校的學童，希望其能參加工廠的公民生活，他們同時以學徒的資格在廠中做工。農民青年學校的學生，是鄉村社會中選擇出來的並在政治上積極的青年分子，且希望他們對於鄉村讀書室的工作有所貢獻，讀書室是農村中的政治教育與活動的中心。高等技術專門學校與大學的學生則有某種限量的公民活動必須執行。這種服務的工作可在掃除文盲的中區，在扶護社的活動中，或在校中的俱樂部所組織的各種研究社的活動中來執行。這些學生對於生產的接觸，則藉按其學習的方針參加實際的生產工作，以補充其書本上的學習之正式的必需工作來達到。在夏季的幾個月，許多學生都到工廠或機關裏實習。但是這種理想之實際的應用，不是完全成功的；雙方都有訴苦，在學生方面覺得不能得到真正的訓練，而在工廠或機關的管理人員，則厭惡這些派來實習的學徒滋擾與浪費。公民活動與實習的工作，常是機械式的與虛擲光陰的。

工廠學校似或可以最完善地表現蘇維埃制度所產生的新式學校的理想。這些學校的校址，都設在工廠或生產的企業之內或附近，而且職工會也參預指導與維護這些學校。共產青年團是這種學校的發起人之一，並繼續與之發生親近的與正式的關係。學童與較老成的工人同道工作並共同生活，因此得經常地在無產階級的影

響之下。在工人俱樂部裏，這些學童助其活動；有一次，看到某處的學童並無自己的俱樂部設在校中，而祇利用附近的工人俱樂部，以爲他們的研究社與其他活動的根據地。這些學校的數目雖比較上仍屬有限，但是他們的發展與他種學校比較卻是最快的。與此類似的農民青年學校也同樣地顯示學校與實際的生產及與一般的社會環境所發生的不斷的接觸，但因鄉村社會中的地理條件與一般的文化條件不同，接觸的程度較差。

蘇維埃的教育制度在此都是當作一個單位來討論。但是，我們已經指出：教育是在蘇聯各民族共和國自成一個分立的，雖是彼此聯絡的，人民委員會的各種體系之一。蘇維埃的教育制度之一個特點，就是以當地的語言爲校中授課的語言。蘇聯的俄羅斯單位對於自己所轄的自治的民族集團，特別注意於用各小民族的語言來編輯教科書。因爲本地人的教師尚未產生出來，俄人的教師須受特殊的訓練以在這些小民族的學校裏工作。因此，這些學校成爲發展較落後的民族集團之民族的覺悟的中心之一，而且這種民族的覺悟再加以推進，而爲走向政治覺悟的初階。對於沒有文字的幾種小民族的語言，已代爲創造文字的形式，此亦視如教育的準備工作；且當這種新文字寫成的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舉行公民的示威。在學校的教學大綱中定出區域的研究，此種研究的注重亦藉以喚起學童對於公衆事情的興趣，並由此再喚起其對於全社會的興趣。在另一方面，蘇維埃的學校及其教學大綱之推行於這些小民族的集團，是在集中的統制與統一的利益上來實施的。

「新式學校」的教師人才問題，是共產黨領袖們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最初的幾年間，許多教師，如果不是

抱積極的敵對態度，起碼是不大友善的。在另一方面，黨的組織不能空出許多工作人員以分配到教育的事業上。訓練出新輩的教師是頗費時日的。所以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與控制之下利用老教師。例如在鄉村區域中，此種對教師的控制，是由一個黨的委員會來執行，在城市裏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控制更易組織起來。教師都要加入職工會，而另一種施影響與控制的辦法即就此建立。在較大的學校中採用了定期的與常常舉行的會議，而對於較小的學校則按區召集會議，組織特殊的訓練班，以訓練與再訓練各教師。

在蘇維埃的學校裏，一切等級的教師僅約百分之三是黨員。在較重要的學校裏，教導主任或至少擔任「社會的研究」之各科的教師，通常是共產黨員。國家科學參事會的委員也是共產黨員，他們準備教學大綱，並審查與介紹這些學校適用的教科書。此外，又設立一個紅色教授學院，以迅速訓練高等教育機關裏教席之新的候補人員，此等教席尚須繼續利用在舊制度下訓練出來的專門家。這些老教授尚不能即刻被人取而代之。他們與一切教師一樣，必須受一種非正式的馬克斯主義的試驗合格。因為當局堅持着：革命已證明了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是唯一的合於科學的思想派別；所以一個教師不懂馬克斯主義，便要在學童或學生面前鬧笑話。

這些教師至少在形式上均已接受新的觀念與方法，這或是此等積極辦法的效果，又或許是時過境遷後普遍的改頭換面之一部分。他們在一九二五年正月召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以此種態度表達於紀錄上。在這大會所通過的「宣言」中，教師們承認他們過去的錯誤，說那時候他們是「受民主與自由的口號所欺騙的」。

浪漫主義者，且以信仰各階級之民主的和諧，而成爲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不自覺的武器。」這宣言的結尾有許多通知語。其中有一段通知語是給「共產主義者的同志們，」其措辭是：「蘇聯的非黨員的人民的教師們給你們以熱烈的敬禮。在我們的全聯邦的代表大會上，我們敢對一切勞動者宣言：從今日以後，我們決不把自己的工作任務與共產黨的任務以及該黨創造新世界的偉大鬭爭分離。」這大會的代表又對其所代表的教師們作如下的通知語：「我們已執行了你們的志願。既往不咎。在我們面前有無限的前途，同時亦有多方的困難與負責的工作。可是從今以後，我們不是孤獨的了。我們正在與全世界的一切勞動者同道工作。我們是與他們富有經驗的領袖們同道；我們與共產黨攜手。」這宣言的另一段是給「世界各國的教師們，」其措辭爲：「蘇維埃的政府機關就是我們的機關。共產黨就是我們的黨，而且我們都信任它。我們與人民同道，與蘇維埃機關同道，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正在建設一種新生活，一種新式學校。」

在共產黨人方面對於非黨員的教師之態度，亦一變而爲對他們尊重新觀念取信任的態度。把教師們奪取過來，認爲是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偉大成績。在教育上行使這種領導的辦法已如上述。蘇聯的教師是受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所領導的。由教師的職工會機關與教育人民委員會及黨合作所出版的爲教師閱讀的報紙與雜誌，都在一般的新聞與教育生活及教育問題的討論中，給以共產主義的路線。在鄉村區域中的教師，則藉參加鄉村讀書室以引入政治的與公民的活動，鄉村讀書室在形式上是隸屬教育人民委員會，但在政治上是受共產黨與

共產青年團指導的。這種幫助地方的公民活動之必須執行的義務，相信其能在教師方面展開共產黨領袖們的教授法理論。因此，對於非黨員的教師，從共產主義的教授法又通常從黨的機關，並經過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經常施以一種壓力。這種壓力逼得在教育上與在其他一般的事業上，對於新的觀念與方法之實行，能作更大的努力。這種壓力同時又起控制教師及其活動的作用，這就採用了一種守護的成分，並有時在地方的條件下成爲一種檢查的形式。

舊統治的俄國教師在其對學童與學生灌輸某種政治觀念的努力中，曾受監視與嚴格的約束。甚至在這兩種制度表示有某種相似的特點時，要比較它們的上下是不容易的。但是，新式學校的教師與舊統治學校的教師比較，在其工作中顯然較爲積極與有濃厚的興趣。軼出此種一般的說法之外，若要對於蘇聯非黨員的教師或由共產主義的教授法所製定的教學大綱與教學方法所起的影響作一結論，未免太早。

共產黨與尤其是共產青年團及兒童先鋒，在給教育以共產主義訓練性質的綱領中所起的作用，在論「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與「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的各章中，即自第二至第四各章，已予論述。因爲上面所說的本身還是一種概要，所以讀者須再參考到這幾章。這可回想得到：在兒童先鋒的運動中，希望這運動的觀念將來會變成整個勞動學校的觀念。下一章將討論特殊的政治教育的機關，這些機關是爲過渡時期組織起來的，直待常態的學校建設網能達到全體兒童並能供給爲蘇維埃公民所必需的一切政治教育爲止。在教育人民委員

會的政治教育部之下的掃除文盲中心與鄉村讀書室；也是一時權宜的辦法；上蘇維埃的教育計劃的進展中，這些機關亦將完成其原來的意旨。

茲舉出幾個綱要以對這一很廣泛的題目之此種必需的扼要論述作一結論。一般地說來，蘇維埃的學校是革命的一部分；它不能站在革命的政治之外。教育是坦白地隸屬於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在每一革命的進展時期提給國家的活動綱領。現在的綱領就是：蘇聯發展爲工業化的國家。這種新的政治路線已經影響到教育政策，而且技術的訓練特予重視，不惜減弱普通的訓練。十月革命的勝利已在羣衆間引起更大的活動。這種活動是要利用之以加速經濟的進步，但此種進步必須循社會主義的路線進行。爲着上述的目的，必須有一種簇新的與特異的文化基礎，而且這新文化的基礎必須在青年中埋定。對這種工作，有一切方面的鼓勵。當學校不適合全體兒童的需求時，學校風潮都以滿意的口脛報告出來。羣衆也對於學校的此種性質感覺興趣，並相信大多數的工人與農民贊成這些新方法，是因爲他們看到從這種新式的學校產生積極的有用的勞動。據說，祇是富農對這種新式的學校表示抗議，說它不時常來教讀、寫算，並同時不把革命前舊式的鄉村學校所重視的宗教訓練包括在課程裏面。

一九二三年政府頒佈的教學大綱是試驗性質的；並經過數年的堅執採用後，纔於現在稍加變通。衆信對於一種固定的教學大綱之堅執在過去是必要的，藉此可以獲得按照新路線的發端，並與舊的方法、舊的思想決絕。

現在則可更注意於建立正式的紀律而不致危及學校的新目的。同時這些教學大綱已大加簡單化了。最後，又決定某些政治的題目，如世界大戰的經過或第三國際應從第一二年級延遲到第三四年級去研究。這些教學大綱所根據的一般原則，已由許多學校實施的結果證明是正確的。這是從第一時期的經驗之一般的調查結果所得的結論。因此，這些一般的原則，仍保持之以爲蘇維埃學校的教學方法的基礎，因爲「從這種教學大綱所得的總合，可革除唯心主義而造成唯物主義者。」社會的有用勞動可幫助兒童去了解其所學習的各科目間的關係。確定的與甚至形式上的習慣，雖都可灌注到兒童的身上，但此等方法可不致認爲是登峯造極的了。所以，在學校及其工作中常有頗多用意的佈置。例如，在數學的教科書中，習題可根據當代生活上的問題，如社會保險，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蘇聯城市與鄉村間的貿易，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備。

「有用意的佈置」一語，每當討論教育的與訓練的問題時常可遇到。所以，例如兒童的玩耍，必須導之使可在生物學上與社會上有用。藉這種方法，建設的努力與甚至有用的工作，將在兒童活動力的最初發展時即已具備。「讓兒童爲遊戲而遊戲」這句話被斥爲資產階級的口號，說資產階級害怕訓練羣衆，並尤其害怕訓練他們來克服困難。各種遊戲是要反映當代的生活，但當這積極的創造的羣衆的勢力之在當代的生活中，爲努力向着一定的目標進行的革命的勞動時，應加以指導與一種提選的手續。所以，蘇維埃的教授法必須把關於遊戲的環境的基本力量，納入有組織的有用的定規中。共產黨人自己預料到他們的敵對者將稱他們爲第五世紀毀滅

羅馬文化的梵德耳人 (Vandals) 剝奪兒童玩耍的娛樂，並以其殘暴的獨裁甚至侵略到兒童的遊戲領域。

共產黨人堅稱馬克斯主義的學說並不是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其目的首先是在解釋真實的生活；並因此與生活一樣的簡單。——他們堅持地說。因此，倘使選擇了妥善的解釋方式，便可把馬克斯主義甚至向十歲的兒童解釋。相信國家科學參事會的教學大綱，就能代表這種妥善的方式。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將使這些教學大綱所根據的實事分類制或設計制更易應用。調過來設計教學法的本身又使關於生活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有引入每一課書及甚至與學童每一次的討論中之可能，這種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不僅在社會的現象中，而且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均可得到例證。在教師尙未完全是馬克斯主義者的時候，必須用一種代替的方法，這代替的方法是普通由共產黨人來教授的「政治常識課」。馬克斯主義不是在「社會的研究」科目中的政治常識課；但政治常識課在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未普遍通行前必須採用，因為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必須成爲一個並唯一真實的科學方法；這是他們所解釋的。

注意馬克斯主義方法的結果，如受過蘇維埃教學大綱訓練的學童之試驗所表示的，已在有些共產黨領袖的心裏起了懷疑。學童或學生往往成了一種習慣，在他回答一切問題的開頭一句總是說：「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來。」在各問題的回答中之簡單的鸚鵡式的背誦公式，甚至不能不使最熱心的馬克斯主義者也要留着印象。關於問答方面，或可允許在此重述一個流行的故事，這故事最足以顯示學生學習應作何種答案，根據這故事，

一個「政治常識」的測驗題問道：如果遇到內部變亂要推翻蘇維埃的統治的事情，你個人應如何對付？若回答說，他要舉起武器來保護農工的政府，則這答案認為不能滿意；正確的答案應該是：這學生覺得不能造成這種局面。

下面幾句是從一個最著名的蘇維埃教授法的倡議者，關於此種教授法的評論中摘錄出來的，這或許可以總結本章所列論的大要。這些思想是在關於入學前的訓練之討論中發表的，並是代表從教育過程的最初階段所應有的目的。

我們正在訓練的未來蘇維埃的公民，必須是一種堅強的與健康的無產階級分子，是階級的與革命的戰士，是有科學意識的與有組織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者。他必須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全身武裝着必需的知識與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妙道的能力。他必需是在一切經濟的與社會的活動中是集體主義者，以堅決反對剝削者階級藉以建立其政權的私有財產與個人主義的目的。……未來的公民必須是一種具有自動組織的並能與他人共同組織的習慣之革命的積極分子。

以上幾句的作者於是提到其敵對者將大聲疾呼：這是企圖把這些特性灌注到兒童的機體中之最荒唐的梵德耳主義。但是他說這些特性是要以積極的努力在蘇維埃的兒童中發展起來，使這些兒童得從蘇維埃制度的學校，造就為辯證法的唯物主義者、集體主義者、組織主義者與革命的積極工作者。這表現理想的蘇維埃公民

的意識之四種術語的公式，可回想到，已在論蘇維埃的公民觀念一章中提及。在建立新式的蘇維埃勞動學校的一個最初的命令中，可看到下列的辭句：「學校的全部工作，必須以發展兒童的無產階級意識與合於此種意識的本能爲目的，以加重說明全體工人反對資本的團結爲目的，並以準備兒童爲將來作有用的生產的與社會的活動爲目的。」

各種學院與研究院設立起來，以進一步發揚蘇維埃的教授法之目的。在更嚴格的政治的與經濟的領域中，有「馬克斯與恩格斯學院」與「列寧學院」已如上述；這些學院同時以其廣遠的出版活動，亦影響到教育方法與教學大綱及教科書的編制。更特別的還有「共產主義學院」這是共產主義思想的理論中心；又有「青年共產主義訓練學院」以補其不足。我們又可看到一個「列寧格勒的馬克斯主義方法研究院」與「白俄羅斯的馬克斯主義歷史家學會」。在一九二八年初，召集了第一次全蘇聯的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科學研究院的代表會議，在該會議中報告並討論這些學院與研究院的工作及計劃。同時敦促說：辯證法的唯物論，必須在羣衆間宣傳與通俗化，使其成爲真正的力量；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切不可祇限於正式的團體，如共產主義學院的哲學組之類。「蘇維埃的百科全書」已出版十冊，在第三冊中的一切文章，據其序言所說，都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討論他們的題目；且這些文章都是爲受過中等教育的讀者而寫的，因爲正如一個作者最近扼述時常反覆應用的辭句說道：「馬克斯主義不是一種黨的信條；這是了解一切社會現象之最客觀的科學的與周密的方法。」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召集了第一次「教養學大會」(Pedagogical Congress)。克魯潑斯卡爺對「教養學」(Pedology)下一定義說：這是新的科學，研究兒童人格的形成與發展的定律，與「舊的」心理學根本不同。她解釋說，後者絕妙地適合於唯心主義，而教養學則主要是唯物主義的。在大會中有二千以上的代表出席，代表一切的科學派別。在黨的正式機關報上說：這次重要的大會之結果，將使教養學成爲日常教授法實施的一部分。前此無計劃的教授法研究就告終止，而「對這問題的研究之有組織的規定與系統化，就得全聯邦的委員會之介紹予以實行。」又稱：這次大會明顯地表示：無馬克斯主義的綱領，便不能進行蘇維埃的教授法。在這大會的最後一次集會中，布哈林做了一個長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對教授工作人員解釋如何把辯證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應用到他們的材料中。因爲這次大會的工作，據說是把革命的十年中所搜集的關於研究人事的一切材料已列舉精華，所以提到大會的材料，不是限於祇關兒童的那些較狹小的特殊問題。克魯潑斯卡爺在第一次教養學大會的討論中之另一番話，則指出：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揭穿教授法的階級性，並示明在革命的過渡時期教授法的特點應該是什麼，以此它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又說：在蘇維埃政府存在的十年中，雖在蘇聯已做了許多工作以推廣馬克斯主義的教授法，但最近數年來已示明在教授與訓練的方法上，尚需要一個完全的革命，纔能達到馬克斯主義的蘇維埃的教授法之目的。因爲她看到許多「舊的、老朽的」方法，尚留在蘇維埃的學校中，雖然同時也有「一些新的萌芽。」

第十三章 蘇聯的政治教育機關

「波立不羅斯維」(Politprosve)一字，就是現時用以指稱本章將予討論的各種機關的工作之簡字；這字就是「政治教育工作」的縮寫。或者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或者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鼓動宣傳部，凡指導這種工作時，都時常彼此合作。在每一省、區與鄉中，都有一個地方的「波立不羅斯維」或政治教育部。「亞極不羅」(Agitprop)，即黨的中央委員會鼓動宣傳部，也有其省的、區的與細胞的地方屬部。一切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委員會都有其關於政治教育的分部或分委員會，與職工會團體的文化組一樣。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都使之參加這種工作，以為其本身活動之一部，且須經過黨的作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社會訓練部及其地方的代表，都處處與政治教育部密切合作。鄉的政治教育部的組織把教育工作中的多種成分都聚集在一處。這種組織是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地方機關；但是地方蘇維埃、職工會的地方委員會、地方合作社、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鄉細胞，與鄉村社會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如學校教師、農業專家與醫生，都以咨議的性質包括在內，各受其自身的上級機關之訓令以盡一切的可能來幫助政治教育的工作。鄉村讀書室(izbachialnia)這名詞有時譯為「農民讀書舍」)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鄉村讀書室的主任(izbach)是由鄉政治教育部得地方的黨細胞之同意而

任命的。列寧曾在第一次政治教育工作人員的代表大會上說：「我們將堅主在政治教育的工作上，公開承認黨的領導權。」

政治教育部是從以前的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校外教育部蛻化出來的。因為在成年人間的一切文化的與教育的的工作，都認為必須具有政治的性質，所以決定改變這一部的名稱，並擴充其範圍。黨內工作任務之一，就是對黨員作政治教育。這同時是共產青年團的一個目的，所以這兩種組織在政治教育工作上的合作，是合於邏輯的。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在一切政治活動的場合中，必須行使其領導權，並厲行黨的政治路線。所以訓練黨員的指導責任，就託付於黨的鼓動宣傳部，而且這是黨的組織裏最重要的一部。黨的政治教育工作狀況，都定期地按區、省與民族共和國，在各代表大會上收集起來；而全蘇聯的代表大會，則對這工作給以統一的指導。

在這兩個機關之下，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機關。掃除文盲的各中心，亦應歸入這一類機關裏面，現在即將予以說明。鄉村讀書室是在鄉村區域中之政治教育的中心。「政治常識」的學校分成幾個等級，這是政治教育的觀念之最完備的表現。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之代表會議，在其各種功用中，亦有對婦女們起政治教育的學校之作用。其次則有蘇維埃黨校，共產主義大學，政治教育的共產主義學院，這些機關都是訓練政治的領導人才與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員。在莫斯科還有「東方共產主義大學」與「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學」。在軍事人民委員會的一個特別部門之下，但與這兩種公民的團體合作的，又有紅軍中的政治訓練班，這種機關最努力地與

最完美地執行有組織的工作，爲政治教育部之任何機關所不及。這裏的教學大綱中定出固定的課程表與授課時間以及所謂「校外的活動」。至於俱樂部、工廠委員會、教育機關的政治常識研究社，則已經在前幾章中說過了；但這些研究社，尚須在此再加申述，因爲它們是補充其較正式的政治教育機關的工作。

掃除文盲，認爲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列寧曾說過：不識字，就不能完全了解政治的事變，並因此不能在政治的活動中作有效的參加。倘若工人或農民不能讀他們在遊行時所舉的旗幟，則甚至他們的口號也不能發生完全的效果。當新穎的與特殊的活動態度與種類定爲政治領袖們的目的時，則閱讀爲建立這些態度而印發的材料與增進所期望的活動之能力，便是這運動成功的要素。促進識字運動的中心一向是，而且現在正是，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之下所特別注意的，因爲這些中心機關的作用是：當初等學校還不能容納全體學齡兒童時，成爲恰能阻止不識字者人數的增加之堤壩。他們的工作範圍已在討論與此點有關的公民的與其他組織時述其概要。此處祇須提出兩件事。第一，用於這種工作的主要材料常是政治性質的，所以受此教育的較年長的人，一面教之讀與寫，而同時又可使之成爲更覺悟的與活動的公民。第二，在小民族中的掃除文盲運動，使對於各民族的語言更加注重，這種民族的語言，是在這些較落後的蘇維埃公民中，用以喚醒民衆意識的工具之一種。

掃除文盲的中心，祇是代表在成年人中施行校外的教育工作。在各大城市中，正在設立半識字者的學校，成

年人的高級學校，與最後的工人大學，都在夜晚與星期日上課。最近在莫斯科正在提議與討論，開辦一個農民大學。這些機關首先須有一般的教育綱領；但在一切這些機關裏，學科的分配特別注重社會科學。在所稱的「社會政治與文學」的科目之下，於成年人的高級學校之教學大綱中，列出下列的科目表：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社會形式發展史，西歐與俄國的階級鬭爭史，共產黨史，第一、第二與赤色國際史（赤色國際包括職工國際、共產青年國際、農民國際、共產國際），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與文學。有一種畫報月刊出版，定名為「打倒文盲」；這刊物中從頭到尾登載許多畫片與圖表，使關於政治的與經濟的題目之淺近的文章，得寫給正開始懂得閱讀技術的人們看。

最近開辦一種臨時的特種學校，以在青年間掃除文盲。這些學校的目的，是教育那些在最近數年來或因缺少房屋或因家庭經濟遇到困難，以致不能進入勞動學校的青年。這些學校都是一年畢業的，在鄉村區域與城市均有設立。通常學校的房屋與教師，都在夜間利用之。其所注重的是在政治的與職工運動的訓練，因為全體這些青年都已學過讀與寫，且有許多人已踏入工資勞動者的積極生活。有些人可藉此升入通常的學校，但是一般地說來，這些學校的目的，是在準備這些青年使其能自動工作。這裏題目與材料的選擇，亦以給予那些不久將成完全公民的人以某些政治教育的成分。通常學校所用的設計教學法，亦在這些特種學校裏應用。第一個問題就是「十月革命」，並在其週年紀念的兩星期前，這些青年就來研究這革命的原理。第二個題目是「蘇聯與其他各

國。」第三個題目是「列寧」並爲正月間列寧紀念日的準備。二月間的紅軍紀念日成爲其次的題目基礎。在三月間則是「勞動婦女節」五一紀念日，則爲下一次研究的目標與題目。政治教育工作在這些學校裏特別注重，以提起這班因環境的壓迫，沒有入過通常的學校，且因其年齡與經驗的關係，對通常學校的初步課程不適宜的學童們之興趣。有些自然科學與生理的知識，亦擠入這些學校之必須的緊縮的教學大綱中。上面所說的工人大學與農民大學祇在最近纔肇始的，尙不能予以特別的描寫，但知工人大學所注重的是「職工運動常識」，農民大學所注重的是「合作社常識」，這都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在大工業與城市的社會中，在工廠與俱樂部裏有無數的中心機關，政治教育部得藉此以教育工人與勞動的知識分子。在鄉村的社會中必須建立這樣的中心機關，而這就是鄉村讀書室 (izbachnitsia)。有時整座房子（卽一座小的農民屋舍）撥出專爲建設這種機關之用。時常其他機關的一間房子（如合作社）就是這種工作可能的大本營。在較小的鄉村，祇有於合作商店、鄉村學校或蘇維埃辦事處內設一「紅色處」 (red corner)。這裏所用的「鄉村讀書室」 (village reading-room) 一語是從俄文譯出來的，似乎比較常在其他論述蘇聯的書籍中所看見的「鄉村圖書館」 (village library) 或甚至「鄉村讀書舍」 (village reading-hut) 一類譯語，較爲切近事實的情狀。一個設備完善的讀書室，將有其常任的主任 (izbach) 小圖書館與定期的小刊物之成立，都是以讀書室的名稱來命名的。這會是讀書室之首要的與主要的活動。後來開展一種按有系統的計劃之

團體的與高聲朗誦的讀報工作。這種讀書室不久又開始組織新聞股。共產青年團廣佈於鄉村區域中，因之讀書室成爲他們的組織根據地；在事實上，共產青年負有幫助與指導這種政治教育中心機關的工作之特殊任務的職責。壁報、列寧紀念處、各種研究社，尤其是戲劇研究社，都在這中心機關的周圍與內部滋長起來。革命紀念日的慶祝，常常由讀書室來組織。工人對於某一鄉村的扶護社，即以讀書室爲其實施扶助與影響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鄉村讀書室便是鄉村的俱樂部。對讀書室的主任，現正特別加以注意。

共產青年團對於其對讀書室所負的特殊任務，時常祇作字面上的了解，派一個團員去做讀書室主任，便可了事。不久，發現了這一年輕的領導者，對於年長的農民不能有何權威。同時，共產青年團時常有一種趨勢，要獨佔讀書室爲其正式與非正式集會之所，以致年長的農民未曾享用過讀書室。有一次作者要求參觀鄉村讀書室，引起了一個農民與一個共產黨員的談論，在這談論中露出此地所說的事實。年長的農民回答說：這機關已僥倖停閉了，因爲它祇供少年人多作胡鬧，而對於他卻毫無實際的用處。這個共產黨人不得不承認說：因爲年長的農民們並不覺得這讀書室對他們有何利益，所以覺得還是停止了好些。但在最近數年來，各鄉村已爲政治教育部的組織與擴充的特殊對象。這就是說：對讀書室的領導與設備更加注意，與更受上述政治教育部的控制。

一九二六年所有鄉村讀書室的數目共約四萬。有些祇是紅色處，在這裏可以找到報紙與小冊來閱讀。在作者參觀一羣鄉村時，曾在較大的村莊裏看見極平凡的讀書室；而在其他的村莊中則看不見這種機關的痕跡，到

了一九二八年初，據一般估計，因為繼續發展的結果，這種平凡的政治教育的中心，已達蘇聯的俄羅斯單位的鄉村數目約五分之一。有些讀書室設有經常的圖書館，而其他讀書室則由其所稱的「流通圖書館」來服務。

政治常識的學校是政治教育之最特異的與確定的機關。「政治常識」(politgramota 或 political grammar) 一語，已在論述普通教育與其他各種機關時用過。這裏有其學校與研究社的整個工作綱，這些機關都是按照有系統的計劃組織起來，且有固定的研究大綱。這種學校主要的目的是為訓練黨員與青年團員的，但所招收的學生約有百分之十五是非黨員，莫斯科及其省內的轄地有政治常識學校的最大工作綱。這裏所有的學校種類，在理論上是通行於全蘇聯各地的，但在較邊遠與落後的省分裏，還沒有遍設種類與學級齊備的學校。下面的實施辦法，是截至一九二七年五月止為這些學校所通行的，從那時候起已有某些變更，現在亦將予以敘述。黨的一切候補黨員，必受過政治常識學校的「縮減了的」教學大綱之教育。但亦可以通常學校的相當教育或自修的工作來代替此等必修的學程。每個黨員都按其工作的條件，實際上派到適當的學校去學習。政治教育的高級機關是否要進去學習，由各黨員自願，但在這些機關畢業以後，能提升其在黨的工作與在蘇維埃、職工會及其他的活動。由此可知其目的，是在於使全體黨員都能受過一二種政治常識學校的教育。在城市中心區域裏已得到很廣遠的成績。在鄉村區域裏，困難較多，特別是因彼此地方相距太遠了。鄉村的學校，有常駐的與移動的兩種，都在冬季的三個月中間開辦，每星期上課三次；但是黨員時常必須走許多路到遠處的學校上課。較小的鄉村黨組

胞與孤立的黨員還不能有機會入學。有些訓練班在一特殊的代表大會中組織起來，上課時間在兩星期以上。個人的與團體的自修，亦已在城市中開始組織，且爲散居各鄉區的共產黨人成立此種自修的組織。

在鄉村區域裏，政治常識的學校，希望其能有迅速的政治影響。例如，該處的黨員須在蘇維埃的選舉中，使民衆更爲活躍與更有自覺性。更特別的，是在學校中的討論，藉黨的上級機關所派的指導員之幫助，希望其能給地方共產黨細胞的工作更有生氣。黨員中較年輕的分子，得經過與借助其在校中的工作，以糾正黨部裏較年長的肆無忌憚的官僚所行的黨細胞的路線。

學習的大綱按照學校的等級而異。最簡短的大綱是在鄉村從一個中心區移動到另一中心區的移動學校所用的大綱。在這大綱裏共有十五次「談話」的功課，每次時間爲兩小時。所討論的題目如下：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與在蘇聯的工業與農業；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及蘇維埃政府；新經濟政策的要義；國有的工業與其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裏的作用；在農民中各階級，與黨對於這些不同階級的政策；合作社與鄉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兩堂課）；黨在現階段工作的主要任務；黨與鄉村蘇維埃（兩堂課）；共產青年團與其在鄉村的工作；在反對沙皇專制的鬪爭中之共產黨、工人與農民；在二月與十月革命中的共產黨、工人與農民；在國內戰爭終了時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共產黨、工人與農民；以及蘇聯在現時代的作用，與世界革命的前途。在鄉村常駐的學校裏共有二十二次功課，增加下列幾個題目：蘇聯與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一九〇五年革命前與革命中的農民，工人階級，及

其政黨（三堂課）自一九〇五年到帝國主義戰爭。在較長的課程中，還有幾種題目都在兩堂課以上。

在城市裏政治常識的短期學校，共有十五次功課，研究下列題目：黨的建設與共產黨員必須執行的義務；共產黨是工人的黨；黨與職工會；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獨裁；黨的經濟政策原理；國有工業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國有的工業與農民的農業之聯合，是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成功的保障；鄉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準備無產階級來幹第一次革命時（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反對機會主義的鬪爭；兩次革命間的布爾塞維克主義與機會主義；黨與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與保障其勝利的鬪爭；「十月」以後布爾塞維克護黨的鬪爭；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與世界革命。在普通的城市學校裏，共有二十四次上課，加上下列幾種研究的題目：資產階級的獨裁與無產階級的獨裁（兩堂課）；資本主義的工業與我們國有的工業之特點；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我們人民的經濟之趨勢；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資本主義，與工人階級的政黨之誕生；蘇維埃政府之財政的與租稅的政策；新經濟政策與職工會；共產黨的策略；黨的組織原理。又因在一種較長的大綱之下，還有作更詳盡的研究之可能，有些別的題目，分成兩類補充上去。

政治常識的普通城市學校所用的教學大綱，以較完善的形式刊印出來，把每個題目的討論中所應舉出的重要點都扼要指出。在每一「談話」的末尾都提出問題，並希望學生能來回答。倘為篇幅所允許，可把每次討論所應扼要指出的要點在此述出，這未始不是饒有趣味的事情；因為這些要點的本身已是概要，所以不能從這些

要點再作概要。這種概要，在此可舉出一個特別與本書的題旨有關係的一個例子：這是關於蘇維埃政府機構的討論，這一課的概要之第一節就是：

這與資本主義的國家相反的，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工人與農民「因政府借助於各種方法與妙計，使其不能參加政治的生活，並不能利用民主的權利與自由，在蘇維埃的國家裏這些羣衆都導入經常的，無人反對的，並且有效的參加國家之民主的管理」（列寧）。這些羣衆之革命的建設工作，祇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領導之下，纔導至與能夠導至共產主義。因此，蘇聯的無產階級藉「全聯邦共產黨」以執行其獨裁與對於蘇聯全體勞動者的領導。

對於黨的工作人員，各細胞委員會的書記與委員，鼓勵與宣傳的組織員或煽動員，都有特種题目的研究社與「黨的活動分子」訓練班。這些政治常識的「高級學校」之最重要的一種，就是馬克斯·列寧研究社，該社每星期召集一次，並在整個教育年度祇專門研究一個特殊題目。對於做指導工作的黨的活動分子，包括高級黨部的書記，舉行研究小組會（seminars），在此研究黨內生活最重要的問題與政策，並詳加商議。

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的代表會議有常規的研究大綱，這也成爲某種的政治常識學校。這些代表會議本身的存在，就是根據對於工農階級的婦女在政治意識與知識上的落後之確認。所以對於這些婦女特別需要理論的政治教育。這種代表會議出席的人數，平均從六十至一百，並在這種大的集團中，政治常識學校的討論方法較

不適用。同時，婦女比男子識字的程度較差，所以講演的方法較為通行。在婦女代表會議中的研究大綱與城市政治常識學校的大綱一般的題目相同。對於農民婦女，則研究的大綱略較縮短與簡單。共有十二個題目：農民婦女在蘇聯的地位；什麼是蘇維埃政府？一鄉的預算與賦稅；在我們的國家裏沒有被壓迫的民族；農業；工業；合作社；共產黨與農工的聯合；列寧論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什麼是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隊？婦女代表是新生活的前哨；以及農民婦女、蘇維埃政府與教育。在刊印出來的大綱中，每個題目的要點與取統計表及普通描寫文章的形式之材料共同刊佈。這是一百三十頁的小書，售價約三角。此外，還有幾種小冊專為這種代表會議的求學活動而印行，例如「農婦的政治常識讀本」。

出版了全套的教科書，以適用於各級政治常識學校的教學大綱，同時亦為下面將予敘述的蘇維埃黨校之用；此外，又出版「選文集」以補充之。這種書籍都與大綱相似，同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所出版，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有一種最便利的列寧文選的版本，印成四冊，亦為這些學校的教科書。通史、地理與政治經濟學概要，亦已編輯起來，專以適用於這些學校為目的。這些教科書的內容與着重點，都與大綱所定的相同。在一切這種著作中，預定的公式是很顯明的；在有些教科書中，討論終結時應有的結論亦為寫出，使這種功課成爲一種政治的問答教授法，尤其當一般學生毫無歷史、地理或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時。因此，發展了黨的教育工作之綱領上的與一般指導上的集中化。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總部，在這種書籍的編輯上亦來合作。政府與黨的機

關各出版一種指導的定期刊物。爲避免重複起見，黨的宣傳部擔任指導低級，而政治教育部則指導高級。

黨員按照其學識基礎而分配於各級學校的辦法，不是常常著有成效的。有許多黨員派到政治常識的學校學習，而按其實際的程度則應先入掃除文盲的中心機關，或入半識字者的學校。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的半識字者的學校在三千以上，其中約有八百個學校是設在莫斯科一處。甚至這一龐大的數目還覺太不能滿足實際上的需要，因爲工人對於這種學校有很濃厚的興趣。開設這種學校的計劃，就是要增加其學校數目以滿足這種需要，並作爲政治常識學校的預備班。這是可以推想得到的，這種普通教育的成分較多的學校所以得人歡心，是因黨員中的工人分子已厭倦政治常識了。但黨員進入這種普通教育的學校，必須被派定在其工作場所作特別的黨的學習，以完成其增進政治的與黨的理論的知識之任務。

在一九二七年，約有四十三萬三千黨員受到這些學校的政治教育；約有一萬七千個黨校的單位。在鄉村社會中，黨員的政治教育所得的進步較爲緩慢；用其流行的術語說來，許多這些黨員仍是「政治上文盲的。」在黨員舉行重新登記時，全體黨員的測驗發見了這個事實，發見了許多地方的黨員並不知道最近黨的代表大會所採用的綱領，且甚至有人還不知道有過這麼一次代表大會的。共產青年團有其自己的政治常識城市學校，與黨的學校有別，雖其組織的基礎與黨的學校大致相同，但其研究大綱比較簡短些。在一九二六年，共產青年團組織了二萬四千個政治教育的單位，招收了四十八萬七千個城市的團員；到了一九二七年底，學校的數目增加到五

萬個單位；共產青年團的政治常識學校，已於此時推廣到鄉村區域。但在鄉村裏，共產青年團在鄉村讀書室內與其周圍的工作，時常是他們的政治教育與訓練的目的。

上面已經說過的黨的教育方法之改變，對於研究材料的選擇給以更大的自由。進入政治常識學校之機械式的指派，是要減少到最低限度。大概每個黨員仍要報告其在政治的與普通的訓練與教育方面繼續工作的情形；但是加入自願的學習團體，或進入普通性質的成年人的訓練班與學校上課，亦可認為是一切黨員所必修的學程之執行。但共產青年團團員或共產黨的候補黨員，則必須執行嚴格的任務：進入與修畢某種低級的政治常識學校。對於黨員之嚴格厲行必須進入一種政治常識學校的任務，直至最近數年止都被證明正確：這是可以置信的。據解釋說：在革命的最初幾年中，學習的必須任務，並不覺得是一種外來的強迫的勢力，因為當時一般人對於初步的政治教育有濃厚的興趣，而需要受這種教育的確認，便使這種必須的訓練在事實上成爲自由與自願的。根據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所作之統計的研究，在一百零六萬一千個黨員與候補黨員中（在紅軍中的不計在內），百分之四〇·八，或四三三、一四七人，都已畢業於某種黨校。在這數目中，百分之二九·一，或三〇九、六〇〇人，已畢業於政治常識的學校，鄉村的那種政治常識學校的畢業者不計在內，一四八、七三四人，是讀普通課程，而其餘一六〇、八六六人是讀縮減課程，黨員的總數中，百分之五·九，或六二、二一二人，已畢業於蘇維埃黨校，其中四二、三四一人是第一級畢業，而其餘一九、八七一人是第二級畢業的。全體黨員中

不到千分之三，或三、一五五人，畢業於共產主義的高等教育機關。祇有五八、一八〇黨員，或百分之五·五，畢業於政治常識的鄉村學校。

這些數字被用以證明實施嚴格的必須學習的原則與機械式的指派之正確。這是自一九二四年以來的成績，蓋自那年頭起，黨的教育纔在有系統的基礎上進行；一九二四年以前，黨員政治認識的水準是很低的。受了一些學校的教育，黨員與許多非黨員的工人都已得到共產主義的基本觀念。據解釋說，一九二七年五月所以對於政治常識學校的入學必須採取自願登記，正是因為這種政治的與文化的發展有以致之。因為這些學校已不能適應黨員與甚至非黨員工人的活動分子之需要。這些學校的教學大綱被一個作者形容為「其範圍包羅萬象，但其程度卻非常膚淺。」上課已無定規，而學童則多喧嘩；聽說有一個工人批評說：「他們在那些學校裏所教我們的一切，我們都已經在各種報告中聽見過，或者都在報紙上閱讀過了的。」在莫斯科的鄰省梁柴（Ryazan）的一次調查，發覺政治常識的兩種學校——在城市的與鄉村的——「都不僅在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中失了威權，而且在非黨員的活動分子中也失了威權。」據說：甚至黨員中的農民也在避免這種學校。有人提議說：對於黨的歷史與其政綱及章程，應有更基本的研究，且應研究黨的目前問題；又有人指出：黨員羣衆顯然願意研究一般的題目，各農業的改良問題，或合作社的組織問題。

政治教育形式之自願選擇的原則之採用，在少數的幾個月中即已見出良好的成績。在一九二七——二八

教育年度的開始，討論目前政治問題的或某些特殊問題的自願組織的研究社數目已見增加。關於本年的完全的統計還沒有得到；但根據隨手可得的材料，則關於黨的教育之危機與其改良的必要之討論，仍在繼續着。這些材料都認為是黨員繼續避免政治常識學校並愛好較有實用性質的與研究大綱較為普通的學校之趨勢。對於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時加入的大批新黨員之政治訓練的籌備，曾特別予以注意。大多數新黨員都已經受過學校中的研究社之基本的政治訓練；這些人都根據其過去所受的訓練與他自己的志願，審慎地分配於各種政治常識的學校或研究社或蘇維埃黨校，且甚至在這裏對於「候補者」應用自願選擇的原則；祇有那些未曾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的人，不得被迫進入政治常識的學校。

已經受批評說有嚴重缺點的政治常識學校的方法，仍在繼續應用。在一九二八年初，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鼓動宣傳部，對各級委員會的一切鼓動宣傳部與中央委員會的宣傳團體發出訓令，指示對於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應如何研究。根據其所附的研究計劃，在全體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團員中，且不僅在這兩種組織的所謂「活動分子」中，必須作有系統的研究。所以一切蘇維埃黨校，政治常識學校，以及代表會議，都要進行這種研究。研究大綱分成四項。第一項是「列寧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第二項是「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諸問題。」與一條附款論「列寧論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與黨在五年計劃中的方針。」第三項的標題是「在鄉村工作的諸問題。」並在第一附款中的第一個研究題為「列寧論鄉村的社會主義建設。」第四項是關於「國際諸問

題；「第一個研究題是「列寧主義與黨在國際問題上的路線」；而最後一個研究題則爲「共產國際的目前任務」。此外還有各種特殊的計劃，定出一九二八年正月開始的對於十月革命十週紀念時加入的新黨員之政治教育的大綱。在過去於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新黨員之特別徵求中，有很強烈的「隨波逐流」(drift with the current) 或「尾巴主義」(tag along) 的傾向。相信在這次徵求黨員的新運動中，此種傾向或可減弱；但爲抨擊此種傾向起見，特別加重說明先鋒隊對於羣衆及對於其自己的階級之作用的問題。在新黨員中，或有許多百分數的工人從來沒有看見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他們知道些資本主義工廠中的工作條件，祇是間接的或多少是偶然的從描寫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生活的報紙上看到一些。這些新黨員應在他們的意識上明白地了解蘇聯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此點認爲非常必要的；據解釋說，與工人對於資本主義的工廠之態度相較，蘇聯的工業給其工人對於自己的工業以一種極不同的任務。

在政治常識學校與馬克斯·列寧研究社之上，有政治教育工作的高等教育機關。這些教育機關就是蘇維埃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個別的非黨員，有時可以進入前者，但決不能進入後者。蘇維埃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是嚴格的黨的機關，由黨來支持與管理。有時這些機關稱爲「黨校」，並稱其工作爲「黨的教育工作」；這些機關在事實上確是代表在政治教育的一般領域中之黨的教育。

蘇維埃黨校分成兩級：第一級的學校多見於較大的特區與較小的省城裏；而第二級的學校則見於較大的

省城與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二首都以及各民族共和國的首都裏。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有四十七個第一級的蘇維埃黨校與五十一個第二級的蘇維埃黨校，學生總數共計一三、三二五人。自一九二五——二六年度以後，學生數目已有減少，這是因為政治常識學校的發展與較定規的蘇維埃黨校程度略低的短期夜校的採用之結果。進入第一級學校的報考者，必須能夠讀與寫，並懂得算術與代數，且必須具有簡易政治常識學校的大綱所定的基本學識。第二級的報考者，必須能夠寫報告書，且其所受過的政治教育須具有第一級的大綱所定的相當程度，或至少須有普通政治常識學校的相當程度。同時，學生之進入第二級蘇維埃黨校者，必須為黨籍或團籍兩年以上的黨員或共產青年團團員。地方的黨委員會按所分配的名額選派學生，並於其學習時期津貼學生的家屬。

蘇維埃黨校之另一入學條件，則為生產的資格，並補充以公民活動的資格。在莫斯科的一個第二級學校裏，三分之一的第一年級學生是五年以上的「生產者」，並全體學生都是至少參加了一年的積極生產工作；在紅軍中的服役，認為與生產的活動相等。這些學生的公民活動，包括了很廣泛的範圍。有許多人是做過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細胞的書記的，約有二十個是重要工廠細胞的書記；其餘的人是細胞委員會的委員。有些女子是細胞或地方委員會的婦女組織員，及為工人婦女與農民婦女的地方代表會議的負責者。其次則有村蘇維埃與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或委員。合作社的經理處與職工會的工廠委員會，亦有代表派到這集團裏。再有幾個黨的鼓動宣傳的工作人員與鄉村讀書室的政治教育的指導員。大約五分之一是青年婦女，五分之四是青年男子。

在這第一年級的集團中共有二百十三人，其中一百三十四人是工人，四十九人是農民，與三十人是公務員。平均的年齡是在二十三至二十六歲之間。

在蘇維埃黨校裏，坦白地宣佈其目的為訓練煽動員與宣傳員。普通教育減少到最低限度；必要時，授學生以相當的數學、俄文、與自然史；但其主要的着重點則在於階級鬭爭史——即革命史、共產黨史、蘇維埃建設或蘇維埃政府的形式與功用。至如鄉村讀書室的指導員，合作社的經理，或工人俱樂部的組織員一類的工作，則無專門化的特種研究。這些學生普通都是預備做黨的工作，如做一切與每個活動領域中的領導者，如煽動員與宣傳員。「煽動員」的一個較簡單的定義是：拿一個單獨的觀念向一大集團的人衆解釋；而「宣傳員」的目的則在拿多種觀念的全部，向一較小集團的人灌輸。這兩個名詞用來，與「教師」一字有同樣的尊敬表示。這也是應該注意的：煽動員或宣傳員，都希望其不僅能解釋列寧的學說，而且能時常預備與準備對於在工人階級與在農民中的一切反無產階級與反共產主義的傾向，作堅決的反抗。

政治教育之最高機關為共產主義大學與學院，修業期間為四年。莫斯科的斯維特洛夫共產主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是這種機關之最大的與最重要的一個。這大學的校址是從前的一個私人教育機關之設備最完善的房子，而且其校長為一個最老的黨的工作人員。在設備方面說來，這可算是所看到的最好的教育機關。走廊與室內牆壁上的地圖與統計表是其設備的特點；因此學生正在工作的任務與問題，都

經常地以很簡明的意識形態揭示於學生的目前。一張很大的世界政治地圖在休息室中裝置得非常巧妙，使學生能坐在室內一目瞭然。

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學創辦於一九二一年，並於一九二六年爲其所招收的各方工作人員之第二屆畢業期。這大學之較大的部分設在莫斯科，並以其較小的部分設在列寧格勒。畢業生約有二百人；在他們中間有立陶宛人、猶太人、波蘭人、白俄羅斯人、德國人、愛索尼亞人、與芬蘭人。有少數的非黨員亦得進入並畢業出來而未加入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修業的年限也是四年。全體畢業生，都希望其能在蘇維埃黨或職工會的團體中擔任負責工作於其民族的所在地，尤其在鄉村區域。這些非俄羅斯區域的代表都能得到革命的無產階級中區的較廣大的經驗與精神，並學得俄文與俄國工人與農民的生活及其條件。在他們四年的修業期間，每年的夏季必須回到他們所派出的原來地方，以執行教學大綱所定的實習工作，並藉此與本區域的人民保持密切的關係。與家鄉的黨的工作人員之經常的通信，也是學生在首都的學習時期中必須的活動工作之一部分。他們又必須在俄國的工人與農民中間執行實習的工作。

孫逸仙共產主義大學是與其他高級黨校不同的一個機關。這裏的學生主要的是從中國招收來的，但在學生的團體中亦有印度人、日本人、與高麗人。其教學的課程，與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主義大學大致相同，但其訓練的重要部分，即是使這些來自東方的學生參加實習的活動於俄國的工人與農民中，比較有些困難。其他一般性

質相同的黨的高級教育機關則爲：莫斯科政治教育學院，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或烏拉爾·西比利亞共產主義大學，這些大學的目的，是在訓練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際之合格的工作人員。

高居在一切這些訓練馬克斯與列寧主義的學校與大學之上的，則有搜集這些領袖的著作與學說的學院。馬克斯·恩格斯學院，已把這些領袖的著作及其註釋編成一部極大的文集，並在進行以數種文字出版他們的全集，甚至注意較切近的政治問題的，則爲列寧學院；在不久前完成了莫斯科一個中心廣場上的新建築，以爲該學院的總機關。這學院是一切列寧親筆的材料之貯藏所，並將負責出版列寧的全部著作及其註釋。

各種政治教育的學校都採用教學的實習方法 (the laboratory method of teaching)。某些教學大綱的概要，示明這種方法如何適應於課程的目的。分組集體研究問題的辦法也在提倡並實行到某種程度。但是，對一個聽者的集團作報告的習慣，是一切蘇維埃式的各種集會的特點，而且許多教員也覺得祇有用演講來授課，纔能在所允許的時間內得講遍各種題目。從所有不多的偶然幾次教室參觀與教師的談話所得的印象是：有建設性的討論很難得到，甚至當學生已在生產中與公衆生活中有廣大的實際經驗爲基礎時，亦難得到。

許多授課的工作是由在行政的與經濟的機關中站負責地位的黨員來充任。這樣，助成所學更切實用，同時這些教育機關可爲領袖們充作政治的與經濟的趨勢之優良氣壓表。這對於共產主義大學特別是如此，這裏的學生都與其所自來的工廠與鄉村保持經常的關係，並藉他們的問題與討論，得把工人與農民所想到的熱烈的

問題從活躍的政治生活中剖露於各教師的面前。

蘇維埃黨校或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在學習的第一年中並不令其作校外的公民活動。此後，在第一個暑假期間，他們必須回到家鄉，並在其所選派的團體裏工作。在第二年與自此以後的幾年中，學生必須執行某種最低限度的校外公眾工作。有許多學生被派到政治常識的學校裏做領導工作；其他學生則被派到工人俱樂部。在斯維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中，學生對於每小時的工作與活動都有記錄。「自制」(self-control)的辦法在起初不大通行，但後來纔承認爲一種有用的訓練方式。或有人要說：這對於通常的俄國人是一種新奇的辦法，因爲他們是向來不大看重時間的。有一特種工作室，指導、控制、與分析學生的公民活動。

在蘇維埃黨校裏，各有可能，招收一種小民族的學生。在作者參觀到的一個學校裏，學生完全是韃靼人。他們全體都能說俄語，但需要教他們讀俄文。在參觀的那一天，看見他們正在默讀關於十七世紀一個農民暴動的領袖——史丹卡拉秦 (Stenka Razin) ——的一首詩。一個學生被問到如何用現在的話語來解釋這首詩，他在回答中彷彿對一羣工人或農民做報告一般；由此可見這些學生正在準備的實際工作經常在他們面前表演。黨員政治教育的宗旨，是要使每個黨員在事實上成爲黨的政治路線在其四周非黨員的工農羣衆間之執行者。一個負責的政治教育工作人員寫道：

政治常識學校是要訓練黨員成爲工人與農民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之實際的領導者，使他們能時常把自

己的問題與疑難提到黨員面前以求解答；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使每個黨員成爲宣傳黨的路線之精幹的煽動員，爲在非黨員的羣衆間這種路線的解釋者。

高級蘇維埃黨校與共產主義大學的宗旨，與此大致相同，祇是要負些較大的責任。這些特種黨校的教師代表會議通過了下列決議案：

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了黨與蘇維埃政府在這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現時期的複雜與矛盾的條件中之黨的任務，這決議應是決定蘇維埃黨校所研究的內容之準則。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爲此後數年所扼要指出的現在鬪爭與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目前任務之理論的與歷史的背境與其根據列寧主義的解釋，應成爲在蘇維埃黨校中一切社會科學的教科講解之中心目的。

在一切黨校中的目的，無非是增進黨的活動分子之領導能力。在業工人，特別令其繼續學習，以超過黨員的必須條件以上。因此，企圖造成一種新的人才，叫做「工人宣傳員」(propagandist-workman)。政治教育的工人員會有趨向於變成一種專門家的，甚至官僚主義的分子，且其宣傳工作的效力因以減低。據現在所期望的，在任何企業裏的宣傳員應該是本地地方的人，而不是被人看作外來人的派來的演說者或指導員。同時現在的趨勢是企圖在黨員中採用較多量的普通教育。他們認清了：良好的政治意識需要有普通知識爲基礎，這種普通知識是爲從前盡量求速成的造就宣傳家與煽動家的努力中受着犧牲。祇是背誦口號的煽動方法，已開始喪失其

在革命的初期與較英俠的時期所有的效力。黨校的教學大綱是趨向於造成狹義的煽動員，不是造成真正的領導者。這種危險已爲黨的領袖所承認，他們督促各黨員說：應利用最近開辦的夜校或大學自己發動來增進普通知識。這種學習也認爲是黨員公民活動的一種義務之執行。

政治教育工作特別組織得好的是在紅軍中。這裏的條件特別利於此種工作；紅軍兵士在軍隊中的生活有兩全年，而且他們的全部時間，甚至在休息的時候，都在監督或至少在指導之下的。政治教育之一部分目的是在增進兵士的戰鬥員氣魄。但是，甚至在紅軍成立時國內戰爭的數年中，有系統的政治教育亦在進行，而與嚴格的軍事目的不相關涉。現在紅軍中的政治教育，與一般的蘇維埃教育相同，是一種普通教育的與文化的訓練，而尤注重政治訓練。一切這種政治教育的工作是受所謂「普爾」（Pur）的鼓動宣傳部指導的。「普爾」是「共和國的政治管理處」（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之簡字，這是海陸軍事人民委員會的一個分部。

訓練紅軍兵士使之成爲「戰鬥的公民」（fighter-citizen）之任務，有兩種執行的方法，「戰鬥的公民」一語係借用討論這題目時常用的術語。第一，有必修的政治課程，佔每日七小時訓練時間的二小時。這些政治課程的上課時間是在每天的早晨，這時候兵士的頭腦新鮮且在聽演講與討論中較能受益。其次則有課外的自願活動，大都在黃昏舉行。這些活動以兵團的俱樂部爲中心，而且一團裏的每一單位都在其營房或軍營裏各有列

寧紀念處。因此，空閒的時候可利用之以作較普通的活動，如閱讀書報，研究社的工作，與關於政治與經濟問題的講演大會。

紅軍兵士之正式的學習大綱，首先注意到每年秋季新募的兵士之識字。在一九二五年，加入軍隊的青年有百分之三十是不能讀與寫的；在一九二六年，因上述的掃除文盲中心的工作在青年中組織起來的初步訓練之結果，已減少到百分之十二；共產青年團在此對於招入軍隊服役的團員，負有一種義務。於識字之後，纔開始實行爲這兩年的服役時期所計劃的政治課程的大綱。在第一年中，所學習的科目是普通的，祇常常注重政治的題目及其解釋。在第二年，學習的科目比較專門且偏重在經濟方面，蓋留意到爲紅軍兵士服役期滿後回去做生產工作的準備。第二年的學習概要，現在手中沒有較完善的材料，但第一年的學習大綱，在本書所研究的題旨上比較值得注意。

在這第一年的學習大綱中，有一百十三次「談話」講授其相當的各項題目。這些題目分成數類。第一類共有十二個題目，關於解釋軍事服役的理由，軍事的組織，政治訓練班的重要，軍事訓練，軍事的祕密，刑罰與懲罰，與最後現役軍人的政治權利與義務，以及優待條例與特權。第二類是關於「防衛蘇聯的紅軍」有下列各題：工人與農民如何奪取政權；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工農聯盟是蘇維埃政府的基礎，無產階級獨裁；我們的經濟政策；蘇維埃政府是工人與農民的政府；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聯邦；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蘇聯的各共

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與蘇聯人民委員會行政院的主席。

大綱中的第三類授以紅軍的簡史。第四類討論共產黨與紅軍；這一類的最後題目是「列寧的偉大教訓即是共產黨的任務。」第五類的名稱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在這一類之下，每個國家都依次提出討論。大不列顛帝國爲表上的第一名，並給以三次授課鐘點，而法國或美國則僅一個鐘點。第六類的標題則是「這樣一個口號：『如果你要和平，須作戰爭的準備，』而其第一個題目便是討論新戰爭的危險。第七類的總標題是：『勞動者的國際組織，』首先討論「在敵人國家中我們的朋友，」其次敘述共產國際，「殖民地國家中民族革命運動的滋長，」並以下列題目作結尾：「紅軍是世界革命的武裝力量。」

第八類回頭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建設作更詳細的討論，包括蘇維埃政府的一般經濟政策。土地法與森林法特別予以注意。在第九類「外國資本家與蘇聯」的總標題之下，討論到對沙皇債務的否認與外國資本的收歸國有，以作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政策及對外國資本允許租讓權的概要之引論。各科的最後一類則冠以很廣泛的總標題：「紅軍是覺悟的公民底學校。」這最後一類題目，主要的是爲教育農民的兵士。在此扼述農村的各種重要機關及其組織與功用；並論及鄉蘇維埃、合作社、農民互助會、國家保險、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細胞、鄉村讀書室與其軍事室，在鄉村的軍事準備宣傳，退伍兵士的特權與優待條例，以及爲退伍兵士與團隊及整個紅軍繼續發生關係的設施。

在新兵每年給以短時期訓練而分成五年訓練的區域單位裏，政治的課程減少分量。這種政治教育的工作，是在第一並最長的時期做的。在第一期訓練之兩個至三個月間，研究政治的鐘點共有五十次，每次時間為一個半小時。在此與在兵士募入常備軍的地方之目的是相同的。其計劃為藉這些演講與討論，以「準備一種覺悟的與訓練有素的蘇維埃政府的防衛者，使其明白了解：蘇維埃政府的鞏固，祇有在加強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聯盟，並在其產黨的領導之下，纔有可能。」在此的政治研究亦在軍事訓練之前，並分成各小組來指導，以便舉行討論。一般的題目都與上面所說的相同，祇是用較簡短的方法來講授。

載有政治課程的大綱各書，都給以討論的綱要，以備這集團的指導員或領導者之用。為區域單位用的書，除了正式的大綱之外，還補充以完備的解釋，這都可在每個題目的第一鐘點閱讀。應行提出的要點，與事實上在每課中應做的結論，都以正確的文句寫出。藉這種方法，馬克斯主義的歷史觀與共產主義的政治觀得以保障。關於兩點的解釋特別有趣。在討論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和平政策時，指導員必須給以正確的指示；資本主義的各國政府之不可調和的敵視與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使這種政策須有相當的限制。第二點須要作審慎的解釋，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獨裁。聽演講的兵士，主要是農民。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必須加以說明，而行使這種領導權之黨的領導尤須解釋得詳盡。對於蘇維埃體制的這兩個基本原則時常欲作緘默的企圖，其結果祇有害處：這是予以加重說明的。農民的兵士，必須使之了解這些原則的必要與合理。

這些功課都是由常任的軍官來指導的，這事實使各項討論必須定出很確定的內容與指導方法，一如這些研究大綱與其所出版的補充書籍之所定。從前有特別的政治工作人員專任紅軍裏的政治教育工作，這些人時常是共產黨員。此種政治工作人員是從共產黨的黨代表發展出來的，此種黨代表派到每個軍事的單位裏，在其各種任務中亦有監視被招入紅軍做技術專家的舊軍官之任務。自從工人與農民中訓練出新一批青年軍官以後，這種特殊的黨代表便不再用了。但他們仍舊留在軍隊裏做政治指導員。在最近數年中，這些特殊的指導員已被廢除，而政治課程的指導責任則由常設的司令部負擔，但有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幫助指導員準備教科的資料。每一團裏都有這樣一個政治工作人員。紅軍有其軍事政治的與其軍事的學校，而且政治工作人員即在軍事政治學校裏訓練出來的。祇是共產黨員與共產青年團員纔有資格進入這些學校。學習大綱中約有五分之三是規定作普通的與政治的教育，其餘則作嚴格的軍事訓練。最高的軍事教育機關是「軍事政治學院」這是特別為紅軍訓練政治工作人員的。

在紅軍中政治教育方面的活動中心，是在營房的俱樂部或列寧紀念處裏，或當夏季軍隊露營在野外時則在軍營裏。因為訓練的問題，列寧紀念處佈置起來以作研究社的工作，並較工人的紅色紀念處為更有作用的中心，而俱樂部則祇為全團作羣衆活動之用。在列寧紀念處裏供給兵士以書籍、小冊、與現時的定期刊物。因為同一的房子又須為政治訓練班應用，所以這裏又有為正式研究用的材料，同時亦有表示這些研究成績的圖表。兵士

自願地組織各種研究社，這與工人俱樂部的研究社一樣是研究的集團。有些兵士取農學或電學爲其有興趣研究的科目。政治研究社時常是最大的研究集團之一。戲劇與音樂研究社，普通都以全團爲基礎，經較大的俱樂部組織起來。兵士通訊研究社亦是各團一律都有的，該社將同時對團裏的壁報供給積極的編輯員。再應說到的，就是兵士通訊員又與普通報紙及軍事機關出版的特種報紙通訊。在夏季幾月中，俱樂部與研究社的活動大加縮減，而體育則爲例外，但當團部到野外露營時，列寧紀念處也帶去，並變成「列寧幕」(Lenin Tents)。外面的政治工作人員也來幫助其演講的組織與研究社的活動。

在區域的單位裏，則既沒有時間，又沒有設備，不能在兵士服役的短時期內作校外的活動。在兩次受訓練的時期之間，希望兵士能參加於工人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一類的活動。他同時要在這些機關內負組織軍事室的責任，這樣實有助於他自己的軍事訓練與一般工人與農民的軍事準備。區域的研究，利用之作爲軍事訓練的基礎；區域研究者時常在其研究社、職工會、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的區域研究中，注意到戰略與一般經濟富源的問題。

在政治的研究中對於報紙與時事新聞的利用，似乎在紅軍的政治教育工作中做得最爲完備。兵士比較工人或農民有更多的空暇時間以閱讀報紙。在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比較其他任何機關（黨的機關也不例外）的政治工作人員更爲訓練有素，而且「不需過多的印花板模型」（引用共產黨領袖的話）而能活用政

治教育的方法。在某團的營房中，看見一種饒有趣味的指導閱讀報紙的方法。在一塊大板的中央有一張世界地圖，在地圖的各邊貼着幾條外國時事新聞。在每條新聞上都有一根線通到地圖上這件事情發生的地點。我們參觀這營房，正當宣佈波蘭干涉蘇聯的計劃的時候。在另一塊板上貼着關於波蘭反對蘇維埃的各項新聞。還有一個關於波蘭的簡短書目貼在這公報的板上。

紅軍兵士的政治訓練又以實際參加其四周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生活而作進一步的發展。已經說過了，兵士亦得參加蘇維埃選舉，並有代表選入蘇維埃。合作運動亦有其支社設在營房裏。工人的兵士祇在其服軍役期間是職工會的消極會員，但當他從紅軍裏回來時，他就不需任何形式而恢復其在職工會裏的活動。因此，他仍繼續對於職工運動及其發展發生興趣。工人對於兵團的扶護社使之與生產發生密切關係。在區域的單位裏，則兵士在一年中祇是短時期脫離生產。最後，兵士的農家家屬經常與他通信，告以自己的困難，希望其在城市裏的兒子對這問題能有幫助。這種通信是受鼓勵的，並藉此以使農民的兵士得與鄉村生活保持聯繫，且得與鄉民質問到或訴苦到的行政機關發生聯繫。據說這一切事情都使兵士的政治研究與活動具有更切實的形態；因為在蘇維埃制度下的軍隊是不許與整個國家的生活脫離關係的；且是事實上被積極地導入四周的社會生活中，並導入革命的政治鬭爭與其文化成績中。

在服役期間的最後數月中，有政治訓練的集中；政治課程的鐘點與各種研究社——尤其關於合作社，鄉村

讀書室，與蘇維埃建設——的活動時間，特別增多。希望用這種方法能保證退伍的紅軍兵士積極參加這三方面的活動。這種訓練具有略較實用的性質；其方法為令社員做報告並根據這些報告提出問題與舉行討論。希望每個退伍的兵士，能為鄉村讀書室或區域單位的訓練中心開闢「軍事準備處」(Military-preparedness Corner)的主動者；倘若已有這種軍事準備處存在，他須助其繼續發展與大衆化。所以關於退伍兵士於其回到工廠或鄉村時須加特別注意的特殊問題，是在其服役的最後數月中給以圓滿訓練的。

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是引導至少在兵士中被選舉的積極的分子進入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的特種經理人。在紅軍的每個大的單位與在許多較小的單位中，都有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細胞。這些細胞與黨或青年團的其他細胞不相關涉，並且是置於「普爾」指導之下的。紀律的必須條件使這種辦法成為必要。但是，紅軍的細胞並沒有完全脫離黨的活動，而且黨員個人仍須執行其公民活動的必須任務，但因兵士有其特殊的義務與必須執行的任務，其公民活動則有相當限制。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領導各種自願的活動，如成立研究社之類。一般地說來，細胞是一團裏的公民活動之另一中心，有時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的細胞統轄俱樂部或列寧紀念處。許多人當其在紅軍裏服役的時候加入共產黨或共產青年團；一般人覺得入黨的最容易條件即施行於紅軍兵士間。在一九二六年，五十二萬個紅軍兵士中有五萬共產黨員。

軍官與兵士的關係已在論蘇維埃國家機構的一章中討論過了。在此要指出的是：這裏所用的「軍官」

(officer)與「兵士」(soldier)二字已在蘇聯的字典中廢除了。全體都稱「紅軍」(Red Armyists)；有些是發號司令的人員，而其餘的人則都是在較老與較有學識的同志指導之下，來執行其應盡的軍事服役的義務而已。在軍官與兵士之間有更好的同志關係，這是毫無疑義的。軍禮亦加以簡單化，並減到最低限度。傳令兵的制度已加廢棄。肩章亦已廢除，官長祇用外衣領口上的小小標記來區別。但是紅軍有其紀律與其規則。共產黨人主張在舊的軍隊中引用的委員制，在其新的紅軍組織中已不採用了。據解釋說：已發展到選舉軍官的委員制在過去是必要的，因為要保護工人和農民的兵士以對抗出身於其剝削者階級的軍官。現在，軍隊是工農的紅軍，這裏的指揮人員是由工農的政府派出來的，並且大部分是從工人與農民階級出身的，所以委員制再沒有採用的必要：這是他們所解釋的。因此，自治的原則不復見於紅軍中，祇有合作社或研究社的組織是例外。

在紅色海軍中，服役的年限比較長些。政治課程的大綱差不多與在紅軍中所用的相同，祇因分攤在較長的服役時期中比較不那樣緊張。在軍艦上與在海軍大本營中，在小集團內組織校外活動亦有可能，但因自然的條件關係，其與四周的生活接觸祇能在很有限的範圍內組織起來。為要適應這種情形，所以決定使共產青年團來負扶護紅色海軍的責任；又因自然條件的關係，這種扶護工作的實施亦是難於組織。演講與參觀的組織與由共產青年團機關供給書籍；這似乎是此種扶護工作所能做到的範圍。因為蘇聯的海軍在目前規模甚小，在這裏的政治教育工作亦沒有像在紅軍裏那樣大的規模。

在紅軍兵士中之有很具系統的政治教育與訓練的組織，其原因是很明顯的。藉軍事的服役，一大羣青年農民引入城市的中心區，並於其兩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在這些中心區的無產階級空氣中度日。在這裏，這些農民又得認識工業的行程，尤其認識組織工業的蘇維埃形式。他們學得大規模生產的集體方法與技術上的方法，並學得城市工人的工會組織法。同時，他們又能藉陳列館、戲園與其他文化機關的設備，得以參加到城市中心區較高的文化生活。鄉村共產黨人在共產黨與共產青年團的細胞裏學得黨的組織與領導的更好方法。紅軍把一切這些觀念帶回他的鄉村裏，並希望他不僅能幫助農民的文化發展，而且能幫助農民與工人階級的聯合。紅軍就被稱為改造農民羣衆的實驗室。

在政治課程的大綱之下，紅軍兵士首先教以爲什麼他必須費其一生的兩年光陰去作軍事服役的原因：他是被徵調去守護革命的戰利品——農民的土地與工人的工廠。區域制度被解釋爲一種減輕軍事服役的負擔之努力。他須於服役期滿後積極參加軍事準備運動（the military preparedness movement），這又是減少國家與常備軍兵士個人的耗費之努力：這是他們所解釋的。當他已完成這種準備自己爲革命的戰士之特殊的義務時，服役的期間將利用之以使他成爲更有用的與具有生產能力的公民。在其他题目的討論中，在一切公開的大會上，與在研究社的活動中，經常地提出這幾個要點。其次，每年有紅軍成立的週年紀念之公衆的大慶祝：這是蘇維埃體制的一個政治紀念日。一切報紙與團體都以關於國防問題的文章或集會來紀念。這些事情又對紅

軍在日常生活與政治上的地位作進一步的加重說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正式的政府機關報「伊士維斯太」發表關於八週紀念的一篇文章，題名為「紅軍與蘇維埃的公民活動」內有下列的文句：

在紅軍的週年紀念日，讓每個黨的工作人員，每個經濟上的工作人員，每個工人，每個農民，每個蘇聯的公民，向他自己與向他所屬的團體報告他已經怎樣執行了他在軍事上的義務……因為祇有藉學校、俱樂部、讀書室、公民團體、體育與競技，並藉文學軍事化一類的工作，來發展軍隊以外的軍事訓練與操練，我們纔能減少軍事服役的年限與維持常備軍的耗費。

紅軍兵士的「政治教育」負擔是很重的。在一九二七年，紅軍中有七百一十個俱樂部，約有七千五百個研究社，近六千個的列寧紀念處，超過六千五百種壁報，差近七萬五千個兵士通訊員，以及九千五百所紅軍圖書館，內有八百萬本書籍。這是可能的，許多人都歡喜出去散步，看看陳列館，或聽聽俱樂部中的講演。但是政治的課程把操練的鐘點減少了。同時其他的活動對於青年農民是頗新奇的；並且從在陳列館裏時常遇到的幾隊兵士的面孔上看來，覺得他們對於這些新穎的事情具有真正的興趣。在俱樂部中的戲劇表演、活報、與音樂晚會，都有娛樂的成分，雖其主要的內容，甚至在歌曲中，將加以選擇，要能表顯革命的原則與提起革命的口號。下列故事是最近在一種論紅軍的共產黨人著作中以顯然滿意的態度述出來的。一個退伍的紅軍兵士被人問到他在那年的軍事訓練中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是：「機關鎗與政治。」

在政治教育工作中，共產黨人都知道有四種成分：黨內的研究與訓練，一般的政治教育，行政上的政治訓練，與在政治組織方面的訓練。一切政治教育的基礎是共產黨。在紅軍中這些多種的訓練成分最爲完備，因爲共產黨藉其細胞與對紅軍兵士政治研究的控制，成爲紅軍中唯一的政治領導者。在黨員政治教育的高級機關中有軍事政治學院，以一個初期的紅軍領袖托爾馬雀夫（Tolmachev）的名字爲這學院的名稱。這學院與共產主義大學同屬一類的機關，它供給政治課程大綱的材料，並領導與指導紅軍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本章所述的祇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現象。掃除文盲的任務是在政治教育的範圍以內的，且在目前自舊統治遺傳下來與在新制度下滋長起來的文盲人數之多，使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減輕注意。對於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員，即前面有一章中所稱的自覺負責的公民，特別注重於特種的政治教育。但是非黨員的工人活動分子，亦允許其分享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團員的這些特種學校的教育。在婦女與紅軍兵士中特別注意其政治教育，兩者的原因恰恰相反，婦女是最難受教育的，而青年兵士則是最容易受教育的分子。其次，在最近幾年中，因鄉村讀書室發展而成爲政治教育的中心，全體農民已是政治教育方面的主要對象。

第十四章 文學藝術與劇場

此處所論述的革命後十年來的文學、藝術與戲園的發展，祇是一般的，而且常常是從公民訓練題目上着眼。一般地說來，劇場、文學與藝術用以作有系統的與廣大的政治宣傳及政治訓練的，尤其是劇場。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討論得很多，無產階級的文化已有其機關與組織的成立，但一般人承認經過第一時期的熱心，以後在這方面的努力必遇到一種長期的與困難的任務。但發展藝術表演的訓練同時用之以作政治覺悟的訓練。若遇這二種成分不能兩全時，則政治成分必不可犧牲。例如，我們已經看到紀念儀式必須常有革命的階級覺悟的成分，雖藝術形式的成分或亦加以重視。

因為此處所述的都是很一般的，所以把文學、藝術與劇場三者合在一章裏說過去。電影的俄文簡字是 Kino，它和無線電都因其物理的特性，常用作政治宣傳時，獨具特異的方法，比諸劇場與文字二者能起較廣大的作用。下面一章將述及蘇維埃制度中的電影與無線電。音樂則在廣義的劇場中都同時表演，且亦藉無線電來播送音樂，已在好幾處提到過了，在往後討論這兩種設備的兩章中亦將予論述，但在討論無線電的一章裏，因其能及到更廣大的羣衆，將予更着重的敘述。這種分類是相當權宜的辦法，但以下對各種特點的加重說明，將指示

此處所採用的敘述法的邏輯。

當代的文學家大都是對十月革命及其主義仇視的。祇有幾個少數的例外者。高爾基是否爲這些例外者之一，或許還有問題。他對農民所表示的堅強與坦白的不悅，無論如何即可使他站在模稜兩可的立場。在最近幾年，他自願地流放外國，實際上的意義就是從積極參加新制度的文學生活中退休。（高爾基回莫斯科作六十壽辰大慶祝事，以下將予論述。）其他顯然的例外者是亞力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c），據著名的蘇聯文學批評家說：他企圖「把基督教的愛與革命的暴動混合起來，並把神祕主義與唯物主義混合起來」；很快以後他「於這些矛盾在他的心靈裏起了決裂時，犧牲於這戰鬥中。」比高爾基與勃洛克在外國較不著名的詩人維也遷斯拉夫依凡諾夫（Vyacheslav Ivanov）已在砲聲隆隆與內戰中退休，入其所愛好的希臘人世界，而重返其少年時期的生活；他與許多別的人一樣爲新制度的獨裁與恐怖所離棄：這是一個蘇聯當代文學評論家所說的大意。很快以後，更大的一羣革命前的俄國作家都逃亡出去。其中許多人在其外國的放逐中仍繼續寫作，但他們的最近作品在蘇聯沒有影響，因這些作品不准自由入境與流通。

在革命的初期，並未產生新的散文作家，要在這時期找尋此等作家是毫無理由的。這時期的文學是宣言、檄文、與政綱的文學。但是無產階級的詩人卻已出現了，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台孟培德尼（Demian Bedny），此處將以他爲這類文學家最卓絕的例子。這個無產階級詩人的主要特點是革命的熱忱——例如他熱烈信仰世界

革命之急速成功。這就產生了稱頌勞動、工廠、鐵與鋼、及肌肉的讚美詩。他企圖在詩中表現唯物主義的與集體主義的觀點。這些無產階級詩人起初是年紀較大的人，他們是在舊制度中受到訓練而沒有到戰線上去的。現在他們變成新生活的詩人，且其題目總是：工人的郊外宅，在赤色旗幟下，或為鬪爭的歌曲。工廠是工人階級受苦的策源地，但也是他的力量與團結的策源地——這就是此種詩的常用題目。這些作家的特點是對世界抱定共產主義的觀點與富有革命的情緒，他們完全是革命的忠實擁護者。但這革命初期的無產階級詩無寧趨向於抽象。這種詩祇限於抒情的，而對工人階級的生活與狀況祇作很普遍的描寫。在這種詩裏特別覺得單調，也沒有新的體裁創造出來，所以在這方面據蘇聯的批評家說：無產階級的詩「還是資產階級的詩的附庸。」

無產階級的詩受一九二一年所採的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許多共產主義的詩人，對於退讓革命初期的軍事共產主義之原則與實施的新政策不願接受。當他們看到資產階級分子及其思想重在文學上也擡頭的時候，他們的信仰動搖。但他們為一個強大的集團所反對，這集團的刊物叫做「職責所在。」另一集團在「少年先鋒」的周圍團結起來，代表新進的分子，因此被認為對革命的文學大有希望。參加這第二集團及幫助它的還有些老輩的共產主義的政論家，其著作大半是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

共產主義者的領袖告訴我們說，在這第二集團中可得「洞見未來的文學」這是一種在音調上充滿生活的愉快、希望、與毅力的文學。這已經不是從前那種對革命作抽象寫法的文學了。在新經濟政策下的建設時期中

每天的事實，都是寫作的題材；這些作家不怕寫這樣細小的事實，因為去做最細小的事情和踏上革命綱領中之每一步驟均成爲必要的了。一個蘇聯的批評家在描寫這集團時寫道：「他們對革命最後勝利的信仰始終不動搖。」對於細小事情之感興趣，成爲革命第二時期中無產階級詩的特點。這集團的一個作者之下列詩句，已建議爲這集團全體的箴言：

把星球如地上泥塊一般地顛來倒去，並在電的詩中吟詠宇宙這是甚善甚美。可是現在還要你表示能
在一個小小省委的主席討論森林問題的活動中，感覺到前途的曙光。

無產階級的詩人已成立了學社，工作室與類似的組織。他們是初期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即所謂無產文化（proletcult）中的活動分子之一部。這種無產文化，在國內戰爭與經濟破壞的時期中，必然是多少胡亂的，祇要經濟來源可以設法，這運動總是受到維護；同時檢查的條件亦對無產階級詩人有利益。現在則有無數的無產階級詩人與無產階級作家的組織，團結在工人俱樂部、壁報、與一切羣衆的報紙之周圍。

詩的表情形式成爲對無產階級青年分子特別強有力的宣傳品。在一個無產階級讀詩的晚會上，我在莫斯科得到參加的機會，見其聽衆大都是青年，其中許多人顯然是工廠裏的工人。一個關於無產階級詩史的開場報告未能得聽衆的歡心；報告者是一個知識分子，且顯然是被派來作一簡短的歷史報告的；他是一個不可忍受的笨拙者，而這班青年也不遲疑的表示其厭煩。但無產階級的詩人自己登臺並誦讀其最近的作品時，聽衆的興趣

頓覺濃厚。少年蓬勃的藝術家與幾個較著名的詩人都列在晚會的節目中。其詩句充滿了革命的熱忱，而這班青年人傾心聽其誦讀的詩意。時常在與青年的談話中——譬如與鄉村的民警隊長及與莫斯科旅館的助理會計——知道他們是無產階級的詩人，並極以自己在此種場合活動爲榮耀。

在一切種類的報紙上——在中央的機關報上，尤其是在爲工農刊行的羣衆報紙上——詩都佔了廣大的篇幅。台孟培德尼是伊斯維斯太及真理報的經常投稿者，他的題目常是政治與經濟的時事問題。工農的通信時常用詩的形式寫出來。這種詩是否通順固成問題，但在蘇聯廣爲利用的插畫與諷刺畫插入其中，使這些詩句便可充作輕描淡寫的篇幅；蘇聯的報紙，甚至更通俗的羣衆報紙，通常都以篇幅繁多而且「內容充實」爲其特點。壁報上也有許多篇幅留給其出版團體之各分子投載短小的詩稿。

文學上的「未來派」正當革命前在俄國也活動起來了，他們確定地同意於革命，並迅速對其維護與服役。他們像無產階級的革命一樣，痛恨矯揉的小資產階級的語氣與態度，並在相當意義上也要力圖破壞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基礎。但不久後，對於未來派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問題起了爭論。有些人深信放蕩的未來派確實同化於無產階級中是不可能的。馬耶可夫斯基 (Mayakovskiy) 曾是未來派傾向的領袖之一，他也像無產階級的詩人們把街頭巷尾甚至溝壑的醜語都引用在他的大作中，甚至在句法上以白話代用文言，而且減少音律的重要性。因此他就反對舊有的習尚，並至少在這基礎上來參加新制度的建設。但許多人對他這些

方法能否使他自己易入其所稱頌的無產階級之門，尙抱懷疑。馬耶可夫斯基和他的一派人當初確曾在藝術大眾化上做了許多扶助的事情；他之成爲「跑街的詩人」卽是一例。馬耶可夫斯基又對那些企圖創造所謂「生產藝術」的建設主義的戰士供給材料，那些人認爲一切包括文字語言的藝術都是物的建設。這派人稱爲「左派」，取左字的激進意義，把左字 *Left* 縮寫成 *Le*，可是他們的注意力漸漸趨向於形式方面，並如一個蘇聯的批評家所說的，「減弱其直接採取四周的實際事情之意識」，以致脫離羣衆。

國內戰爭的終了與新經濟政策下建設時期的開始，對革命的「文化戰線」招致更複雜的任務，但同時亦引起更大的注意，無產階級的詩，未來派的主義，以及革命前的傾向，均能更自由地發展，推廣他們的見地，並充實他們的形式與內容。尤足注意者，爲一羣經過國內戰爭的游擊戰爭中的游擊隊，或戰爭與經濟恐慌條件下受無窮的行止不定之訓練的新近少年作家之加入。其中許多人曾服務於革命初期各種與軍事及政治鬭爭有關的組織裏。一切在革命初期僅以一般形式提出的問題，現在必須更具體的去研究。同時這些問題成爲更劇烈討論與爭辯的題目。最後，從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新條件中，在文學上也發生了一個集團，此卽托洛斯基很巧妙地稱爲「同路派」者是。

同路派就是那些祇在形式上接受革命，而不一定完全了解革命的任務，不一定富有革命的精神與較深刻的革命志氣的著作家。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可以「革命事業」相託付的；他們以其階級身分或階級僻性的緣故

力難勝任。他們未曾是共產主義者，並未曾確實了解共產主義的政綱。他們中有些人對於現代的生活有採取傲世態度的趨勢，但對於資本主義的秩序亦取同樣態度，並因此「在反對日趨滅亡的舊世界之鬭爭上，給革命以一臂之助。」他們即在後一意義上稱爲同路派，雖顧名思義可知他們對於自己與革命同路之點何在是不清楚的。

例如農民的詩人，與無產階級的詩人相反，祇能認爲是同路者。他們描寫農民的生活，並介紹田野與森林間的新鮮，甚至稱頌農民的宗教生活，常把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對立起來，而以前者爲較勝一籌。他們對農民的暴動精神，對他們奪取土地與攻擊地主階級的革命手段，歌詠讚美詩。但是一個蘇聯的批評家說道：他們自己卻已表示其不能同化於革命的有組織的計劃及其嚴格的紀律精神。另一批評家稱他們爲蘇維埃的「農民主義者」，借用昔日稱以農民政綱爲根據的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名詞。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特別是列寧的一派，對這種農民主義的傾向曾作最劇烈的鬭爭。

同路派的題材主要的是採取革命的事蹟。近年來文學上的最佳作品中有些就是這一類的著作，描寫革命的條件下之現代生活。特別對鄉村的生活作形容畢肖的寫真，並聽說寫得非常真確。有一個作者描寫反布爾塞維克的知識分子與舊官僚階級的生活狀況，其題名爲「白衛隊」。這本書的出版，是分期刊行的結果，沒有連續出版完，但後來把這故事編成戲劇了。這種關於革命初期的反革命運動之在舞臺上的表演，以後將予論述。但是

同路派如果繼續贊成革命，他們可在革命的一切方面選擇題材。同路派有開發俄國農民潛勢力的功績，這種潛勢力甚至爲前此描寫農民生活之最能幹的作家所不能見到的。「地主資產階級時代」的作家——如托爾斯泰、柴霍夫、或布寧——從來未能探索到這些潛勢力，這是共產黨人常說的。這類作家即藉描寫其新發現的農民特性成爲同路派，他們把這些新勢力或歸功於共產黨政綱，或祇視爲革命時代的產物。

據共產黨的批評家說，同路派文學的一般性質是具有深刻的「現時代建設精神」。事實上這派文學是對革命價值作總的重新估價。這派文學特別是以「積極主義」來代替「消極主義」的反映。表面的事態是其注意的中心點；且對地理上的區分，社會集團，與時事問題都作更細心的研究，以使用文學的形式把它們描寫出來。這是革命前的作家所不及的。總而言之，這派人使文學更接近於人類論、科學、與政論家的作品。另一蘇聯的文學批評家覺得甚至這班文學家所描寫的事情，幾乎時常都是可以用各種總名詞來命名的事情，例如「紅軍兵士」、「農民」、「烏克蘭人」、「宗派主義者」等等。這派作家又描寫「舊勢力與新勢力間的衝突，這些衝突的總和就叫做『十月革命』」。

革命前的俄國古典文學，在蘇聯的文學生活中仍有強大的影響；這是指舊制度遺傳下來而須充分利用的那些作品，在一切機關的圖書館裏，這些作品顯然是最能取悅衆人的。在莫斯科較大街市的書舖裏，及在每年定期陳列的街道書攤上，十九世紀的與革命前的舊版書籍售價都很低廉。時常有舊資產階級的家庭，因受經濟壓

迫，不得不拋售其藏書，而工人與新興資產階級則購買此等書籍。在鄉村的讀書室裏，若遇昔日地主家庭的圖書未被毀壞，則往往利用之，至少利用其一部分。曾有一個時期，對這種書籍嚴格限制，禁止許多革命前的書籍在羣衆的圖書館與讀書室裏採用；祇是如托爾斯泰一流的嚴格文學的著作得予採用。在托爾斯泰文集的通俗本裏所刊行的祇是文學上的著作。且在一切俄國古典文學的新版本中，著者的社會與階級的身分時常在序言裏很留意地加以說明。例如一個著名的蘇聯文學批評家對托爾斯泰及其著作作下列的介紹：

世人祇能按其目前利益所定的實用目的而相當接受他的概念。從他的堅勁辭句中，祇能採取其符合於生活的一般運動與羣衆的要求的一部分。人生是不能等待的，而且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畢竟不再相信懺悔與祈禱的力量，並不要再聽謙卑與忍受的宣傳。羣衆不願想望那種爲幸運的、貴族式的托爾斯泰的心靈所洞見的高尚目標。但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暴行、自私、與剝削的辭句，確是從誠實的心坎中發出。當他號召調和與消極抵抗的時候，事與願違，他的學說事實上散播了造反的種子，並激起仇恨的惡感。

十九世紀中葉的詩人嚴克拉索夫 (N. Nekrasov) 也大爲介紹，且其著作亦廣爲普及民間。當他死後的五十年紀念中，在真理報上差不多有一全頁專載評論嚴克拉索夫的文章。有一篇文章評論他是「怨恨與悲哀的詩人」，因他所描寫的是農民的受苦。他指出這個作家對十九世紀六十與七十年代的革命知識分子發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於馬克斯主義的布列漢諾夫也受了他的影響。許多其他的革命工作者，都承認他們得益於嚴氏不

少。另一個批評者指出嚴克拉索夫的偉大力量是由於他的著作之簡單與使一切人都可了解的體裁，「給貴族出身的詩人之浮誇的詩以致命的打擊。」巴克洛夫斯基 (Pokrovsky) 於一九二一年寫了一篇論文，巴氏是著名的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家，茲將其原文介紹於下：

嚴克拉索夫本身並未成為社會主義者，但他在其寫給知識分子的讀物中，知道如何喚起激怒的恥辱觀念於徒手做工的人們之前，於那些以粗糙的手來勞動而使吾人得在文學與科學中埋着一種已使許多知識分子變成社會主義者的意識的人們之前……在一九一七年中，俄國的知識分子對於勞動者奪取政權的回答是在藝術上與科學上怠工，此時他們已忘了嚴克拉索夫。可是在俄國的無產階級看來，這貴族詩人的恥辱意識，都是爲什麼無產階級應回憶嚴氏爲他們自己的詩人之一的另一原因。

在革命初期的幾年中，高爾基是一個接受新制度的文學家之一顯明的例子；雖他在革命前已常與革命的政治方面接近，但這還不一定使他能被認爲是這樣的文學家。彼時列寧與高爾基已有個人的密切關係，而且這個領袖對這作家有時稍離列寧主義的真正道路也予原諒。後來，高爾基退居外國，是因爲身體不好，並有人猜想也有政治的原因。他的筆頭所寫的文章，那時卻在蘇聯的報紙或雜誌上很少發表。但在他的六十壽辰將到時，他被選爲「無產階級作家的鼻祖。」在他答復一個高級技術學校裏的文學研究會問他是否爲一個無產階級的作家之信中，高爾基對「無產階級作家」這個術詞，按他的了解作如下定義：積極痛恨一切壓迫人類與阻礙其

能力之自由發展與長成的東西；並無情地痛恨寄生者、庸俗漢、傲慢者，與一切形式與一切種類的毫無好處的人。這封信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寫的，其結語是：

你們當然知道蘇聯所提的完全廢除武裝的計劃，已為在避免生靈塗炭的性質上信仰進化理論的文明人所拒絕了。我們必須了解並記得國際聯盟所表示的這種卑鄙怯懦，無非是歐洲文化的完全破產，並明顯暴露這種文化真正反人道的本質。假如你們要成為誠實的人，你們必定要做革命者。

一九二八年三月，高爾基回到莫斯科，參加其誕辰的慶祝典禮；這事成為一件大規模示威運動的基礎。工人與農民以及知識分子都來參加慶祝他的集會與遊行。他的著作之取悅衆人，特別是工人，已在各圖書館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對高爾基的慶祝都當作一件文化上的大事看；這次慶祝能哄動一時，甚至不能讀與不能寫的工人與農民都來參加，可見在最近數年來，文化上有顯然的發展。一個真理報上論文的作者，在他發表這種意見時，喚起讀者注意蘇聯還有許多半開化、無知與「流氓」的現象，這「文化的色景」各種顏色是很豐富的，但黑暗的分光線也是很多。但他看到「向來在各種工人俱樂部、教育與文化的晚會上，仍常有擾亂秩序的醉漢、鬧與流氓行動」，尙未在高爾基的紀念日發生，覺得滿意。

在此羣衆讀書的習慣漸漸發展之時，舊的古典文學也日益為衆人所愛讀。在蘇聯的報紙上載有工人的話，表示他們願讀與自己生活不同的各種文學作品。農民要讀技術上的書籍，比讀革命的政治書籍興趣濃厚。無論

何時，凡在參觀或注意到一個圖書館的時候，誰若問起舊文學書是否在讀者中廣為流通，則其答案時常是肯定的。在一個婦女治罪機關的小書架上，也可大致決定彼處所供給的讀物是何種性質；革命前的書籍比直接宣傳的革命文學書還要陳列得充足些。可用的讀物之有這兩種絕然不同的區分，就提示了舊的古典文學通行於民間的問題。

一種為新制度兒童閱讀的新文學書，已成為共產黨領袖之另一先入為主的辦法。舊的童話，甚至人類的故事，不僅認為無用，而且簡直認為有害；無論如何，這些童話是不適宜於蘇聯教育制度的綱領與一般的教育宗旨。在各書店鋪面的陳列中，可看見冒險的故事，革命時期的兒童英雄，以及列寧與其他領袖幼年時期的故事等書籍。兒童先鋒運動也己能出版小書，敘述模範兒童之偉業。有系統地準備兒童文學書正在長足進步中，但是尚在初期狀態。兒童先鋒運動的定期刊物，正以時常引人注意革命的英雄主義與革命的征取而埋着「思想的基礎。」無論在何場合上，對兒童也是一樣，文學是反映新制度並同時具有其獨特的意旨。當代的作家寫給兒童讀的是其校中的工作。無產階級的詩人台孟培德尼的著作特別介紹給兒童閱讀，並加以利用。在預備關於現代生活的題目綱要時，這種材料的來源是必須給兒童利用，甚至給低級兒童利用的。因為台孟培德尼不僅認為是詩人政治家——新生活的探求者與宣傳家——而且認為在他的活動中是循循善誘的。同時編輯教科書以助教員向兒童解釋這些作者，而且這種解釋常是馬克斯主義的。此外，教員又參考許多馬克斯主義者筆頭所寫特種

書籍與論文，以了解每個最重要的當代作家和整個當代的文學。

在論述蘇聯的報紙時，我們已申述大衆之參加新聞記者工作，如投稿壁報及加入工人通訊社、農民通訊社、紅軍通訊社等組織。當向壁報或向定期的出版物投稿時，工人、農民、紅軍、職員、學生與學童都被邀描寫他們所看到的自己團體中的一般生活。投到壁報或定期的報紙之稿件，有些具有真正的文學價值，並爲蘇聯的文學批評家在此觀點上加以討論。這些純正的作品，在其思想與內容上都是代表共產黨人所努力的理想，即是反映現代生活與在這生活中成爲生產因素的人們所創作的文學，向壁報投稿與在壁報內部的工作及通訊員的活動，都是由一切機關的文學研究所組織的。這些文學研究社又具有較廣泛的宗旨，幫助其社員研究與正確了解舊時代與新時代的作品。

無產階級的詩人已爲革命編出許多歌辭。在這方面，台孟培德尼又是其中寫作最多者之一。在各城市中區通行的一種歌曲叫做「小磚塊」。這歌的樂譜具有標本式的俄國低半音的調子，但同時能表現鬪爭與成功的精神。這歌辭的原文是描寫一個在磚廠裏做工的少女的生活。雖勞動條件困苦艱難，她卻一心一意求工廠與其生產的進步。別的人再添上新的與不同的辭句。有一段敘述小磚塊的歷史。這些磚塊曾爲資產階級用以建築工廠，在廠裏剝削工人，但後來工人奪取這工廠，並在戰鬪中把它毀壞了。於是工人們就用這些磚塊來作巷戰的障礙物；當他們在反對資本家的戰鬪中獲得勝利時，他們重新建造這工廠。因此，他們就對現在成爲建築自己工

廠的原料之小磚塊非常愛護了。此外還應注意舊式的俄國歌曲易達革命的詩歌目的。這就是指那種分段的歌辭 (chastushka)，這是一種通俗的、有音律的、與歌唱的小調，其內容是根據個人與個人間，或個人與團體間，關於日常生活問題的談話。這種歌的新歌辭也有大批編出，有些為共產青年團用的，有些是為紅軍用的，其他是為一般的工人農民用的。

其他各國的文學書，革命前的俄國讀者嘗藉繙譯得以閱讀，並且俄國的學者階級曾對西歐的著作表示很有興趣。在現今蘇維埃制度下的私人出版事業極受限制，繙譯外國書的選擇，都在政府與黨的統制之下來計劃的。技術上的傑作被這些黨政當局認為較國外資本主義世界的思想來得有用。技術上的著作，甚至屬於教育方面的，已繙譯得很多，但是介紹西方各國的文學作品於新進的蘇聯工農讀者都較為稀罕。描寫各國生活的一般著作繙譯得較多，但在此的選擇都是根據上述的蘇聯文學所定的目標進行的。好比美國的生活，則譯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書來閱讀，左拉 (Zola) 也是最通行的外國作家之一。

當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全聯邦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組織了一個國際的大會，到會者有四十以上的外國代表。龍那茶而斯基 (Lunacharsky) 在大會上對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如下的說明：

無產階級的文學應對已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的新人物作藝術的與綜合的描寫。我們的文學尙未脫離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的姿態。革命已把俄國的文學改頭換面了，使它更接近於寫實主義，並更接近於集體生

活的描寫。在去年一年中當代的文學確實轉向於社會的寫實主義，至於現在呢，在蘇聯這塊地方誰都可以飽覽寫實主義的散文。

這次大會根據龍那茶而斯基的報告通過了一個決議案，指出十月革命不僅使俄國文學保持在世界文學中的榮耀地位，而且「創造各種條件以使文學在形式與內容兩方均得新的發展。」這決議案又喚起注意烏克蘭的喬治亞的亞米尼亞的，以及其他的民族文學之值得注意的發展，這些民族文學是在舊制度下被人深思熟慮以阻其發展的。最後，在這決案上說到「蘇聯文學的偉大教育意義，這種文學首先把整個的共產主義觀點引用到藝術裏，而與無產階級的心理相輔而行。」

「藝術」一字將用在下面專指俄人所稱的「繪形藝術」，其所包含的首先是繪畫，這種藝術的應用，有特別簡直明瞭的特性以助革命；繪畫的藝術家事實上已動員起來，且無論如何是在所謂「突擊隊」的基礎上利用。這些藝術家在革命的初期曾畫出驚人的傳單與諷刺畫。他們裝飾各種慶祝會的會場，並在蘇維埃與其他羣衆集會的大會場牆壁上繪起各種圖畫。最後，他們在「煽動車」上繪起形形色色的圖畫；現在我們仍可在莫斯科街道上看見電車上飾以各種革命的圖畫與標語。在革命初期為宣傳用的繪起圖畫的列車，現在已不再用了，但這種東西足以代表繪形藝術在革命過程中的應用。

當革命的初期，因經濟恐慌，物質上大感缺少，以致藝術家的活動受嚴重的限制，這點應加注意。但不管這事

實如何嚴重，一大羣的青年藝術家自己投入煽動的工作中，並以其技藝爲新領袖們服務。革命的口號藉著色與繪形能使羣衆更易了解。

重要的各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大會中的每次會議用圖畫來紀錄，已成爲革命中行成習慣了的事情；繪畫與照相均得在此應用。領袖們的肖像繪畫也成爲宣傳技術之一種，雖共產黨的批評家曾攻擊舊派的畫家，說他們偏向於繪像，其本意無非爲貴族服務。

繪形藝術訓練的擴充，已有顯著的傾向。教育機關與學校的數目大大地增加，尤其是在工業的藝術方面。爲工人們辦起許多夜校。在工人與紅軍的俱樂部裏，研究繪畫的裝飾藝術的學社特別普遍。這種組織的本身又可使工人與兵士休息的住宅裝飾得五光十色。但尙未聽見無產階級繪畫家的出現。最後，還有革命的藝術家協會組織起來，其任務爲對革命，日常生活，尤其是勞動，作寫實主義的描寫。這協會的藝術家還要使藝術的形式成爲政論家活動的附庸。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獻身於宣傳的任務較諸傾心於犧牲內容以逐形式的爲多。在尙形派與「生產派」的衝突中，後者佔得優勝，其所號召的是創造有用的東西和適應生活的實際要求。

革命的藝術家協會是一全蘇聯的組織，且特別注意於獎勵各地方民族的藝術及利用各小民族的風俗以作題材。在一九二六年這協會的展覽會所陳列的一切圖畫，可歸入以下三類：「革命」、「勞動」與「小民族」。這展覽會中有幾張著名的畫，在他處亦看見過。表示勞動過程與勞動條件的最重要與最好的圖畫，爲職工會所

得，以陳列其特別的圖畫陳列室，或以裝飾較大會場的牆壁。時常在圖畫中明顯地寫着口號。一張引起外國參觀者特別注意的圖畫，題名為「資本主義的完結。」其中心人物為一個銀行家，他從自己的行裏走出，正要踏上樓梯預備下街。在他的背後是一個骷髏，拿着他的鐮刀，嗤笑這自信與自驕的資本家，因為在街上已擠滿了舉起紅旗的工人，正在等候他下樓梯為他們捉住，可是這趾高氣昂的資本家面孔向上，看不見下面的羣衆。從藝術的觀點上說來，這張圖畫並不特別好，但圖中的表情卻清楚而有力。

在蘇維埃的制度下，純粹藝術與應用藝術的區分應予消除，這種意見的發生，是因為注重生活的生產方面緣故。在應用藝術方面，即在所稱的「藝術工業」方面，革命已給以顯著的改變。這一門藝術也充分利用以作政治宣傳。例如在農民的家庭工業之刺繡工作中，誰都看得見現在所刺的是紅軍，不是從前各種動物一類的東西。小的雕刻常是農民家庭工業的產品，也以革命的圖形為雕刻的對象，或是各種的工人，或是著名領袖的面目。早在一九二〇年，即組織了第一屆手藝工人的會議。此次會議的目標是使這些工人作有組織的宣傳活動。例如在陶器工業中，革命的象徵或口號，革命生活的景象，以及革命首領的肖像，均選為畫圖的材料。舊的傳統的習尚已被摒棄，而蘇維埃的習尚起而代之。一個最古與最大的製造神聖的宗教圖畫的研究院，仍保持其原有的老職員，並保存其過去的一切技藝，但現在所製的已是非宗教的，且甚至是蘇維埃的題材。有些工廠製造各種棋類，把紅軍司令、工人首領、與農民充作新式的棋子；有一種棋把從前的「牧師」改作風車。

據共產黨人說，正當十月革命的時候，俄國的戲園是在藝術衰退的時期中。這種危機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有一種傾向，要破壞戲園已定的傳統，並有確定的反動，反對莫斯科藝術戲園所重視的自然主義。又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在政治反動的影響下，戲園力圖避免當時社會上所表現的輿論精神，而採取嚴格的非政治的路線。

首先的與直接的革命效果，就是把戲園向大眾開放。這多少是一種機械式的改變，是容易達到的。聽戲者以工人與新的公務員爲多，甚至在歌劇與舞劇場上亦是如此。從前的幾個國家戲園，包括歌劇戲園，雖在經濟困難中亦仍在繼續進行，視如革命爲工人得來的另一征取物。劇目則有些變更，有些歌曲與戲劇，因是宣傳舊的愛國主義，已被刪去。私人的戲園也獎勵其繼續維持，雖其中有許多戲園，如莫斯科藝術戲園，已大大縮小其活動了。但一般地說來，劇場的藝術家比舊制度的其他專業團體較爲優待，以供握政權的階級消遣與娛樂。教育人民委員龍那茶而斯基本身是戲劇的寫作者，這事實也是戲園能得優待的條件之一。他在事實上因從該委員會預算中撥出鉅款以接濟戲園，受人批評。可是他在對這些抨擊者的回答中指出劇場的重要，說它是接近羣衆的媒介。龍那茶而斯基既以教育人民委員的資格直接管轄國家傳藝戲園，他又替此等戲園辯護，說這些是「過去最好的戲園，它們無疑地應受國家另眼看待，視如戲劇藝術各種傳授之守護者。」

同時新的戲園亦已創辦。這些戲園稱爲具有「革命的創造的」性質。這些新戲園之明白確定宗旨，爲「提高戲園標準以供羣衆享樂，並於其因缺乏藝術的、文化的、與政治的價值而遭危殆時，以革命的方法澄清之。」所

以當革命的初期產生了一種直然稱爲「教育的戲園」。這種戲園的劇目中都是宣傳性質的革命戲劇。又因革命初期舉行多種慶祝，各種示威與遊行都以羣衆戲劇的形式組織起來。幫助革命的收穫之深入與鞏固，認爲是戲劇藝術家之一種公民義務。負起此種職責者之表演場所之一，爲在公衆的廣場與街道上及在各戲園與政府機關的大廳中所舉行的集體慶祝會。這種集體慶祝是積極的革命局勢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慶祝會的顯著現象，爲其大規模的與羣衆的性質。

直至一九二一年，當國內戰爭以後，蘇維埃政府對於戲園的政策纔得最後確定。於是兩種戲園間橫着一條鴻溝——國家傳藝戲園與革命戲園。後者之卓越的倡議者，爲前莫斯科藝術戲園的社員梅葉霍爾特（Meyerhold）；以此戲劇藝術家命名的梅葉霍爾特戲園，已成爲新方法與新概念最奏成效的例子。職工會也在戲園方面活動，設立戲園以專門的劇員出場表演，且在工人俱樂部中增劇藝社的組織。在文化的一般場合之這一部門的新舊競爭中，政府及黨的影響，較爲不直接施行。這兩個營壘相對時的區分，經雙方內部各起變化後，不久即已趨於消滅。這種變化是按引導戲園走入文化革命的總任務之政策方針而行。龍那茶而斯基最近在共產主義學院的報告中，述及這種關於戲園的政策。此處所引的祇是這報告的摘要；但這摘要已能指示這政策所根據的主要立場：

龍那茶而斯基同志認爲一切藝術的戲園，是對羣衆思想影響最有力的武器，他指出無產階級不能而且

不應放棄這武器，它是以教育工農，使敵人解體，與引導小資產階級分子到自己方面爲目的。戲園就爲着這些目的，應成爲最好與最深刻的宣傳者，把內容與藝術家的印象主義之一切方法打成一片。

這種政策一部分由教育人民委員會中的主要劇目委員會助其施行，這劇目委員會是輔助的檢查機關，並對一切戲園的劇目，包括電影，加以統制。這種委員會共分二部，其一部管理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國立戲園，而另一部則管理一切其他戲園。批准了的戲劇或電影列成各表，並把這些表每二星期分送一次。表中又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列入無條件批准的戲劇，而第二部分則列入批交地方當局判決的戲劇。表上並載有被禁止的戲劇。對劇目總委員會的作用之正式討論，足以表示此種政策的一般觀念。取材於沙皇時代最後數十年之事蹟的歷史劇，得予批准的祇是那些思想路線尙不歪曲太甚且至少有相當的革命性質之戲劇。在所謂的「蘇維埃趣劇」中表現一種不健全的傾向，劇目委員會利用其統制權以與此等傾向鬭爭。例如，譏刺劇雖認爲是一種極有幫助與必需的東西，但劇目委員會遏止任何在「少年蘇維埃公民觀念」的譏刺劇的假面具下之祇開玩笑的企圖。

對戲園的政策，又得教育人民委員會之政治教育部經過其特設的藝術股作進一步的推動。這藝術股特別注意於指導農村中的工作。一般地說來，這一股的職務是組織地方的工作，特別是在演戲方面。並使戲園與觀衆更能接近。在劇藝方面的統一政策，業已埋定基礎。教育人民委員會出版一種雜誌，從前的名稱本是「戲劇藝術家與觀衆」，現在改成範圍更廣的名稱「蘇維埃的劇藝」。最近又刊行了一種特別的雜誌，叫做「鄉村戲園」。

最後，舞臺訓練所在政治教育部的管轄之下成立起來，其目的爲增進以及指導一切鄉村的劇藝工作。

從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戲園，當初大都繼續沿用他們從前的劇目。某些藝術家對於某些劇中職司的扮演似有反映革命事變的影響。例如在莫斯科藝術戲園青年劇員的技術室中，這種趨勢特別顯著。可是等到一九二六年，莫斯科藝術戲園纔把根據革命事蹟的戲劇排入劇目中。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成爲戲劇界的大事，並引起大大的討論。甚至在最後一次的預演中，這種戲劇是否許其排演還成問題；檢查的當局堅稱，在頒給最後許可證以前，這劇還要作相當的變更，而且政府當局與共產黨批評家又對寫劇者與演劇者對革命的解釋大起攻擊。這戲劇的原名是「白衛隊」，但祇許其稱以無意義的劇名：「都平家庭時代」(The Days of the Turbin Family)，劇中的主要角色是在烏克蘭作反布爾塞維克運動的官吏，表演他們爲着一條無希望的路線作鬪爭，但演得使人憐恤的樣子。共黨的批評家馬上起來攻擊，說這劇犯了歷史上的錯誤，堅稱「在目觀與參加國內戰爭的人們看來，在見到過白衛隊墮落的真面目的人們看來，在廣大的勞苦羣衆看來，首先是在我們青年人看來，這齣戲是荒謬絕倫到不能容忍的。」這戲劇所以受責備的原因之一，是它「把白衛隊概念化了，且在舊的官僚階級的周圍罩着一道調和的神怪光輪，可是這種官僚曾被歷史與革命的無產階級處以殘酷而公正的刑罰。」

這齣首先在莫斯科藝術戲園以革命的題目排演的戲劇，參加的角色完全是該劇社的青年劇員。共產黨的批評家在他們的評論報上所說的下列一段話，就對他們而發的。

「這些青年生力軍的任務是與加在他們身上的不正確的影響作鬪爭，並要在戲劇題材的選擇上求得進步，把這些題材正確地解釋出來，且把他們從老劇員所學得的技術應用於純正的革命的當代生活上的各種任務。我們的戲園的任務是要從這含有啓迪性質的戲劇界大事做出審慎的結論，以求在劇藝上反映蘇維埃時代的工作更進一步，時常力求技術標準的提高，而同時又要適應正在發展的革命的廣大的觀劇羣衆。

但這齣戲劇證明了偉大的成功，並在莫斯科藝術戲園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劇目中佔了很大的地位。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計劃書中，這劇仍是繼續列入。

莫斯科藝術戲園又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劇目中，加上第二個革命的戲劇：「第十四——十九號鐵甲車。」這劇是取材於同名的小說，作者爲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他是最著名的同路派文學家之一。一個共產黨的評論家，對這齣新劇作如下的分析：

藝術戲園對於革命戲劇的編演來得非常緩慢，至於這種戲劇的正確表演，更是特別欠缺。按它的能力看來，表演原始的農民運動比較表演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來得好些，「鐵甲車」的表演，足以說明莫斯科藝術戲園正在誠懇地選擇能鼓動新的蘇維埃觀衆的題材。

莫斯科一個大工廠的共產黨細胞與工廠委員會組織討論會，討論這戲劇，並邀請這戲園的代表參加。據共產黨報紙對這次討論的紀載，工人們議決：演劇者能正確地表演日趨死亡的資產階級，甚至對農民的表演亦佳。

但他們在工人的領導問題上演得比較不好。但是這討論會的意旨是：「正在勃興的，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而獲得強大力量的工人階級，能成爲加強藝術戲園工作之新的與堅強的原動力。」就在這個基礎上表示了如下的意見：藝術戲園應得工人的同情的扶助，而工人們取此種態度可使藝術戲園成爲自己的戲園。藝術戲園的代表在會場上所說的話，據該報的解釋是表示「接受十月革命，並努力與正在世界史的舞臺上表演的新階級作更密切的聯絡。」

在歌劇與舞劇方面，除了從前於歌劇節開始時舉行的「爲沙皇慶壽」現在不再舉行外，劇目無甚變更。例如「爭取赤色彼得格勒」還與「婆里斯戈杜諾夫」(Boris Godunov)在歌劇的佈告上並列起來。但從藝術家的觀點看來，具革命內容的歌劇並無特異的成績。可能的例外是「十二月黨」這是根據共產黨指爲革命事蹟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事件的一種歌劇。還有一個通行的新歌劇，名爲「兵士伊凡」宣佈排入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冬季表演的。對這些革命的歌劇與舞劇的詳盡評語未曾看見。共產黨的報紙祇時常批評說：歌劇與舞劇尙未適應新時代與新時代的概念。

新的革命戲園之目的，可總括如下：第一，以實驗爲目的，在劇場的佈置上確按科學方法。這種工作特別在梅葉霍爾特的「作場」中進行着，並在他的戲園的舞臺上表演。吸引聽衆更積極注意劇情之設備也已經佈置起來。第二，以創設獨立的無產階級戲園爲目的，假手於俱樂部中的工人劇社或鄉村讀書室中的農民新劇團，並最

後假手於實際上在一切較重要的紅軍單位裏形成的戲劇研究社。所謂「無產階級的戲園」是要再在革命紀念節中採取羣衆化裝與狂歡的形式表現出來。最後，要創設一種通俗的革命戲園，其所演之劇使羣衆能夠了解。在這一方面，職工會須爲組織的因素，他們且得專門藝術家的幫助。

莫斯科職工會戲園所表演的「浪潮」，可選爲革命的煽動的代表劇。劇中共有十二種插話，都是表演革命的鬪爭與其最後勝利。這事情是在小的省分裏的市鎮發生的。這戲園又排演一新的戲劇，叫做「叛變」，以紀念革命的十週年，這戲是根據在烏拉山發生的一種國內戰爭的故事。戲園的主任在接談時指出：關於適合階級鬪爭原則的問題，無顯著的成效可說。他又補充說，戲園的任務是提起一種純正的「革命的感動力」，指示那些爲在蘇聯廣大面積的較邊遠地方鞏固蘇維埃威權而仍須克服的困難。劇中的主旨是爲着一個概念，即社會主義而鬪爭的團體鬪爭。這主任又解釋說，這戲劇的目的是以描寫紅軍的初步發展以促進軍事的準備。

莫斯科革命戲園是在莫斯科蘇維埃直接領導之下，且有政治部以選擇劇目；這戲園的目的是「對來自羣衆間的聽衆，作廣大的社會的與文化的訓練，以共產主義思想的精神，擴大他的革命自覺性，其所用的方法爲創造在戲園中所能辦到的活潑的與一般化的表演形式，這些是包羅多方面的現代生活與革命事蹟的一切形態之寫真。」思想的內容時常使藝術的形式受犧牲，但所努力的是使此二者作正確的聯合。這專門的革命戲園在事實上已至少施其影響於莫斯科的無產階級羣衆，這是無疑的。在至一九二五年止的兩年生存中，莫斯科革命

戲園分給工人、紅軍兵士、與相當數目的農民之免費戲票約達十五萬張。此外，還約有三十萬人經職工會的介紹得到折扣的票子。

誰若要明白最大與最好的革命戲園——梅葉霍爾特戲園——所佔的地位，便可看一看最近紀念革命十週年的新劇「蘇維埃的鄉村」。這齣劇的主要內容是無產階級革命對農民的影響。同時藉戲園的作用，城市也得聽到鄉村的呼聲。全劇包含連續的一套寫真，具有統一的題材，即蘇維埃的鄉村；且具有統一的姿態，即建立新生活的快樂。所注重的事物是農業機器化，穀類的輪種，電化，鄉村共產青年團員，掃除文盲的鬪爭，學校的工作，十月的洗禮，農婦的公民生活，紅軍的兵士，鄉村工人學校的畢業生，鄉村的無線電，鄉村的戲園，公衆衛生，蘇維埃機關的缺點，農民與保護蘇聯，以及私有財產本性的逐漸消滅。

某些新的方法也用於這新劇裏，以獲得最大的政治效果。不僅戲園的全體劇員，而且技術學院的學生，這戲園所扶護的兒童先鋒隊，以及一羣從前無家可歸的兒童，都引導到劇場上表演。電影也在劇中用到，特別是在表示新舊社會的區別時。梅葉霍爾特說道：

這劇將在經常的劇目中繼續排演，並用以經常啓發工人聽衆去扶助新的鄉村。同時，將取相當步驟使此劇爲農民所歡迎，以便向後者指示無產階級獨裁的十年中爲農民做些什麼，並因此加重說明採取社會主義原則的有利。

俄國舊的戲劇名著中許多種爲革命戲園所改削而予以排演。據一般人所深信不疑的，舊劇所能起的最好作用是助成新的創造活動。因此，過去在文化上已有的成績，不僅是要去作消極的摹仿，而且要抱批評的態度去把它改造，以適合新的熱望與目的。渥斯脫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的「森林」改成革命劇後，與原文大有出入，幾乎辨認不出了；但這舊改新的劇本似乎能得聽衆歡心，甚至能得其中頗多的少年分子之歡心。

戲劇研究組，在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兵房與學校中有廣大的組織。據一般估計，這些研究組有幾萬個。俄國人特別歡喜演戲並長於戲劇的表演方法；甚至在不識字的農民中，演戲常常是很通行的，且許多農民歌曲原來有戲劇的成分。共產黨人相信演戲是喚起一般創造力的工具，不僅是羣衆的戲劇訓練，而且是一般政治訓練的基礎。在這些戲劇研究組中，有時劇本爲組員自己寫成的；這些戲劇的預備是戲劇研究組各項活動之一。但是較普通的還是本地的業餘劇員團體排演外面供給的劇本。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等幾個團體準備了劇本，以供各種戲劇研究組應用。這些劇本分門別類地編起，並可爲蘇維埃日歷中各革命紀念日慶祝之用。這些戲劇坦白地稱爲「煽動的戲劇」。專業的藍衫團或業餘團體在工人俱樂部、紅軍兵房與鄉村讀書室所表演的「活報」，是劇場的另一應用，並爲演劇的另一方式，這在論定期出版物的一章中已予論述。

一般人相信新戲園的創設，需要劇員，尤其是劇員的整個團體，受基本的訓練。第一，新的劇員必須置身在「劇中的生活」，並因此學得生活的實在法則。「新派的劇員探求自然的健全動作，其所謂『表情』是演戲者

之心理的與生理的科學的必然結果。」——這是一個共產黨批評者在討論這題目時的評語。在一切關於新戲園的討論中，都注重所謂「自然複演力。」

新的演劇方法，以「吸引聽衆深入戲劇的筋骨」爲目的。因此，戲園須訓練大衆也能表演自己。用以達到此目的之一方法，即分派一羣劇員站在戲臺前面原爲奏樂用的場所。於是，這羣人成爲觀衆與臺上的演劇者間之連鎖。劇員轉過身對着奏樂所的「常人」說話，就等於以自然的態度向座中的聽衆說話一樣。另一方法，則爲從戲臺上或月臺上分散傳單給觀劇者，稍停演一些時候，以便這些傳單收拾起來並爲大衆閱讀。革命的劇場佈置之另一現象，爲廢除化裝，使演劇者是一個普通的常人，不沿用習俗所尙的與人爲的假面具，使觀劇者對他不敢減少感動的力量。又以講臺的佈置來替換私人房子的心理與經驗，使劇員能更自由地表演。或把聽衆的座位都用十足的燈光照着，使戲臺與聽衆座位間無顯然的界限。有時完全廢除布幕。戲劇界中所謂「左」傾，如文學界中的未來派一樣，注重演劇的各種門檻與奇妙，而其結果則失卻內容的實質。這並不與現代的精神相脗合，且在後者的影響之下這些極端的方法漸歸廢棄。

革命戲園中之另一實施，則爲請求聽衆表示其對於劇中所表演的觀感。各人分給一張表格填寫，每個聽戲者須回答表中的問題，並因此表示他對於戲劇的內容，劇員的表演，與戲園的一般政策有何意見。至若在職工會管理下之戲園，莫斯科的工人通信員都被邀批評戲園的工作，特別是敘述一般工人的意見。提議排入劇目中的

戲劇，須預先由戲園的經理召集被選的一羣工人通訊員共同討論。「有組織的聽衆」即藉此種方法得臻完善。若把傳藝戲園的聽衆與革命戲園的聽衆互相比較，則亦頗饒趣味。莫斯科藝術戲園的聽衆，顯然是新舊的知識分子與「簡單的住民」；實際上在這種戲園的客廳裏，人人都會自覺彷彿回到革命前的俄羅斯一般。祇在歌劇與舞劇中，可見到少數男女工人。在另一方面，在梅葉霍爾特戲園或職工會戲園裏，則有許多工人積極地回答劇場上所表演的一切，並於休息時間在客廳中表示另外一副景象。因爲聽衆的「工人化」是蘇維埃政策目標之一。各職工會得到減價的戲票及大批免費戲票。縱使這樣做法，聽衆中的工人比數，甚至在革命戲園裏，仍不甚大。但是有組織的聽衆是幫助戲園找到新路徑的一個方法；希望這些工人聽衆將使戲園能爲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路線而服務。

戲園之發展到龍那茶爾斯基在共產主義學院的報告中所指示的理想，龍氏也承認是一件緩慢和困難的任務。他自己也反對把蘇維埃政策中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用到戲園文學與藝術方面，反對用直接的與強硬的手段以作中肯的企圖，以解釋他自己的話。舊的戲園已完成美滿的技術，並已是寫實主義的。新的劇藝，正希冀其逐漸發展，其目的是在劇場上反映現實。龍那茶爾斯基在與一個著書論蘇聯戲園的英國作者之談話中說道：「我們用戲劇、趣劇、諷刺劇以譏笑過去遺下而爲吾人所仇恨的一切，而同時亦以之揭發新制度的缺點。」

第十五章 無線電電影與音樂

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從過去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武裝遊行中所得的經驗，證實了控制一切交通工具的重要。所以在其奪取政權的綱要中。所有的無線電設備是其首先要奪取的對象之一。大的廣播電臺當時用以向全國各地宣佈京城中的大事，且推而廣之，向全世界宣佈俄國的革命。他們毫不延宕地注意無線電的發展，其理由實有數端。世界革命的目標提示了無線電訊的極廣大用途，其發電時的稱呼爲：「給全世界的人們。」在無線電上已無國界存在，並且相信至少有些電訊會傳達到各國工人羣衆的耳朵裏。在他們的本國裏，無線電訊的應用可使無法通信的地方得藉此傳遞消息。電報與電話的交通網尙感不足，且僅限於大城市；而革命中的擾亂又把許多這些交通電線毀壞了。國內戰爭的發展，要維持各革命政權已成立的區域間之聯絡，不得不跨過敵人的區域。後來用慣了，常藉無線電發出一般的訓令，甚至特殊的命令，又從莫斯科與列寧格勒中區傳遞成功的消息給各城市的共產黨團體。革命的目標與方法是要引起羣衆的行動，所以必須盡可能地給大衆週知，且無祕密的必要。

當革命在軍事的與政治的戰線上均得最後的勝利，並能轉向其注意力於文化戰線時，無線電交通的實施

與其機器已頗發展。包羅全蘇聯的強力廣播電台與分站的建設計劃即加考慮，在大規模無線電網中的首要電台單位且已建築起來。（據一般估計，一九二七年蘇聯共約六十個廣播電台。）在已經厲行的文化革命中，無線電也是幫助解決羣衆間廣大的文盲問題；甚至那些不能閱讀的人也能藉此聽知一切。一般人相信無線電可爲發展識字運動的刺激物，從無線電得到的觀念能提起一種興趣，以促進閱讀報紙的願望。無線電在煽動與宣傳上確有無疑的價值。

曾有一種希望，欲於一九二七年在蘇聯的每個鄉村均有無線電收音機的設置，藉以紀念十月革命的十週年。據官方報告，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全國僅約二十一萬三千架收音機，其中不到十分之一是在鄉村的。按蘇聯的法律，一切收音機須向當局登記，並須繳納登記費；所以很有可能，大家都是沒有登記的，且其數目必超過官方的統計。最近有一個作者估計，收音機的裝置或許多至五十萬。可是，甚至這個數目仍爲共產黨員自己認爲很低，因與他國的數目比較及與發展無線電的計劃與努力比較是如此。我在距莫斯科三百哩內的一羣鄉村，共參觀一個星期之久，祇看見一個無線電。這是一個小的礦石機，爲一個鄉村小學教員所有，且裝設在他的房子裏。用這架收音機祇在很集中注意力時纔可聽到莫斯科。有人告訴我：有一架旅行機時時拿到這一羣鄉村的中心公社。

技術上的困難阻滯了推廣無線電收音機至鄉村公社的計劃。電力的缺乏，使這問題成爲一個難問題。而且

蘇聯工業所造出的收音機品質很壞。蓄電池的困難與機器的經常損壞，使農民對無線電失了信仰。農民的通信員寫道：幾個星期以後，「我們的揚聲器沈默起來了，」而農民對於徒耗金錢於不妥用途，大感不平。這問題引起了一般人覺得採用較簡單的個人的礦石機爲妥。至少爲目前暫時計是如此。爲使無線電普及起見，有一種有組織的勢力。「無線電友」是一種較不嚴密的組織形式。在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甚至在紅色紀念處或學校裏，都有無線電研究組。組員煽動民衆裝設揚聲的收音機並爲此目的共同捐款。他們又研究無線電的技術，或者他們自己製造一個簡單的收音機。最後，當局希望他們能把一切對工農的宣傳品的大意編入無線電的節目中，同時爲向工農解釋與剖白節目內容的媒介，因此，他們是「有目的」利用無線電的宣傳家。爲這團體刊行了一種雜誌，以增進他們對於廣播無線電的興趣與知識；雜誌中有節目的宣告與關於這些節目的一般討論，又這刊物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啓發無線電聽衆的正確「思想。」

莫斯科兩個廣播大電臺就是共產國際的與蘇聯商業僱員職工會的電臺。後者爲莫斯科職工會城市蘇維埃與莫斯科省職工會所享用。共產國際的電臺是二者中的較大與較活動的一個。每星期的播音節目都在一切報紙上宣佈。星期日的節目從早晨起整日地播音。一星期的其他各日從下午四點鐘起開始播音。星期六則停止播音。每日由「農民報」或「工人報」費了一點鐘時間摘錄本日的消息。無線電友社擔任經常播送世界語課程；這種語言爲蘇聯的無線電熱心家選爲無線電交通的國際語。每星期有一天規定一點鐘用世界語播送「國

外消息。」所播送的音樂會，稱爲「農民音樂會」或「兒童音樂會」但也有普通的音樂會。所播送的講演辭都是關於下列一類題目：動物的結核病，養馬術，蜜蜂的病，或人類的神經系——把講演題列成一表，宣佈在某一星期播送。然後播送有確定範圍的政治談話，論述下列一類題目：「美國的職工運動」或「紅軍的國際重要性及其任務」這是隨便從一星期的播音節目中抄出來的題目。又對各地職工會的委員會播送消息，如在選舉的時候，則播送選舉的經過，以及其他職工會活動的消息。再有關於合作社的組織及一般經濟問題的講演。

在這些無線電節目中，常把克列姆林宮裏一個塔上的大鐘所敲的正午與半夜的鐘聲包括進去。聽說各省的聽衆對節目中這一點表示特別有興趣，因爲這樣使他們感覺到他們與蘇維埃制度的政治中心常有接觸。當局的政策認爲：組織特殊的技術室以播送特別爲各省分準備的節目，不如把莫斯科的時事中選擇最好的來播送。一般人相信，用這方法可使播音的質量改善。這也能幫助傳播所公認的蘇維埃制度中的文化及政治中心的影響。最初的實施方法，祇把莫斯科街上的市聲播送出去，以給各省的聽衆覺到活動中心區的目的前生活狀況。在其他大城市裏，還有各地的廣播電臺。這些電臺的節目尙無何等保障，但可臆斷他們在大體上是根據莫斯科各電臺的節目而定。莫斯科節目的轉播送，祇留爲特殊的紀念與臨時事件應用，但一般人希望將來得廣播與轉播的幫助，能使莫斯科的播音在全蘇聯一切地方都可聽到。

在各大城市中，廣播與擴音都在各特殊的紀念中廣爲應用。從各廣播電臺到各較大工人俱樂部的直接通

電制度正在莫斯科採用，並預料在其他較大城市亦將採用。用這方法，可使各領袖在示威遊行與蘇維埃的特別慶祝會中的演講辭能爲更大的人羣所聽見。最後，有人閱到一個計劃書，要使在革命的幾個大紀念日中於列寧墓發出的演講辭能爲蘇聯全體民衆所聽見。最近莫斯科的報紙載稱，在紅場發出的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演講辭已在丹麥聽到。

工農監察員最近調查了無線電廣播公司，這公司有出售無線電器具及組織廣播電臺的專利權。這個托拉司不僅虧空很大，而且在業務的管理上很不像經營事業的樣子，並犯了蔑視業務之罪。結果，這公司被解散。黨中央委員會的鼓動宣傳部於是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這無線電的問題。曾有幾個改組廣播事業的計劃書，在一切建議中都特別規定黨的思想領導，因爲過去的組織在其播音節目的內容上也發覺不滿意。但是對於應否成立全蘇聯的組織，各有不同的意見，結果就附設一個經理處於蘇聯人民委員會常委執行秘書處。這個新的政府機關，須更細心研究無線電的聽衆，並根據所研究的結果準備播音節目。同時，須在草擬各種計劃與節目時得各種政府機關及其他團體的合作，特別注意於在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裏促進集體的合聽，並因此須注意更有系統地分配無線電收音機的組織工作。

電影或用通行的半官的俄文縮寫稱「慶諾」(Kino)，它是特別有用的，是政治教育的捷徑。列寧曾有一次對教育人民委員會發表意見說，「我相信在我們所有一切的藝術中電影是最重要的。」有一個國家的電影托

拉斯，或國家電影(Goskino)。蘇維埃電影(Sovkino)則是製造與開演蘇聯影片的國家企業。教育人民委員會有一部專管影片與映演電影的各種業務。在最近一個討論影戲園問題的省代表會議裏，有該省教育廳的電影部代表及政治教育部的代表參加。工人俱樂部需用影片很多，並在這省的地方會議上該省職工會的所謂「文化委員會」也派代表參加。

當革命起初的幾年中，除了簡短的新聞片外，實際上並無蘇聯影片的製造。在影戲園中，從前都是演映外國片及少數在十月革命前製造的舊俄影片。外國的影片實際上壟斷了蘇聯的電影界，雖然這些片子被認為思想上爲蘇聯觀衆所不能接受的，並在政治上常是墮落的。直至一九二三年，纔有所謂國家電影組織起來。不久即有蘇聯影片出來與外國影片競爭。至一九二六年，在蘇聯開映的電影共分三種：外國影片，新的蘇聯影片，及所謂「教育片」。影戲園則分成兩大類：由「國家電影」以經商取利性質開辦的大電影「宮」；及在工人俱樂部於娛樂節目中表演的電影。

爲解決推廣電影機到鄉村的問題起見，政治教育部於一九二四年成立一個特殊的電影部。這新部門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創立一種標準的電影機，可用於不易得到電力的鄉村。又一個簡單的電影機須能爲全區的鄉村服務。所以對於鄉村觀衆的需要與嗜好，又加以研究。最後，在鄉間開始作一種有組織的宣傳，以傳播各區自備一架電影機的觀念。根據鄉村生活的影片都有準備起來，相信這些是特別適用於農民觀衆。在一九二七年，約有一

千五百架電影機在鄉村公社中映演。這還認爲是很少的數目，且又覺得適用於鄉村的好片子還沒有製造出來。鄉村常祇得到在城市用損了的舊機。

在一九二四年，蘇聯所映演的影片祇有百分之二八·五是所謂蘇維埃的片子，其餘都是外國片。在一九二五年，其百分數增至三十，且蘇維埃的片子較外國片仍繼續增加。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外國片仍在商業的戲園裏繼續佔優勢，但除了幾片趣劇及某種教育片以外，沒有一種外國片不被修改與改變而能拿出表演的一個特殊的影片鑒定局，叫做「政治出品部」，專司採用外國出品在蘇聯表演的責任。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劇目部有審定影片及戲劇的立案權（其方法已在上章論戲園時討論過了）。對蘇維埃的影片有一特殊的藝術蘇維埃管理電影，這機關附設於政治教育部，它對影片內容作思想的指導。在一九二五年約有三百種影片送到藝術蘇維埃審查，其中審查合格的不到一半。據委員會的報告，這些被審查的片子的大多數，或是「無政治常識」或是它們沒有聯繫到社會的題材，或是它們純粹是煽動性質，此外是完全無藝術價值的。在審查合格的影片中，六種是關於工人階級的鬪爭史，十一種是取材於國內戰爭的片段，九種是描寫當代一般的社會狀況，十四種是描寫鄉村生活。六種影片取材於各小民族的文化與風俗。教育片共計四十六種。祇有兩種片子是屬於開墾或探險的一類，八種片子是趣劇。其餘約有四十種顯然是無類可分，並歸併一道，冠以「其他」這總名詞。

在一九二七年蘇聯電影的會議上，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主席克魯濬斯卡翁致開會辭。她加重說

出許多人把電影祇看作一種簡單的娛樂方式之錯誤。她又指出電影可爲很有害的，也可爲很有用的；以此種巧妙的技術，不僅能反映事實，且能曲解事實。她說明：「資產階級」用電影的技術來曲解事實，以在羣衆間進行其宗教的宣傳，或宣傳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她堅持說：美國與西歐已有的高等技術當然必須利用；但在蘇聯電影中，必須含有極不同的思想內容。因此，她解釋說：「蘇聯電影必須準備並表演能幫助觀衆更深刻了解革命關爭的事實與概念的各種影片。」

因爲對電影的任務會有廣大的討論，莫斯科的「農民報」亦舉行一種新的開會形式，討論「鄉村中的電影」。這討論會的主要材料就是幾個著名的領袖所寫的幾篇短文，回答自鄉村寄來的不滿意於影片的性質及其映演的浩大費用的信札。這次討論的目標之一，是要定出什麼影片是農民所歡喜的。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政治教育部之一個負責的工作人員，米舒梁各夫（Meshcheriakov），關於電影有下列的統計材料。他估計蘇聯鄉和區的數目共有三千。當一九二七年，這些鄉區所有的固定的或移動的電影設備不到一千所。所以在鄉村公社裏，每九萬二千居民可有一個電影中心區。有幾萬鄉村的農民從來沒有看見過電影；在有些鄉村裏，每月演電影一二次。在另一方面，有二千架電影機，因需要修理，擱起不能用。另一作者提起下列事實引人注意：約在五十個小城市裏，三百個城市性質的居所，與二千個農業中心區，沒有電影機，至於佔龐大百分數的農村，更不必說了。但按另一參加討論的人說（他自己是地方農民刊物的編輯員），列寧曾經說過：一種好影片可做幾千宣傳員的工作；

說：蘇聯電影是傳達黨與政府的口號到農村的最好工具之一。據一般估計，在一九二七年看電影的人數，全蘇聯共有二萬萬人；而幾種影片，如「巴椿金巡洋艦」看過的有二百萬人。

一類民族的企業，如朱瓦舒電影（Chuvash Kino）或烏磁培克電影（Uzbek Kino），亦已開始。因人才與財源的缺乏，這些地方集團，在方法上是很多業餘嗜好的性質，且大致是失敗的。激成這些地方局部努力的原因，是因那些人相信「國家電影」沒有充分注意到利用各地方的生活狀況來編蘇維埃的影片。同時又發表意見說：在電影方面的中心工作人員，並未完全實現電影是對文盲特別多的落後的小民族之最易了解與最易達意的藝術形式。

在蘇維埃影片的一張很長的名單中，我祇能看到少數的幾種。「小紅魔」這影片已在論述兒童先鋒的一章中描寫過了；這種片子描摹國內戰爭時期的兒童英雄，具有明顯的宣傳目的。其他蘇維埃影片時常加重說明各種革命的口號，我多看了這種片子就覺厭煩，因不斷的宣傳，似欲避免而不可能。「巴椿金巡洋艦」大概是技術上最有成績的片子，且是蘇維埃影片中最著名的。這片取材於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黑海艦隊暴動的歷史事實。我於一九二六年夏同一羣美國人看了這個片子。觀衆除於看至舉起紅旗時外，並未表示特別的熱情。這片子為外國的消費者用時，稍有變更；哥薩克隊向羣衆開槍的景象略有減少，尤其是對小孩子描準的地方；在兵艦裏於暴動中殺死教士的一段，完全刪去。我在紐約看這片子的時候，覺得此處觀衆比較莫斯科的觀衆表示更多的感

動與熱情。解釋此種現象的理由，或許是因莫斯科觀衆有許多親身經過革命的事蹟，並參加如銀幕上所演的鬪爭。名叫「手槍與十字」的影片，其主旨爲替外國「資本主義的」政府服務的天主教教士所作的偵探活動，又有幾段片子是最具寫實主義精神的描寫猶太人在舊俄制度下的暴動。

若把莫斯科觀衆對「手槍與十字」的革命影片及對杜格拉斯法彭克 (Douglas Fairbanks) 的「零分」所起的感想互相比較，則可知道他們對後者有較大的熱烈情感。這根據革命事實的片子，動作是很豐富，且在技術方面，這蘇維埃的出品也是絕妙的。但這蘇維埃的出品，每段片子都有政治宣傳呈現出來，而毫不迴避。看到常可譯成目前流行的口號之影片中的最高點的時候，羣衆表示非常冷淡。當觀衆鼓掌時，很不自然，祇很少的幾次纔有由衷的笑聲。在另一方面，「零分」的觀衆很敏覺而積極，時常發出大笑；且旁觀者亦得明白覺察其娛樂的精神。凡自覺地看到了很多蘇聯影片的局外人，都覺脫離政治宣傳，是真正的休息；一般的觀衆似乎也是同樣反感。

科學片或教育片，已由蘇維埃政府使其廣大的發展。當一九二六年，這種影片已經有二打左右，原定的計劃尙未完成。關於這些片子，我所看到的祇是「戒酒」、「勞動」和「健康」。一個因飲酒過多而死者的致命情形，在銀幕上表演得非常詳細。有許多片子說明飲酒對於健康的影響，且特別說明對於工作能力的影響。這些片子都有佈景來補充；有一段稱爲「一個貪酒的汽車夫所見的一切」，是影片中佈景很有成績的。其他的片子表示

狂飲前後舉鐵錘力量的測驗。最後，映着一種酒後的瘋狂動作，此片的結束是嗜酒的父母所生的癡子及因飲酒而妨害衛生的幾張影片。其他的影片是用以宣傳預防肺病與花柳病的。這些教育片差不多專在工人俱樂部，鄉村讀書室，或類似的關機裏映演的。欲使這種片子推廣到商業性質的電影院之努力，大體上已遭失敗。一般人相信，此種影片得政府的統制，能保護其不致有非科學的濫用。

「電影晚會」是工人俱樂部或鄉村讀書室中更通常的活動。往往在一次政治性質的報告或討論之後，宣佈演電影以作結束。在演講所的四周，可看見工人在外面企待着電影的到來。俱樂部的管理員不得不增加電影晚會的次數，以滿足其會員的此種需要。但是這種趨勢，受人批評；且在一次黨的代表會議中，把電影列入議事日程以爲討論的主題，並通過決議案說：工人俱樂部不應變爲簡單的影戲園。

當一九二八年的三月，電影的性質與用途之整個問題提出作詳細的與有權威的討論。國家電影托拉斯受了檢查；雖這托拉斯能以其商業的利潤示人，可是它並沒有遵循黨的指令，或依據政府各機關的政策而定其自身的政策。在去年十一月紀念革命十週年時，蘇維埃電影的政策成爲令人注意的問題。在那時候，電影托拉斯不去集中到蘇維埃的影片以作爲自身對革命紀念的貢獻，而主要的拿出外國的美國的影片來演。共產黨的記者及領袖們鳴不平地說：莫斯科幾個大影戲園，不去演映「巡洋艦巴椿金」或高爾基的「母親」，而去演「斯加拉毛序」(Saramouche)。在各種地方的代表會議與在報紙上作非正式的討論之後，召集了一次黨的代表會

議，以整理在討論中所得的材料，並確定與決定運用電影的新政策。就用這種方法來動員「無產階級的蘇維埃的公衆意見」，藉以在影片方面施行較大規模的控制。

教育人民委員會重新審定「蘇維埃電影」本年度影片製造的全部計劃，以爲這種動員公衆意見的一部分工作。預備製造的共有一百二十九種影片；其中有十三種是表演俄國一般的革命運動，十五種是表演十月革命與國內戰爭，七種是表演國際革命運動。三種影片是關於紅軍生活條件，二十二種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問題，九種是描寫提高文化的奮鬥，三種是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與反對飲酒和流氓主義的鬭爭。有兩種影片是反宗教的宣傳片，而另有一種則以抨擊反猶太主義爲目的。七種影片是以兒童間的先鋒運動爲其題材。無論在那一種影片裏，其攝影的背境都是取材於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在這製造計劃中的影片，若作得失權衡，則顯然是不能滿意的。許多影片已經着手製造了，所以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劇目總委員會，不能從思想內容來着眼完全實行其統制的職務。而且一般說來，蘇維埃影片的製造是不起從思想的觀點來檢驗的。教育人民委員會的一個決議上說，「蘇維埃電影屈服於簡單住民的嗜好與需要的壓力之下。」同時「蘇維埃電影」並不企圖使其工作與蘇維埃的公民機關發生關係，而且在實際上阻礙後者對它的影響。因此，它就會正確執行黨或政府的指令，以有毅力地促進電影在鄉村的應用，改善其對各城市工人區域的供給，與時常特別注意影片的內容。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最後決議中，要「蘇維埃電影」從速「創製受得起思想檢驗的影片，選用實際生活的題材，並

「同時要能代表藝術的作品。」

這次關於是項整個問題的總檢討，似乎表示大眾——包括工人與農民——對於描寫國內戰爭時期的鬭爭與英雄行爲的影片覺得滿意。並表示外國傳奇的或簡單無目的的探險影片，也不能得工農觀衆的歡心，雖或這種影片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簡單住民的需要。且堅持地說，工人與農民所需要的，是顯示經濟改造的進步，生產的過程，與經濟活動之社會主義的方法之各種影片，此等影片能滿足他們求更多知識的需要。在一個會場上，有一發言人表示他的觀點，認爲電影應絕對用作一種消遣的工具。但是這種意見，沒有人來擁護，而且引起其相反的意見更爲堅執，認爲電影的片子必須時常視爲一種教育的與訓練的工具。

據傳聞的工人與農民的意見，又有認爲外國的影片應該革除，而祇用蘇聯的影片。但是這一類的政策遇到兩種實際上的困難。蘇聯的影片祇一九二七年獲到一點利潤，而外國的影片則是過去使「蘇維埃電影」能夠存在與商業得有進展的要素。第二，現時蘇維埃影片的製造不足以供給已經存在的各種各類的電影機關的需要。第二個事實似足以表示共產黨人一方面與蘇維埃政府機關有衝突，而另一方面則與電影的觀衆有衝突。前者欲盡一切可能來利用電影以作政治教育，使其成爲文化戰線上之鬭爭的一部分工作。電影的觀衆則顯然是要看外國製造的談諧的、美麗的、與探險的影片。而且能獲利潤的，也是這種影片。在決議案上，在正式的會場上，工人與農民在紀錄裏總記起他們自己愛看蘇聯製造的教育影片；但在實際的實行上，工人們顯然是到商業性質

的影戲園比到他們俱樂部裏的電影晚會還要勇躍些。農民則無從選擇，假如有電影偶然拿到鄉村，而他們又買得起電影票，那末就去看一看。

在莫斯科各小學校對大羣兒童中所舉行的問答測驗的結果，也表示一種愛看外國影片的趨勢。較幼的兒童表示不歡喜愛情的影片，但他們都熱烈地提起「道烏格」(Doug, 這是 Fairbanks 在蘇聯稱喚的別名)的影片好看。這班兒童們在其解釋爲什麼看外國影片比看蘇聯影片更歡喜的辭句中寫道：「在那些影片上表演另外一種生活；」「富貴的人有他安樂的時間；」「無論如何，我們對自己的生活總是知道一些；」或「我們的生活是厭煩與困苦的。」「八百個兒童提起二百二十四種關於兒童的影片，這些影片是他們看見過的，但是他們認爲好的，祇有一種影片。實際上，在蘇聯的影片中找不到好的趣劇；這是共產黨人自己也承認的。

一九二八年討論電影的黨的代表會議，最後確定電影的任務應如共產黨領袖所想的那樣。第一個任務是使電影在事實上成爲領導、教育、與組織羣衆來執行社會主義建設與文化發展的各種任務之工具。這種領導權必須握在無產階級的手裏，並因此必須有顯明的階級路線，而現在的小資產階級與簡單住民的趨勢之表現於製造影片的政策上者，必須切實予以剷除。第二個任務是團結與正確地組織在電影界有創造力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會保障獲得正確的思想內容以及藝術的價值，且使電影更能接近工人與農民。第三個任務是使電影之趨向於工人和農民，不僅在其影片的內容方面，而且對於影片的製造與分配事務的組織及其經濟基礎，均應着重。

工農有一個提議說，電影應使其發展到能代替飲酒；這樣，影片就可代替酒而為勞動者消遣的東西，而同時又可作為公家財庫收入的來源。

在討論電影的全蘇聯共產黨代表會議上，該會主席在其結論的演說辭中，舉出下列事實，並作如下提議。工人與農民的需要並未得到充分的電影來滿足，影片的製造有很大的程度是來適應簡單住民的口味的。若遇影片的內容在思想上是合格的，則它在藝術的觀點上又有缺點，而且證明其不能使觀眾感覺興趣。對於獲利較鉅的商業性質的影戲園注意過甚，而對於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則太不注意。直至現在，黨對於電影還沒有充分的領導，而這種領導作用必須增加的。必須設立一個指導的機關，其主要的性質是直接與黨的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的一種政治的與文化的機關。雖在許多細小的問題上頗有意見紛歧，但是終究得到一個共同的意見，認為在一切文化工作上——電影亦包括在內——有厲行階級路線的必要。在這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中，有下列的辭句：

電影須認為是鼓動的、教育的、和訓練的工作之一種形式。所以教育人民委員會、農業人民委員會、衛生人民委員會，以及職工會的文化部，必須向製造影片的團體定製特別的文化影片，並付給此項定款。電影必須成為教育的工具，與書籍起同等作用。

在這些決議中還有一點引起大家注意：電影畢竟拿到黨與蘇維埃公眾意見的「視鏡」之下來鑑別了，那

些組織製造影片團體的負責者，自會覺到：這些決議不是紙上空談，黨要監視代表大會這些決議與黨的指令是否能在實際上執行。

共產黨人對於電影所希望的是什麼，或許可在其對一九二八年初製成的一種稱爲「聖彼得堡的末路」的影片之評論中明白看出來。評論者指出：這劇的中心題目是「從農民間發生出來的黑暗的與盲目的力量和有技能的與革命的工廠無產階級」之比較。工廠的工人承認須作有組織的階級鬭爭之必要，而農民的青年則企圖藉爲正義而爭的道德上的與無政府主義的騷動，來解決一個特殊的問題。他又評論說：「農民與工人之有相互的階級聯合與共同的道路之覺悟，是資本主義與沙皇主義的威權之成爲他們共同苦厄的結果，而且這種覺悟最後表現於共同的暴動，這就是工人與農民的『十月』。」這種影片又受了批評，說其基本的題材尙不能編排得令人信服。蘇維埃的影片必須「充滿積極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的內容，在這一方面它與資產階級的影片有嚴格的區別，以此給世界以各種新的電影形式，其力量能使世界革命勝利的日期愈加逼近。」這是引述另一個共產主義的作者之評語。

電影上的「危機」引起了一種企圖，要使「蘇維埃電影友」更能活動起來。這種自願發動的組織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標的一種羣衆團體。它有四百個細胞，三萬五千個社員，社員中百分之三十五是工人。它現在計劃增加社員，尤其在工人中間，該社已開始進行其實際工作。獲得電影機分給各集團一個一個輪流映演，並組織研

究電影機器的傳習班與函授社。又有一種「革命的電影協會」在許多城市組織起來，與電影工廠發生關係。關於電影的各種專門的雜誌受了嚴重的批評，說他們的目的不在滿足工人與農民，而在滿足小資產階級的觀眾，並因此不能成爲正確的思想中心，而且對於訓練問題的領導殊少注意。「蘇維埃電影友」主要的是無產階級的組織，須在黨的指導之下幫助此種領導工作之發展。

在音樂方面，十月革命是音樂界國家組織的開端。音樂就開天闢地的被看作一種社會的力量。因爲音樂是組織工作上的要素，它就成爲政治上重要的，並爲國家所需要的東西。因此，必須促進音樂，尤其是按自動組織的路線來促進。這種組織上的觀念，是蘇維埃體制中時常存在着的，且因共產黨人深信音樂特別沒有組織，所以此種觀念在音樂界方面特別表現得明晰。據共產黨人說，在革命前的音樂是握在私人的手裏，他們視此爲難得之寶，雖曾有相當的國家提倡，但是這種提倡沒有一般的計劃。革命初期的特點，就是爲握得政權的新階級努力攫取音樂藝術的寶庫，這與其他各種藝術具同樣情形。這種基本的思想，是集中一切音樂活動的觀念之所由出者。在新的聽衆間，開始作音樂教育的積極的宣傳運動；歌劇與音樂會，主要的是爲工人組織的。許多音樂專門家自己不能適應新的經濟條件，並因此旅居外國。政治上的信仰與經濟條件，是那些許多逃居外國者的動機之所在。這班人僑居外國，是技術領導人才的損失，但亦爲音樂界的後進者掃除障礙。

共產黨人承認在音樂上的題目尙起次要作用，所以革命後所發展的音樂未能充分表現革命的思想，共產

黨人也不爲此而煩惱。而且甚至當代後進的作曲家也是在過去時代訓練出來的；並且他們雖在革命時期起來參加活動，但對於選擇音樂題材方面一向是袖手旁觀的。革命的影響之表現，即在傾向於紀念主義（Mourn-mentalism）的趨勢與簡樸化的自覺的努力。共產黨人在這裏表現一種努力，要填塞介乎羣衆的音樂意識與受過高等訓練的選拔出來的專門家集團間之鴻溝，這種鴻溝他們自信是從前存在的。據說，有幾個最有天才的作曲家不自覺地承認了：音樂不僅能用之以達組織上的目的，而且主要的是組織上的一種方法，是能用之生效的一種能發生影響的工具。共產黨人發現一個作曲家在樂譜上很明顯地表現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史觀；在革命以前，俄國的音樂意識則傾向於神祕主義與幻想主義——這是他們所解釋的。

音樂又是蘇聯的小民族之覺悟的意識藉以能夠自由發表的一種媒介。據說，如猶太民族，得以音樂來慶祝其脫離幾世紀來的長期壓迫的解放，創立其自己的民族音樂，且不是一種愛好者的通俗的性質，而是一種有高級藝術基礎的。其他各民族集團，尚能在舊統治之下亦得保持其民族音樂的特點。可是非俄羅斯的民族集團，是受着限制，且甚至於受暴虐的壓迫。現在，據說，甚至更落後的小民族畢竟也能自由發展其民族音樂。對於此種自立的形式，已有極廣大的鼓勵，而以民族的事情隸屬於較高的階級原則，一如其他一切事情一樣。烏克蘭農民的羣衆歌，或小民族工人的小歌，是特別予以重視的。

與在文學上的情形相似，有所謂「鼓動」的音樂。某些通俗的音樂形式，例如農民與工人的歌謠與樂曲的

對語，均按其內容的性質把它組織起來。革命的觀念與革命的口號就用這種方法找到捷徑以達羣衆。這些音樂的形式，並不視爲可作將來的藝術或甚至代表任何獨立的藝術價值，這裏並沒有虛僞，要把此等音樂形式視爲不僅是便於宣傳的媒介。爲維護此等表現音樂的形式起見，對於兩種俄國的民族樂器特積極地予以鼓勵：一種是六弦琴 (mandolin) 一類的琵琶來茄 (balalaika)，另一種是俄國到處通行的與代表一種通俗樂器的和合琴 (accordion)。農民與工人伴着這兩種樂器合唱團體歌。琵琶來茄的業餘研究社與和合琴的業餘研究社，在許多俱樂部與鄉村都處處可以見到，並且這些研究社彼此競賽，以策勵其發展。

最近爲舉行和合琴彈奏者的競賽，組織了許多音樂會，其參加的人數非常衆多，足見此種音樂在民衆間極其風行。同時，和合琴亦稱爲不僅是簡單的娛樂器具，因爲此種樂器與民衆的日常生活有極密切的聯繫。「羣衆都懂得和合琴，他們都愛好它，並信仰它。這就是爲什麼和合琴與琵琶來茄一類的簡單的民間絲弦器具之所以成爲我們最好的伴侶，以與一切種類的文化落後與文化貧弱奮鬥。」——這是一個評論家的評語。他又進一步指出，和合琴較諸所謂「文明的音樂」爲更易學的宣傳樂器。一篇論這次和合琴彈奏者競賽的文章指出：這次競賽與一九二七年類似的競賽相較，參加競賽者所彈奏的歌譜選自古典傑作者較不多見，而農民的羣衆歌曲與工人和紅軍兵士的革命歌則表演得更多了。在一九二七年那次較早的與第一次的競賽中，所選的歌譜大部分是出自吉卜西歌唱隊 (Gipsy chorus) 或西歐的卡巴律 (cabaret) 的音樂。這兩種音樂，在這第二次的競賽

中完全沒有了。但有提議說，國家出版托拉斯應更注意於出版爲和合琴彈獨奏與合奏用的樂譜。在音樂的市場上，私商人有很大的勢力，且足以阻礙當局所施的指導與統制，使其不能按本來定爲可能的與所期望的程度來執行。

音樂的教育，從最初時期即已認爲是國家所必需的東西，所以已經採了適當的步驟以改組音樂專門家的訓練機關。音樂專門學校大開門戶以招收更多的學生，使無產階級的分子得以引入音樂的職業中。據說，在這些改組了的音樂學院裏採用了更多的科學方法，但是除了集體主義的教學方針以外，關於這些新方法實際的性質尚未得到解釋。最稀奇的與特殊的觀念，則爲無領班的音樂隊，或「全班合奏隊」，這是明顯地表現革命的心理。這種觀念的最初表現，稱之爲音樂隊方面的「十月」（革命），是反對領班對於整個音樂隊所施的心理上的專橫之抗議。又據解釋說，音樂隊的領班利用隊中各音樂專家的「勞動」攫取一切藝術上的「利潤」以自肥，因此在音樂隊中的「無產階級」的心目中，他就成爲某種意義的「資本家」。但是，這種無領班的音樂隊並不通行，並且限於少數孤立的試驗中。

俄國的革命不必等候其讚美歌的寫作；已有「國際歌」隨手可得，這歌從此以後成爲蘇維埃的國歌。革命的領袖們及其在秘密活動時期所已經接觸到的工人領袖們，均已知道這歌的樂譜及其歌辭。沒有一個大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集會，不在結束時候高唱「國際歌」的，並且隨時隨地，從兒童與工人的口中，在鄉村與紅軍的

軍營中，都可聽到此種歌聲。一種傳統的革命喪葬追悼歌，亦是隨手可得的，這歌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期間唱得很普遍，並採用爲第二種半正式的革命讚美歌。這歌的音樂是悲壯的，且同時富有激動性的，其第一句就是：「你已在鬪爭中犧牲了。」共產青年和兒童先鋒也有他們特殊的進行曲，其歌辭當然是關於革命的鬪爭及其勝利的。「兒童先鋒進行曲」是一種簡單而富激動性的調子，且其結語是：「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對於共產青年，則分段歌唱法（*charushka*）予以新穎的題材與辭句。這些歌唱的個人或全隊間的對話，很適宜於宣傳的目的。從前，較流行的歌曲是取材於幻想的題目，雖其所形容的事情尙是個人的或團體的一般生活。這種多少是自然的自行娛樂的形式，在非正式的集會中於俄國的工人與農民間甚爲通行，這些工人與農民對於團體歌與唱戲很喜歡，而且很有天才。這種分段歌唱法成爲傳播新概念之妙不可言的捷徑。共產青年在其作反對宗教一類的宣傳中，運用這種歌曲頗多。

爲工人用的特殊歌曲，已經編起很多。此等歌曲時常採用舊樂譜，而祇換上適用於新時代的歌辭。無產階級的詩人在此作政治的貢獻，歌詠各種革命讚美歌，並描寫工人生活上的變遷。最通行的新的工人歌曲之一，「小磚塊」的歌辭已在前章論述過了。這歌的歌譜是低半音的調子，並在這方面提示了傳統的俄國羣衆歌曲，但在這歌的音樂中有凱旋的與權威的調頭，恰與其歌辭相配。紅軍的兵士唱歌之多，與舊式軍隊的兵士一樣。紅軍兵士一面有正式的「國際歌」與各種半正式的工人歌曲，一面又在馬路上列隊進行唱着換了歌辭的舊歌。學生

也有他們自己的歌。我在莫斯科一個工人學校聽到一羣學生在走廊唱歌，我馬上辨認出這歌好像是教堂的一種讚美歌。但我更仔細的一聽，纔知道這是非正式的反宗教宣傳的歌。這歌所以要用讚美歌的樂譜，是要加強歌辭中所表現的對於宗教觀念的抨擊。

革命前俄羅斯的貴族與富翁階級通行的音樂，是吉卜西歌唱隊的歌曲。過去這些吉卜西歌唱者的音樂隊，通常祇在最大的飯館之私人大菜間裏表演。現在於大城市裏還可遇到此種歌唱隊。到了最近，吉卜西的歌曲祇在地窖的飯館裏歌唱，此等飯館的主人大都是新興資產階級中人。但在晚近的幾年中，吉卜西的歌唱者又公開出來，在大的大客滿座的飯館裏歌唱。在有一個地方，聽衆看起來是無產者，但顯然是該階級的最壞分子，雖然這個飯館是首都最大的合作社經理的。起而代替吉卜西歌唱隊者是藍衫團；這種團體至少在外貌上是蘇維埃式的。這個名稱是根據於俄國工人傳統的服裝而來。俄人包起褲腳的外褲和長統的靴子，是俄國工人中最通行的服裝形式之特徵，這些少年的娛樂者就把這種服裝加上該社的標記和緣起漆皮的邊。與這些劇員相伴的，還有幾種音樂隊。所奏的音樂之主要特點，似乎在其宏大的音量與迅速的速度。藍衫團的戲劇隊在此再來提到，因該團具有音樂與戲劇雙方的藝術。這些小小的劇團本來認為主要是表演活報的宣傳團體，這是熔演劇歌唱跳舞於一爐的劇團，一方面發展其藝術上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則推進到簡單的娛樂而與政治教育背道而馳。因為有這種傾向，以致他們陷入某種被輕視的地位。對於資產階級的觀衆，他們在事實上證明是特別找尋在蘇維埃體

制之下，所設備的各種各式的娛樂之頗廣大的經驗中之最活潑與最堪娛樂的公衆表演。關於時事問題的諷諷是很聰明的，且時常對革命的成績作譏刺的批評。其題材的性質總是蘇維埃的，即把目前的題目與問題包羅進去；但是在其對於革命口號的表演中，特別以油口滑舌的語調達之。藍衫團之所以陷入被輕視的地位，或許就是該團所採取的這種自由批評所致。

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在夏天花園的諷刺話劇中與在冬季的馬戲中，都是繼續不斷地表演。在諷刺話劇場上之個人獨唱或團體合唱的歌曲中，時常唱到政治問題。在馬戲園中，各丑角均能談到「目前的猛烈問題」，即革命的題目。在幾個少數的事例中，革命的原則祇被諷刺話劇的歌唱者或馬戲園的丑角於幽默的掩飾之下作間接的攻擊。但是莫斯科最著名的丑角受到「人民藝術家」的稱喚，與俄國戲劇界其他著名的人物齊名，蓋其對於革命的態度與藝術的天才均有足稱。但是馬戲中輕身善跳的絕技，受了訓練的動物，騎馬術，或甚至音樂廳的歌曲，卻不能在娛樂的過程中隨手負起政治教育的任務。

在工人俱樂部，紅軍營房與鄉村讀書室裏，各種的音樂研究組已經敘述過了；這些是最能得大衆歡心的研究組。這裏有兩個要素足以促進俱樂部活動之此種特殊形式的發展。普通在俄國較廣大的羣衆間，唱歌與音樂都有傳統的嗜好，俄國的羣衆音樂在數量上與藝術的質量上均有足述；再則，革命的領袖亦有自覺的努力，欲盡量利用音樂所能做到的接近羣衆的一切機會。甚至古典的音樂，亦須在蘇維埃的體制之下供政治上的使用，這

是推廣文化到廣大羣衆間之計劃大綱的一部分，而且又是施行各種影響的門徑。但是要達到這一最後的目的，卻更困難。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紀念中，一個共產黨的音樂批評家嘆息道：列寧的人格與其革命的事業沒有在音樂中反映出來，雖然，據他的意見，音樂的藝術已畢竟把握住以藝術表現革命的題材之技術了。他舉出著名的作曲者克雷恩 (Krein) 的「追悼歌」 (Mourning Ode) 以作例證。他覺得其他作曲者在其歌曲中給予「列寧的憶像」 (Image of Lenin) 已有成功。這批評家所嘆息的是：還沒有人能編出一種合奏樂以反映列寧的革命創造力，而與皮索文的愛情合奏樂 (Symphonie Eroica of Beethoven) 相頡頏。

第十六章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馬克斯主義主要的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學說；而馬克斯主義在蘇維埃制度中的應用則爲布爾塞維克主義或列寧主義，蘇維埃制度之共產主義的創造者與領導者，時常加重說明他們的學說與政策有國際基礎。在另一方面則在蘇維埃統治的時期，中民族主義的態度在羣衆間之顯然的發展，是一切局外人的學者與觀察者所注意與加重說明的事實。普通在俄國可遇到許多似非而是的事情，而尤其在革命中；這種事情的解釋，至少一部分見於蘇維埃公民訓練的姿態中，這訓練亦有涉及蘇聯公民對國外世界的關係。蘇聯的公民都被希望能爲國際主義者，但是現時的具體事實，已給這種觀念塗上顯明的民族主義的色彩。用以造成國際主義者的方法，結果是促成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之發展。蘇維埃制度的國際主義時時提示逼人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在「歷史上第一個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前即已爲世界所周知的。最後，在蘇聯境內有猛烈的地方的民族主義，且在某些方面比較具有國際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革命以前的情形還要更強烈與更自覺些。

在革命前，俄國有許多集團與個人傾向於國際主義，並因此是顯著的非民族主義者，這是常見的事情。許多俄國人的特性往往是缺乏愛國主義。這種普遍的現象大體上是確實的，但必須加以相當的分析。舊制度之政治

的與社會的條件，爲造成一切爲西歐人士覺得離奇的事態之主因。在沙皇統治之下，有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可是這在那時候是官方的民族主義，並因此是絕對的與武裝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抱自由主義觀點的俄國人所不能接受的；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則這是被咒詛的東西。這種事實是造成俄國知識分子的國際主義觀點的力量之主因。在另一方面，保守派的政治觀點的基礎之一，便是武裝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而且舊的專制政體有很多程度是立足於這種官方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舊統治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都藉虐待帝國中非俄羅斯的各小民族以自肥。所以，俄羅斯的愛國主義不能期望於波蘭人或芬蘭人，並且烏克蘭人也因受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各種限制，甚至烏克蘭民族文化習尚的表現亦受限制，以致減弱其愛國思想。在舊俄統治之下，猶太人特別受到虐待而被視爲次等小民，因此國際主義特別盛行於他們中間，而尤以知識分子爲甚。在工人中間，在舊統治下各種權利之被剝奪，實有助於社會主義者的秘密宣傳，而且使他們對這主義的國際形態亦表同情。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已毀滅了，至少減弱了，對統治者稱爲「小父親」的簡單的直覺的信仰，這種信仰本是工人羣衆間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成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結果與一般文化的與政治的發展，使「小父親」的信仰也在農民中間有顯然的減弱。農民文化的落後阻止了更有理由的愛國主義之發展。農民的興趣祇集中在本地的鄉村環境中，而這種環境是不能促進農民對於地主階級出身的文武官吏所支持的現存制度有所留戀。

兩年半的世界大戰曾引起了俄人愛國主義的發展，甚至影響到更廣大的羣衆間。自由主義者與甚至溫和

派的社會主義者都變成愛國者。非俄羅斯民族的分子會斷定說：他們所熱望的是在俄國與協約國合作而得到勝利。俄國的工人與農民都與平常一樣地證明是絕好的戰鬥員，且似乎（至少是遊移的）承認這次戰事所牽涉的民族利益而不顧一切困難。民衆的領袖與官僚相反，企圖獲得限制工人組織與保持農民爲卑下小民的法律之廢止，以此作爲促進愛國主義的戰時辦法，因爲當時軍隊遭受敗北，且經濟的負擔日益加重，愛國主義已在嚴重的試驗中。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一方面是以愛國主義爲基礎的革命，尤其對於知識分子，但對於工人與農民亦有同樣的情形；舊統治之受譴責，就是犯了「賣國或愚頑的罪過。」同時，二月革命是一種反對當時所發生的經濟困難情形之自發的羣衆抗議，經濟困難的發展大部分是因舊官僚愚頑的結果。民衆既遇到這種經濟的破壞，就厭倦戰爭。

二月革命的後果之一就是戰爭與革命的關係問題。這問題可用那時候發動的鬪爭中的口號之簡單辭句來敘述。保守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被責以敵視左派，企圖利用戰爭的局面以擊敗革命，或至少限制其發展。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號召繼續戰爭以維護革命。布爾塞維克反對繼續參加「擁護地主與資本家利益的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在一切國家中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主張在俄國連同他們的另一口號立刻應用，這另一口號即爲「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歸工人與農民的階級機關。階級的利益普遍地宣傳到各民族的所在地。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布爾塞維克宣傳戰壕兩對岸工農攜手的基礎。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認爲戰爭足以

維護革命，並同時預備與其他各階級合作以繼續戰爭，此派被布爾塞維克斥爲「社會主義愛國派」與社會主義及工農利益的叛徒。布爾塞維克祇對政權已握到工農手中的國家纔容許有自衛的戰爭。新政府威聖的基礎。正理在這戰爭與革命的關係之一切討論中。

在這時候，從俄國革命中發生的另一口號是「和平不能有割地與賠款，且須以人民有自決權爲原則。」這公式雖爲自由主義者與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所接受，而事實上是國際主義者的綱領。後來這口號補充以設立工農政府的蘇維埃國家形式與蘇維埃聯邦的觀念時，便完全適合於世界革命的觀念。這口號含有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或「在世界帝國主義的苦陬下」的人民之民族主義運動中，承認民族的原則爲革命鬪爭的開端之意義。至如在一九一七年應用於俄國，則這口號又是對當時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之一種攻擊，俄羅斯民族主義受戰爭的影響在知識分子中會增強起來，並受他們在羣衆間的推進而成爲二月革命的一部分。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接受了這個公式，同時又牽涉到另一矛盾，布爾塞維克就能在革命的這一階段利用此種矛盾而作他們進一步反對「自衛的戰爭」觀念的宣傳運動。自十月革命成功與蘇維埃制度的建立，布爾塞維克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觀念得到了實際的應用。

在蘇俄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上，前面已經說過的兩大時期也劃分得很明顯。在一九二一年以前，有「軍事共產主義」；在這幾年中，非但蘇維埃制度未得各國外交上的承認，而且在此制度管轄下的國境，亦受着經濟的封

鎖，且有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紅軍則與白黨軍隊——「地主和資本家」的軍隊——作戰；而後者又受「世界資本主義」的庇護。在「敵人」掌握中的各部分舊俄帝國的領土，漸漸奪回到蘇維埃主義方面，而蘇維埃主義亦在世界上獲得地位。曾在匈牙利（Hungary）與巴伐利亞（Bavaria）建立起蘇維埃制度，且在德國的革命中亦有蘇維埃的觀念。紅軍曾進展到里加（Riga）與到華沙（Warsaw）的城門，並時常隨身傳播着蘇維埃的觀念與制度。在一切國家中，於這戰後的數年間都有工人運動，而此種運動實具有「革命的可能性」。在十月革命的羽翼之下，共產國際成立於莫斯科，成爲「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這是積極宣傳的時期，既是進攻的，又是防守的，一面促進世界革命，而同時又藉此種宣傳以作防護新制度的工具。

自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採用後，首先就是發生了與各國通商關係的重新建立，並繼以正式的承認。關於蘇聯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互相作用的討論，已不屬本書所研究的範圍以內；我們在此所要說的，祇須提及新經濟政策的時期就是所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一個時期就夠了，但在這時期時常加重說明「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並經常以此事警醒工人與農民。世界革命的觀念並未廢棄，而外國干涉的危險也未信卽已消滅。這祇是一個休息的時期。蘇維埃政府與其他各國政府關於宣傳問題之不斷的爭論，助長了關於世界革命與革命的防護問題以及一般的關於這新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之討論。

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季，蘇聯與世界各國的關係起了變化，此爲一個新的第三時期的濫觴。引起這種變化的

主要原素，祇能簡略地說過去。在國內經濟方面，共產黨人開始說起「改造」時期，以與「恢復」時期有別，其所根據的是此時顯著的經濟進步已走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道路。在國外的世界，共產黨人見到資本主義制度削弱的象徵，他們認為各國在世界大戰後，祇能達到所謂暫時的穩定。在這兩方發展的趨勢中，共產黨人看見了全世界的階級鬭爭重整旗鼓；並依他們的觀點說來，在這新的形勢中，蘇聯成爲資本主義新進攻的對象，同時又是新的革命浪潮之激動物與造成此種希望的東西。共產黨內部的爭論已給蘇聯的地位與作用下了更明晰的定義。被解釋爲證實這種對世界形勢的新觀點之幾件大事就是：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大罷工與礦工的罷工，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一切國家中的罷工與工人的示威遊行，法西斯主義的傳播，英蘇外交關係的破裂，與蘇聯大使在華沙之被暗殺，這祇是說到最重要的幾件事情。共產黨的領袖說武裝干涉與實際的「經濟干涉」之迫近的危險，是世界資本家欲毀滅蘇維埃制度的另一企圖的準備中之一步驟。在他們看來，新的形勢之他方面的現象，則是其他的世界各國革命潮流的高漲，而同時蘇聯在其他各國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間的威聖，亦有相當的增加。因此，保護革命與蘇聯對世界革命的領導之兩個觀念，就提出作公衆熱烈的討論。自一九二六年開始的這些發展，供給了作一更明顯的公式之材料，以表達蘇聯公民根據該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應行採取的態度。

蘇聯脫離世界其餘部分之銳利的分化，時常爲列寧用其對世界人口之很簡略的分類顯示出來。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史太林在其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中，亦重新提起列寧的這個分類。地球上人

口的總數估計爲一十九萬零五百萬，其中一十一萬三千四百萬被歸入居住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之一類。於是把其餘的人口分成三大集團：一萬四千三百萬是蘇聯的人口，二萬六千四百萬是中等國家的人口。而祇有三萬六千三百萬是「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大帝國主義國家。」史太林於是解釋中央委員會對黨的代表大會的報告爲什麼應首先提到國際形勢，說道：

同志們，我們的國家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局面中生存着與發展着的。它的國外形勢不僅依靠其內部的力量而且依靠這種資本主義包圍的情形，依靠環繞着我們的國家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勢，依靠他們的強弱，依靠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強弱，依靠這些階級的革命運動之強弱。我並不需要細論我們的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的世界革命運動之一部分。

從這種世界革命的綱領，可知共產黨對於其以蘇聯的名義與國外「資產階級」的政府所訂的條約之態度，是多足論辨的事情。下面一段是從一九二八年三月間真理報關於在德國簽訂勃列斯脫·列托夫斯克條約 (the Brest-Litovsk Treaty) 週年紀念的社會論中摘錄出來的，雖沒有很確定地針對這一點立論，但足以顯示這種條約怎樣站在工人與農民的利益上來解釋：

勃列斯脫和約是蘇維埃政府對於資本主義的一個妥協。但是這是屬於格殺敵人的一種妥協。自訂立和平條約以後，布爾塞維克主義對於德國軍隊的影響增加了，而且德國的革命受這件事實的引動而日益逼近

了。這社會主義國家與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切「和平」的關係，都與勃列斯脫和約一樣是對此等國家的特種妥協。而且這種妥協也是格殺帝國主義者的。此點的明證就是全世界一切勞動者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進，以及這些羣衆對向蘇聯狂吼的帝國主義益臻仇恨。

蘇聯外交政策的全部內容之如共產黨人所草錄者，本身就需著一本書來研究，此處所徵引的幾段，祇是選錄出來以指示對其所採取的政策之解釋的一般方向而已。史太林在一九二七年黨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可再用以表明這種解釋的趨勢。史太林自己對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報告做出一個提要，指出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相互作用如下：

(1) 我們已經與四周的國家保持和平，不顧極大的困難，並不顧「大強國」的資產階級之挑撥的進攻。

(2) 我們已經增強蘇聯的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工人之聯盟，不顧許多阻礙，並不顧腐朽的資產階級善於造謠的報紙之多方誹謗。

(3) 我們已經提高無產階級在千百萬的勞動者間與在全世界的一切部分之領導的威權。

(4) 我們以一黨的資格幫助了共產國際與其各國的分部，以增強他們在全世界一切國家內的影響。

(5)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黨對於發展與擴充世界革命運動所能做的一切事情。

(6) 我們已經擴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在其發展中造成空前的速度，並獲得其對於全部國民經

濟的領導權。

(7) 我們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的工業與農民的農業間的聯盟。

(8) 我們已經藉依靠貧農的政策增強了工人階級對中農的聯合。

(9) 我們已經在本國增強了無產階級的獨裁，不顧國際包圍的敵視，已對一切國家的工人表示無產階級不僅能毀滅資本主義且能建設社會主義。

政府與黨的負責領導者，關於他國政府積極地，並有時聯合地，企圖以直接的與間接的方法推翻「世界第一個勞動者的國家之言論，或者似無根據。」私人的個人或團體之反蘇聯的活動與各國政府人員的個人言論，均被解釋為這一種政策的證據，並指出與引證出來，以提起工人與農民的注意，時而特別提出，時而僅作一般的提示。時常指出的一個普通的提示是：各國的資本家看見了蘇聯經濟生活之社會主義的改造之成功，並認清了他們不能允許此種成功的繼續與發展，在一九二七年所表現的逮捕事件，造成了略嚴重的戰爭恐怖，地方的共產黨人傾向於從字面上了解其領袖的言論，說休息時期與蘇聯和其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關係時期正告終結。地方的代表會議，在其對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之各項決議的討論中，主要的注意於涉及國際形勢與蘇聯在這國際形勢中的地位之那些決議。人民都開始購辦與貯藏貨物及糧食，以防戰時的經濟失常。

這種反響嚴重地擾亂了經濟計劃與其綱領，而出口用的穀類屯積受其影響尤甚。因此提示即刻有外國武

裝侵略的言論稍稍減少。但是仍在加重說明蘇聯之受「資本主義包圍」並找出與向工人與農民指示外國資本家「經濟干涉」的證據，甚至反對蘇聯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之努力，亦被解釋爲其敵人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陰謀毒害的計劃，因一個工程師集團之煤礦的經濟反革命計劃發生，三個德國工程師被捕。一九二八年關於這種階級戰爭的審判之討論，解釋這件事情又是外國經濟干涉的現象。

下面一段引語多少是隨便選自足以表示加重說明「敵人的資本主義包圍」的結果之許多例證。去年莫斯科一切高級技術學院將屆畢業的學生，於其畢業前夕的全體代表會議的決議案中有如下一段：

關於我們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我們遇着許多困難。我們的敵人正在企圖破壞我們的建設工作，並用了種種新的形式與方法以達到這個目的。

蘇聯最重要的機關與團體，都有其國際活動的領域，或至少具有國際的形態，以確定其關於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之這些簡短扼要的解釋，並根據這些解釋以在蘇聯各種公民間促進其對於政府與黨的政策以及因此而生的蘇維埃公民義務均能完全了解。這種國際方面的訓練，我們在前面幾章於敘述各機關或團體時已常常說到，並以這最後一章爲參考。茲冒相當重複的險，再來評述這些機關與團體，視此爲在蘇維埃公民中發展共產主義者的世界態度之工具。這樣再來評述，將又顯示這些機關與團體所組成的龐大的並同時是統一的體系。每一種大的公民範疇對於共產黨這方面的訓練之反應，在此祇能略作提示。

在理論上說來，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許多分部中之一個分部，須視共產國際爲一切共產黨人的最高機關而對它負責的。按同樣的理論，在蘇維埃政府中的共產黨人，必須視如在此負責的官吏而隸屬其政策於這個國際團體的目的與策略之下。該黨決定要蘇維埃政府採取的政策，常常提到共產國際以求正式批准。因此可說：蘇聯的共產黨在其負起蘇聯的領導責任中，是得全世界共產黨員之支持的，並且這種解釋用以興奮該黨的黨員，以求獲得更大的興趣與努力。可是這種理論在實際上有些不同。蘇聯的共產黨，因爲是最大的分部，並按其反覆常用的成語是已經「克服資本主義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已經執行奪取政權的綱領之一分部，故在事實上是共產國際中的實際的權力機關。該黨以列寧爲共產國際的首創者與領導者；而且列寧主義按其這特殊的黨所解釋是這兩團體的權威。蘇聯共產黨人根據他們的實際經驗與成功在事實上建議，且甚至命令，整個共產國際與其他較小的分部之政策。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大部分是根據蘇聯共產黨的經驗定出；其他各國的共產黨經常告之自行布爾塞維克化，意即採用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所根據的黨的建設原則。該黨因是最大的分部，對其國際的團體給予最大的物質幫助。至若這種幫助究竟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取自該黨在政府中成爲執政政黨之國家的公家財庫之大有爭論的問題，在本書並無討論的必要；在此祇須提及蘇聯共產黨是對共產國際在人上與物質上都是最大的幫助者就夠了。

蘇聯的共產黨員個人或共產黨，因較「資產階級」國家的黨有這種更大的經驗與更大的幫助能力發展

了一種特殊領導權、一種世界領導權的意識。爲避免暗示俄羅斯的領導權起見，該黨的名稱改作「全聯邦共產黨」，該黨並以此名稱暗示這結構與組織的面貌，得於世界革命到來時指揮這個革命。且這種領導作用當應用於全世界時也祇是擴大行於蘇聯內部的那些特性。對於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人似有發號施令的態度。莫斯科的領袖雖時常說：他們把蘇聯的工廠分給全世界的勞動者共享，這些工廠是屬於全世界工人的，但他們往往對他國的共產黨人根據共產國際是蘇聯共產黨人事實上的最高機關的理論有何建議而尤其有何批評時，則表示不悅。他國的共產黨人來此幫助領導革命的，並不常常能如其所預期的精神來努力。因爲蘇聯的共產黨人已經爲革命流了血，已達到與得到對第一個工人的國家之控制權；而其結果，不顧無產階級團結的原則，他們表示欲保持這領導權於自己手中的明顯趨勢。因世界革命的延期，他們就集中自己注意力於蘇聯政府的與經濟改造的任務。所以，在國際主義的理論之下，一種民族主義的形式甚至在共產黨人中發展起來。領袖們在祇有共產黨員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上，時常說到「我們的國家」或「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義務」，雖也有說到蘇聯爲其他各國的工人與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

共產青年團也與它的父母——共產黨——一樣，祇是一個國際的組織——青年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青年共產國際簡稱「啓姆」(Kim)。「啓姆」也有執行委員會與共產國際相似，其辦事處設在克列姆林皇宮旁邊共產國際的那座房子裏。「啓姆」的代表大會也定期在莫斯科舉行。因爲這種組織裏的青年人不像他們黨

裏較年長的同志那樣負責任，所以這些代表大會與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比較不正式一點，但是這組織的國際形態時常予以重視。共產青年團因是黨的預備學校，必須在青年中發展共產主義者的國際觀。爲此目的，在前面論這種組織的一章中所列舉的共產青年團的各種活動之很大的百分比，是直接或間接與這種運動的世界目的有關係的。對於青年們有特殊的紀念日——國際青年日，這紀念日是在俄國革命前即已定出的，但在革命後採用之以爲每年大的革命紀念日之一。這第一次秋季紀念日，是在九月間於學校開學的前夕並於各工業機關在夏季後再行恢復全量生產以及秋收亦已告成之時舉行的，這便成爲一件重要的大事。青年在一切紀念與遊行中都起重要的作用，而他們自己的這次特殊的節期，則有助於使他們覺得在這種活動的場合裏負有總的責任。

對於國際形勢的注意，能使鬭爭的觀念極度加強起來，這特別從國內戰爭結束後是如此的。青年人或至少他們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分子，找到這裏是他們的熱情得以表現的廣大場所。派到共產青年團裏面指導的共產黨核心，把這些青年人推動到表示種種抗議的程度與形式，共產黨人大概覺得採取這種抗議形式比較方便些。無論如何，黨可時常憑藉青年團以激起反對「敵人資本主義包圍」的遊行示威與宣傳運動。雖對這些被選出的青年工人、農民、職員與學生的代表要求須有程度很高的政治覺悟，但是並不希望這班青年人能了解他們的國際義務之全部責任。在宣傳與鼓動方面，他們已證明是最有用的集團，有較多的時間以作這種活動，且能以最縱情的方式參加此種活動，尤其關於世界革命與防衛蘇聯這兩個觀念。共產青年團亦廣被利用以作公民團

體徵求會員的運動，或作有國際性質的特殊用途之捐款運動。最後，共產青年團，像共產黨對它自己一樣，對於兒童的共產主義組織以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國際觀念灌輸於兒童先鋒。這裏的領導責任迫令這些青年人不得不更正確地定出他們的觀點。

外國的參觀者時常得與年輕的共產青年團員談論國際形勢。他會被問到他自己的國家裏有無革命的可能，或問到資本家干涉蘇聯的準備如何，而且他會被這種青年人所表示的對各種事實的興趣與知識所驚駭。作者曾有過幾次這樣的經驗，而且實際上關於蘇聯的每一遊記都說到這一類的談話。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國際目的被共產青年團員感覺到最強烈，如果不是意識到最完備的話。藉印刷品上與由代表大會或通訊所建立的關係，共產青年得時常與從共產主義的觀點所解釋的各國狀況以及各種運動發生接觸。這些接觸的意旨之一，就是要使青年人認識在「他們祇從書本上知道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狀況與教育。以更多的個人接觸為基礎，希望這兩種制度的比較，能使青年工人與農民更明晰地認清蘇維埃制度的原理，並可在他們中間發展更強烈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情感。

對於蘇聯兒童中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兒童先鋒，則沒正式的國際組織。但是兒童先鋒在國際青年日的紀念中卻包括在內的。他們幫助其年齡較長的同志——共產青年團員與共產黨員——徵求新黨員，或捐款以助國際革命的或防衛蘇聯的團體或事件。藉印刷品，並藉與各國兒童的彼此通信，蘇聯的兒童先鋒得認識其組織之

其世界規模，而且全世界各國兒童先鋒的團結觀念，亦印在他們的腦中。作者在莫斯科一個小學校裏受到小孩子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有沒有兒童先鋒。與蘇聯兒童先鋒談話中的問答，時常涉及國際關係的題目，並發覺兒童們對於此等問題有非常濃厚的興趣，且對其相當的革命口號亦甚熟識。兒童先鋒參加其年齡較長的同志之集會及紀念會，每當這些會涉及他們與國外「資本主義」世界之關係時，兒童先鋒的參加特別來得多。在這些會中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表示熱情與應用象徵主義。兒童先鋒的共產青年團領導，在黨的領導之下來執行，保障這種興趣與熱情循着共產主義的方針。

蘇聯本身就是一個國際的政治團體。當它於一九二三年正式成立的時候，曾有建議新的名稱爲「歐洲與亞洲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這個建議所以失敗，因爲它並沒有照顧到世界上其他三個大陸。蘇聯的組織機構是能擴大以至包括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這種特點已在討論新的蘇維埃的國家式範時常常說到了，蘇維埃的標記，如五個尖頭的紅星，象徵蘇維埃制度的世界規模。這蘇聯的世界規模又表示於審慎避免採用含有民族主義態度的文字。在蘇聯內部最大的與佔優勢的單位是俄羅斯的單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論到這一單位時，這正式名稱的五個字之第一個字母讀成一個字，使「俄羅斯」一字可不必用。很難得聽到共產黨人用「俄羅斯」一字；若遇不能避免時，如常用以作討論的題目時，則這字將放在引號裏。在說到與他國的關係時，所用的名詞時常或是「蘇聯」或是「蘇維埃政府」，祇有一兩次例外，這時候「俄羅斯政府」一語顯然

是因牽涉到舊俄的利益而提到。在國內用以指稱思想的傾向以及世界各國仍稱爲「俄國」或「蘇俄」以示這區域的特點之法定的事實之形容詞，都時常是「蘇維埃的」而不是「俄羅斯的」。在與堅執用「俄羅斯的」一字之外國人談話中，共產黨人或共產青年團員在其說話或回答中用「蘇維埃的」一字來代替。在年老的知識分子與在年較老的工人與農民間，「俄羅斯的」一字仍在通用，當說到蘇聯的正式語言時，「俄羅斯的」一字不能避免；但採用這種語言爲正式的語言時，加以解釋說：這是過去十月革命的真正語言，如「布爾塞維克主義」及「蘇維埃」一類的文字，都是從此爲全世界的工人與勞動者所採用。

在蘇聯內部，根據民族文化或地方的經濟利益而來的地方特殊主義，須與之作積極的鬭爭。地方的區域研究之受鼓勵，是要確定其文化的與經濟的來源以使之能有更完善的發展。但是整個的蘇聯的共同利益——即工人與農民的階級利益——必須在純粹的地方利益之上。凡遇有歷史的基礎，以狹小的民族集團之形式而存在的事實，則蘇維埃制度的聯邦性質卻承認此種事實，而同時使地方的利益隸屬於蘇聯的政策之下。烏克蘭人享受着文化的自主；他們用其本地的語言，唱其烏克蘭的羣衆歌，讀烏克蘭文的書，並有特殊的機關以增進他們的文化發展，使他們更能表現其工農的真面目。新的行政區之採用，其中目的之一，亦是要廢除往往能供地方特殊主義做根據的舊的行政單位。在蘇聯內部唯一嚴重的地方民族主義，是烏克蘭與高加索的喬治亞的民族主義，而這些民族主義已予以嚴厲的打擊。一般人相信他們一部分是由舊日大俄羅斯武裝的與專橫的民族主義

所激起。據稱，這種心理的習慣業已迅速剷除，且解釋這是給新制度以一種負擔的舊統治之另一合法的主義。因為烏克蘭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無從直接表現，要確定此種民族主義如何解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蘇維埃主義的國際主義與從前專橫的與逼人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多方相似，亦沒有可能。反猶太主義是革命前合法的民族主義之另一形態。所以，一切反猶太主義的表現，都歸咎於舊制度，並解釋這是敵人所用的階級鬭爭的武器。俄羅斯愛國主義，烏克蘭民族主義，與反猶太主義，都宣稱與馬克斯主義的階級學說不相容，並是「危險的離開了」黨與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蘇聯所據以成立的原則。這些主義的堅持，認為是暫時的，而增強或發展這些傾向的積極活動都解釋為反革命的。

蘇聯的政府組織示明它具國際的性質。紅軍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軍隊。紅軍兵士當正式加入服役時所宣佈的誓辭亦包括這一點意旨。無論何時說到紅軍，它保護全世界勞動者的路線之義務的事實，是時常予以重視的。它常常是「工農紅軍」，並無狹小的民族思想。它的迫切義務則是保護革命的征取物——農民的土地與工人的工廠。因這兩個集團仍用舊俄的名詞連在一道，在他們與紅軍的兵士看來，紅軍們可視為一種民族的團體。但在成為訓練紅軍兵士與紅色海軍的一部分工作之政治研究中，蘇聯的國際任務特別予以重視。在論特殊的政治教育的一章中所述的這些研究的內容概要，已把這個事實明顯地指示出來。紅軍兵士回到他的原來鄉村或工廠時，希望他能把這個被重視的要點反映出來；他把蘇維埃的經濟原則的觀念，例如合作社與生產的集體方

法都帶回去；他在服役的期間曾把注意力集中於國防問題。但退伍的紅軍兵士則有在本地宣傳他的新的世界觀之義務。

蘇維埃政府在它與各國的正式關係上，有兩種重要的新實施是從它的國際性質之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產生的，並有使這種觀點日益進展與大衆化的意向。在最初幾年中，蘇維埃政府超越各國政府而直接與各國的人民發生關係。當各國共產黨人或勞工的領袖被逮捕或以革命的活動而定罪時，蘇維埃政府曾有幾次採取外交的步驟，表示他們認爲這種人是他們的革命國家之人民。又在革命的最初幾年中，與正在同一「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衝突的非蘇維埃國家，如土耳其與波斯的博愛的聯盟之實施，亦是發源於這國際主義的觀念。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這些新奇的實施，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的時期中，已不以同樣的程度來施行或重視了。在第三期開始的過去二年中，這些較早時期的實施又重新出現。例如，最近蘇聯在日內瓦會議中的軍縮提案，被在國內解釋爲代表全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之觀點與希望。

在蘇維埃政府制度下之另一實施，可在此述出，藉以表示其如何在羣衆間提出與發展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態度與綱領。地方蘇維埃，尤其是大的城市蘇維埃如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蘇維埃，時常在其常會的議事日程中提出國際形勢一項。地方蘇維埃的特別會議常常召集以討論國際危機，如一九二三年的巴爾福的哀的美頓書 (Balfour Ultimatum) 或最近的蘇英外交的關係破裂；並且由這些地方團體通過關於外交政策的決議案。

與告各國勞動者書。雖然一切外交關係都是由蘇聯政府機關來執行的，但是各民族單位，如烏克蘭，與甚至地方蘇維埃，都討論與通過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決議案。這種辦法作為動員廣大羣衆意見的基礎，在與各國正式磋商的蘇聯外交時常要根據到這種羣衆意見，同時這是使蘇聯公民成為世界革命者與蘇維埃的愛國者的政治教育。

蘇聯的職工會有他們的國際組織，稱為「赤色職工國際」。這個團體由蘇聯的職工會發起，模仿共產國際的組織而成立，它也與共產國際一樣，在理論上是比蘇聯職工會高一級，並是國際的機關，但在實際上是後者藉以影響各國工人的工具。職工國際簡稱為「潑羅芳坦」(Profintern)，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於莫斯科召集的職工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中，五大洲與五十個國家都有代表參加；但蘇聯的職工會會員超過一千萬，代表佔了多數。這次大會討論了與通過了關於全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決議案，並且這次大會，尤其是蘇聯的職工會，對於這些運動的性質與進步所負的責任，是蘇聯代表在其發言中經常提到的。負起這種責任的嚴重性，或可以在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大罷工中蘇聯職工會的活動為最好的例證。其所建議的進攻性質與欲直接以莫斯科職工會的領袖來領導的趨勢，對於他們的蘇聯職工會的國際任務的觀念之重視實有幫助，至少在他們的活動分子中是如此。捐助工資百分之一的辦法，為蘇聯一切職工會會員進行到數月之久，這給此種觀念以具體的內容，且很確定地印入他們的腦際，尤其因為這種對英國罷工的幫助之結果，引起他們與英國政府的爭論。敵方宣稱：這種捐

款的組織採取特別方法，使人人沒有逃避這「自願捐助」的可能。但對這種捐款確是無人抗議，而且職工會的機構得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宣傳運動；共產黨的領袖解釋這些事實為他們的國際觀念已被工人與甚至被擁有蘇聯幾個最大職工會的勞動知識分子所自覺的接受之明證。

職工國際又是表示蘇維埃制度的原則與目的，為各國有組織的工人與勞動者正式接受。蘇聯的職工會藉與這國際團體所轄的各國職工會與其他團體合作，得在「敵人資本主義包圍」中找到朋友與讚美者。有些地方把捐助英國罷工者的捐款負擔解釋為必要的，因為這是英國政府對蘇維埃國家所取的政策有以致之；這種對大不列顛朋友的援助，將增強他們反抗干涉蘇聯的新趨勢之力量，蓋莫斯科的領袖們覺得英國政府有這種干涉的政策。所以，蘇聯職工會的國際活動具有愛國的姿態，是防衛「第一個勞動者國家」的準備的總綱領之一部分。

共產黨人希望漸漸使農民從個人主義的方法轉變到集體主義的方法，並從狹小的地方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觀點轉變到更廣遠的國際觀。當在革命的最初幾個月中，托洛斯基主張與「資本主義世界」作革命的戰爭，當時列寧回答說：這樣，農民不會了解，且不會作戰的。在此後幾年的國內戰爭中，農民看見了外國干涉援助白黨軍隊，而由白黨軍隊來犯的意義則常是把農民已經奪得的土地歸還地主。共產黨人在其宣傳中利用這個事實頗見奏效。不僅能把農民奪取到自己方面來，而且能使他們開始從國際階級鬭爭的意義上來思索；在俄羅斯國

外還有敵人正在幫助剝奪農民的革命戰利品——土地——之企圖。在其他各國的工人運動，據解釋說，會把農民的敵人推翻，並同時會解救工業品的缺乏與提高穀類的價格，其方法即為於擴大這新的經濟制度之基礎，實際上包括幾個工業較發達的國家時，使這種經濟制度有作更有效的生產工作之可能。於是，因農民運動已開始在幾個鄰國具有確定的與甚至革命的形態，農民國際就告成立，使農民更能直接與這些運動及國際的鬭爭發生關係。農民國際並未成為活動的或著名的機關。但是它仍舊存在，並在農民的報紙上與蘇聯一般的報紙上時常提到它。

蘇聯職工會與合作社的領袖，都時常加重說明他們的組織之國際的血統關係與國際的目的，以在其他各國的相當團體中，又或在他們自己的會員中，掀起內部的衝突。蘇聯職工會在英國罷工中的活動可再來敘述，這是示明蘇聯職工會領袖幫助他國一種運動的領導，或甚至是自居領導地位的趨勢的一個時候。蘇聯合作社的領袖曾與國際合作協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的秘書處關於他們在這協會裏的活動問題發生爭論。在這次爭論中，蘇聯合作社的領袖宣告秘書處的觀點為參加該協會的團體，尤其為合作社的羣衆——這些團體的社員，——所不能承認的。這些蘇聯的分社覺得自己是工人與農民的羣衆的機關，應負責實與改正其他各國的羣衆組織的領導之義務。他們時常罵現存的領導機關是為階級敵人的利益而工作的。對於這種特殊機關或團體的義務與作用的解釋，在較活動的或共產黨分子看來，無疑地增加它的重要性。但是一個

蘇聯的機關或團體之在國內負有繁重的日常任務，使其結果對於這特殊團體的國際興趣與活動所給予的時問與精力常加忽視，而且非黨員的社員亦有開始循着這種民族主義的路線去設想的現象。但是在每個機關或團體裏的共產黨領導的功用，則在經常堅持這種機關的活動有具國際形態的必要，視此為其機構與目的之主要的蘇維埃特性。在一般的農民運動與合作運動中，民族主義的傾向有成普遍現象的趨勢。

蘇聯最大的與最著名的自願的公民團體，或者在其目的上具國際的性質，或者是準備防衛蘇聯的「木潑兒」，即援助革命者的國際互濟會，已在前面一章中敘述過了。蘇聯有最多的會員人數，並因此對該會的財政幫助亦為最大；會員加入，即假定他們對世界革命的觀念是尊重的。會員中也有活動分子，此種分子使各國分部的活動常能生氣勃勃，而各國分部則以細胞為組織的單位。代表大會，會員的徵求運動，歡迎各國交換過來的或刑期滿後僑居到蘇聯的革命者之示威遊行，都使該會與該會的目的時常呈示於工人與農民的面前；「不許侵犯中國協會」(Hands-off-China)是另一個自願加入的團體，這是因中國革命的發展而產生的，祇須提到這兩個團體並再參考在前面一章論自願發動的公民組織之一的論述，就足以闡明蘇維埃公民活動之在這一方面用以增強蘇聯公民的國際主義觀之方法的一般情狀；其次，在防衛蘇聯的準備方面，則所謂「航空化學會」，是基本的與最大的自願加入的團體。這簡寫的名稱是從前的「防衛合作社」(Society to Co-operate in Defense)與「航空化學業餘社」(Friends of Aviation and Chemistry)之混合體的代名詞。據稱，這混合的

團體共有會員總數三百萬人。自與英國的外交關係破裂以後，發生了一種自願的團體，稱爲「回答張伯倫」(The Answer to Chamberlain)，進行飛機捐款的工作。

共產黨人與紅軍的領袖藉這兩類自願的公民團體，能夠一方面推廣其革命運動的統一原則，與另一方面一致的軍事準備，共產黨人能允許這些自願的羣衆團體，得採取他們共產黨人所不能表現的民族主義的路線。紅軍的領袖能拒絕一切組織軍事訓練的責任，因這種責任是航空化學會的一部分活動。同時在該會的活動中，商業航空的提倡與化學在工業與農業的發展上或傳染病的防止上之應用，諸如此類，都重視之爲該會在另一方面相重要的活動。藉這種方法，會員得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多量的自願貢獻，而於俄國及世界革命雙方有利。

各學校、研究院、與大學，以及政治教育的特殊機關之學習大綱，已在前面幾章中述其概要。在這些大綱中，「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前途」和「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這兩個題目，雖以稍不相同的名目表示，卻常常是在課程表中佔重要地位，並分配得很多的授課時間。再則，訓練東方各國的與西方各小民族的共產黨員的特種大學亦應在此提及。

在革命的紀念日中，有幾種紀念日是特別具有國際性質的，例如五一節、國際勞動婦女節、與國際青年日。紅軍紀念日則是以國防問題爲中心的主要紀念日。同樣，在各項宣傳運動與徵求運動中，有些每年舉行，其中一方

面有「木潑兒」的徵求日，而另一方面則有國防週。但在一切的紀念與宣傳運動中，世界革命與資本主義干涉蘇聯的問題，都是在印刷品、演說辭，以及全國宣傳的口號中提出；這些紀念與宣傳運動是各方注意力的定期集中點。這些問題在文學的與戲劇的作品、電影片、無線電節目，以及音樂與歌曲之「正確的思想內容」藉以組成的題目單裏，亦佔重要位置，這在論及這些政治教育工具之利用的幾章中已予論述過了。

國外新聞的篇幅比例，不僅在較大的指導的報紙，而且在較小的工農小報，都佔着很大的部分。在為青年與兒童閱讀的報紙中，也有非常多的長篇短論述及國際形勢。蘇維埃政府與其他各國政府外交往來的文中，亦盡量在報紙上披露，因為這時常含有宣傳的成分與宣傳的價值。蘇聯代表在日內瓦軍縮會議的討論中之報告，甚至在為鄉村讀者刊行的小週報裏亦有登載。這種材料的登載時常附以解釋說：祇有在蘇維埃的制度之下，纔能有參加這種會議的代表將所討論的與決議的事項，充分地與自由地報告出來。且通常都說：在蘇聯討論國際關係比在其他以出版自由自誇的國家裏更公開與自由得多。共產國際或職工國際定期的告全世界各國勞動者書，都在大報披露全文，並在小報摘錄概要。特約通訊員與從官方的通訊社——塔斯(Tass)——所發的新聞要目，包羅一切重要的國家。共產黨對於報紙的領導，使確定一致的解釋方針與集中注意力均有可能。一種特殊的口號廣播於全部出版物的迅速，是最堪注意的；而且無論何時，每當政府的外交政策號召表示蘇聯的公衆意見時，這機器馬上可以發動。

「軍事化」一語用得頗自由，並且用於「全國軍事化」一類語句中。但是，共產黨人堅稱：他們軍事訓練的宏大綱領並沒有含蓄軍閥主義的意義，蓋軍閥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蘇維埃的國家式範，尤其是它的軍隊組織之特點，即在針對着擁護共產黨人這種意見。因此，在工農政府之下的紅軍，是羣衆的「血中之血」，完全參加到羣衆的生活中，並因此在羣衆的完全控制之下。民衆軍事化的蘇維埃形式，多方與普通的國防綱領相似。這種宣傳，藉增進組織與紀律的觀念，並藉增強鬪爭的觀念，加強了共產黨人經常指爲他們的訓練要點之各種習慣。這些習慣是在俄國的羣衆間，甚至是在受過教育的各階級中，所特別缺少的，這有種種的原因，此處不能予以討論。在一切蘇維埃的團體中，而尤其在這種軍事化的綱領中，對於紀律的重視，以其目前的經濟狀況與其人民的習慣而論，實含有建設的意義。

軍事準備的綱領所有的負擔與耗費，都放在其他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身上，尤其自在日內瓦的會議中提出完全的或部分的廢除軍備的建議之後。這些建議都在國內解釋爲藉向各國的勞動者證明蘇聯要求和平的誠懇願望以增進蘇聯的安全之一種努力，且亦爲減輕世界勞動者與蘇聯工農對軍備的負擔之一種誠實的企圖。據解釋說，從蘇聯的政策在日內瓦遭受失敗的事實，祇能得到一個結論，這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有其各方的矛盾與對立，繁重的與經常增加的軍備不可避免。因爲蘇聯必須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繼續存在，它就必須作防衛自身的準備。倘若羣衆的軍事準備之遠大的綱領能夠實現，則祇有在這時候可把常備軍減少到

爲安全所允許的最低限度：這是他們所解釋的。爲着這個目的，在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以及在各學校裏組織了軍事準備研究社。在高等的教育機關裏，則有至少限度的軍事科學與軍事訓練的必修課程。共產青年團與兒童先鋒的活動也把軍事訓練包括進去。體育俱樂部一般地與有些地方特別地注意與發展此種訓練，以作將來軍事服役的預備。爲着這軍事化綱領的特殊需要，已編印了大量書籍。

最近革命十週年紀念的慶祝，用以喚起關於軍事準備的宣傳與組織之注意。在莫斯科的慶祝，表示其所達到的發展最高度，這就是領袖們所力行的理想。因爲在遊行中隨着紅軍隊伍之後，還有按區域的民警隊伍，共產黨人與共產青年的武裝隊，工人武裝隊，以及不穿制服而拿着鎗枝的女工，兒童先鋒隊，與志願的看護隊。在一九二七年秋季，這些志願的軍事訓練團體中，有許多實際參加到紅軍的定期檢閱。軍事的檢閱時常在遊行中佔着很大的部分，而包括許多軍事的成分於一切紀念中，此種措施日益成爲慣例。一般人相信，用這種辦法可使紅軍進一步深入羣衆，藉以預防軍閥主義的形成，據他們所說，軍閥主義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分離的。

國際主義與蘇聯防衛的兩個觀念，均藉來自各國的參觀代表團以經常宣示於民衆的面前。除了共產國際與職工國際的正式代表團之外，還有實際上來自世界每一大國之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無數職工會與工人的代表團；有些國家的代表團有來到兩次或三次之多。其他各國的農民代表團之組織尚不多見。此外，各國的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亦整隊而來，東方與西方的學生團體亦有來到蘇聯旅行。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有十月革命十週

紀念的慶祝，全世界各國都有代表團被邀參加，代表人數差不多有一千，形成了一個組織，稱爲「蘇聯之友社」(Friends of Soviet Union)。這些代表團所代表的共有三十國，據稱是「選舉」出來的。過半數的代表是蘇聯職工會的客人，但其整個團體則稱爲「工人、農民、與激進知識分子的代表。」

當較早的時期，來到蘇俄的這種代表團，欲得本國政府的正式批准，往往受到多種困難，因此，這種參觀可更加重地解釋爲「資產階級」政府對蘇聯的仇視與各國勞動者對蘇聯的相當友好之明證。蘇聯到其他各國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團，時常被各國政府機關拒絕在護照上蓋印，有時正當他們預備動身的時候加以拒絕。這種代表大會的本身之幾次反對這樣拒絕蘇聯代表團或甚至祇是拒絕在護照上蓋印的簡單事實的抗議，均成爲對蘇聯特異的國際地位作廣大討論的材料。

參觀代表團時常在蘇聯的報紙上廣爲宣佈。正式的歡迎通常由政府的領袖來表示。人民委員會行政院主席李柯夫(Рыков)，在其對「蘇聯之友社」所發的演說辭中，曾解釋這種歡迎的性質。這不僅是對外國的客人作懇懇的招待，而且要把蘇聯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的成績「提出報告」，因爲「這些成績有國際的關係，而且有關於全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他指出這些外國來的客人應覺得有一種道義上的權利，要求蘇維埃政府代表作這樣的報告。「蘇維埃政府認爲不僅對選舉它的工人與農民必須說明與說明它的政策之正確，而且要對一切爲和平、爲社會主義、與爲廢止人對人與國對國的殘暴行爲而鬭爭的人都作此等說明與證明。」這話引自這

演說的一種報告。有幾個較重要的職工會代表由史太林來接見。與史太林的會見採取回答問題的方式，問題於事前由代表團預先提給他，而史太林的回答則在報紙上廣為披露。例如，他對一九二七年非正式的美國職工會代表團的回答，不僅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而且在「農民報」上發表，用這種方法，共產黨人就藉各國所派的代表團將他們所說的話轉達到各該國的工人。

凡共產黨員與年齡較長的共產青年團員以及加入職工會組織的非黨員的工人，都在理論上是完全的與自覺的國際主義者。這種國際主義態度的表現，可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在莫斯科召集的為蘇維埃體系中最大的唯一有組織團體之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告民衆書。這告民衆書，說到「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與消除各國人民間的界線，」號召「解除階級敵人的武裝，」並以如下普通公式作結語：「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鬭爭中的統一戰線萬歲。」這告民衆書的主要方向，是反對其所稱的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正在製造的新戰爭之準備。這文件繼續解釋說：這些準備必引起進一步剝削勞動者，並因此是特別趨向於反對「工人階級已從資產階級的剝削解放出來的國家。」對於蘇聯的國際形勢之估計有如下的措詞：

任何國家的資產階級對蘇維埃共和國與我國勞動者的壓迫，是與它對其本國工人階級的進攻成有機的聯繫。這因此是同一事情的兩方面。這正因為世界的工人與被壓迫人民都來另眼看待蘇聯，所以這種壓迫日趨嚴重，並企圖對蘇聯作經濟的與財政的封鎖。

這番話是對「全世界的工人」說的，其標題爲「起來防衛蘇聯」這一口號。

這種以蘇聯爲世界勞動者與一切被壓迫人民的祖國之觀念，是共產黨人藉以否認其有帝國主義目的之罪過的根據。他們引述常用的蘇維埃帝國主義或赤色帝國主義的名詞，而堅稱這種名詞毫無正當理由。據稱，根據同樣的事實，蘇聯的軍事準備並不表現是侵略的民族主義；而且幫助他國的革命運動或民族主義運動，也不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

列寧曾指示過兩種對外戰爭是公正的。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可在保護工農利益的觀點上作防衛的戰爭。第二，「在外國帝國主義的苦厄下」之人民可作民族獨立的戰爭。列寧這種有權威的公式，允許共產黨人可對弱小的與被壓迫的人民作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援助，並可對這些人民的民族主義的與革命的運動貢獻意見與加以領導。這種物質的援助、意見，與甚至領導的給予，都在國內解釋爲有助於蘇聯的安全與國際觀念的勝利。

世界革命與蘇聯之革命的防衛，這兩個觀念是彼此有密切關係的。二者都給蘇維埃制度以許多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蘇聯民衆的公民活動興趣藉以得到與他的公民訓練藉以進行的機件與步驟。在這兩個觀念中，都有鬪爭的成分與特殊集團在這鬪爭中的領導之成分，並因此在蘇聯的公民訓練中特別明顯地把刺激的方法作自覺的與有系統的運用。

結論

這本書是研究各國狀況的叢書之一種，其目的是在敘述革命後的俄國，即蘇聯的公民訓練之方法。敘述的方式與其說是技術的與比較的描寫，無寧說是分析與一般的說明。蓋這裏所涉及的是一個革命時期的新設施，而公民訓練則爲這時期中的鬪爭「前線」之一：此種事實使我們有採取一般的描寫方法之必要。但是其他各種制度的實際情形亦時常注意到，並示明其相似點與異點。有幾種研究的共通計劃，亦可應用於蘇維埃的方法，祇要把着重點稍加變更就好了。在新的革命的社會制度中所期望的公民反應，除了有些重要的增加以外，大體上是與在以民族立國的國家裏所激發的無甚差別。在最初幾年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中，情形有些不同，但這是國內戰爭的時期。據解釋說，從現在的新經濟政策將發展出社會主義，而爲達到合作的共產之初步，不過這是未來的事情。但是，蘇維埃制度應保證在公衆事業上之自覺的興趣，參加政治之熱烈的願望，對於「革命的」奉公守法之真正的負責意識，與在公務上之特殊盡義務的意識。

在目前的過渡時期中對公民所期望的各種活動是：選舉、納稅與認購內債，對國防的資助，與對國家法律的遵守。在革命的設施上之特殊的意義是在於選舉，即在於多種的與新的各種選舉。政治上的考慮，決定了賦稅的

政策與流通公債的方法，而立法則務須積極與廣博，以增進與登記革命的變更。較積極的一般的公民興趣，希望其能與革命氣息相關，如紀念會的參加與對文化發展的注意。對勞動與經濟政策的重視，實給蘇維埃制度下之公民義務的觀念以較大的內容。必須對新的社會制度之採用——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有所貢獻。這種特點使在公民活動中具有經常的要義，並對公民訓練給予確定的方針。蘇維埃制度的某些基本原則恰恰就在這裏。在政治活動中必須時常有階級的應付方法，並在經濟方面的活動中必須循着集體主義的方針。公民活動時常以這些附帶條件來激動。最後，經濟的活動亦是必須的；賣不出生產品或做不出工作，可被解釋為怠工，在某種條件之下，怠工就是反革命。

爲要得到這些反應，利用了政治的、經濟的、與民族的利益。在蘇維埃制度中，宗教的利益之存在亦被承認，但有一定的政策以使之減到最低限度並控制之。再則，個人的私人利益祇是有條件地加以考慮，以重視新制度的基礎之集體主義的觀念。階級的——政治的與尤其經濟的——利益是與私人利益相反的；階級的利益是在民族的利益之上，後者之提倡祇是用于利於前者；階級的利益是與宗教的利益針鋒相對的，在經濟上與思想上都是與後者不能相容。

階級的經濟的利益受到最強烈的激動，視爲革命的學說基礎之一部分。政府宣告一種確定的經濟理論，即以社會主義爲走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主要的生產資料之國有，與因此而產生的國家經濟企業網，均給這理論以

作廣大的實際應用。法律以及行政上的措施都具有積極的目標，以循着這理論的路線而引導與策勵經濟的活動，使政府與個人的日常生活得有具體的關係。蘇維埃制度的這種特點——其最著名與特異的特點——對激起興趣的問題，既加上重要，又加上困難。

建設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之觀念，是所用的最通常的刺激物；這實際是代替以民族立國的國家中之愛國主義的觀念，並趨向於使其革命民族化，且使公民活動顯赫光榮。時常加重說明這新制度的與每一特殊機關之無與匹敵的性質。至於「在歷史上初次」施行的政策與方法之在領袖口中的談吐，幾乎成爲下意識的行爲。這制度的新奇，被利用之以提起羣衆的興趣與吸引羣衆的參加。世界上沒有像紅軍那樣的軍隊，沒有像工農政府那樣的政府。

共產主義的正鵠尚未達到，蘇聯祇「在到社會主義的路上」，而社會主義則祇是共產主義最初的階段。現代的人必須在其人生觀上信仰革命的經濟原理，而不能完全享受到一切的利益，此等利益將於新制度建立成功時臻於完美。但工人們經常地聽見人家告訴他們說：蘇聯的工業將於不久後達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不能達到的擴充與生產的速度，而且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的工業「合理化」將不與工人或一般勞動者的利益背道而馳。同樣的，農民亦得到允許將獲得標準的生產品並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最進步的農業社會中空前未觀的優美生活。集體化與電氣化是這裏的要素，並解釋說：祇有蘇維埃制度能保障這些方法的發展將在事實上

利於勞動的農民。

建設新制度的任務之困難用以加強這種刺激。在國內或國外的反對者，其經常所稱的「資本主義包圍」，供作其所欲的活動之具體對象。鬪爭與忍苦的觀念成爲其所用的一切技術之主要的特點。一個正從國內外的多年戰爭之蹂躪恢復過來的而且經濟上與文化上落後的國家之環境，使有提出實際工作，技術訓練，如整理與建設工廠與採用較好的農業方法之類的具體任務，既屬可能，亦屬必要。作技術進步的意義解釋的「美國主義」與革命主義合爲一體，而爲一種思想的態度；並且這兩種成分的正確平衡，是經常注意到的事情。

在其他各國可遇見的所通用的各種工具，例如教育、文學與藝術、愛國的社團，或各種紀念會，均同樣在蘇聯應用，以刺激公民的興趣。蘇維埃制度在這方面的特點，是對每件可能的工具之審慎的運用與對運用這每件工具的方法之深思熟慮。這種工具用在此處，對其基本的宗旨說來，或許奏效較少，但以公民訓練的重要，則認爲注重政治方面是完全正確的。因爲蘇維埃制度的目的是要循着新的路線重新訓練全體人民。共產主義的訓練是要在革命的空氣與在積極運動的條件中進行的；革命的政治是要使之深入一切的機關、團體、與各種活動的場合。煽動與宣傳的方法之採用是毫不遲疑的。凡遇特殊的情形，須採用首要的與更積極的刺激，而對其他問題，則用次要的與較不直接的刺激方法。直接行動的方法是革命的特點，而且革命的環境使人們可藉革命的名義而採取強迫的成分以能夠增強這種刺激。強迫手段的採用，現在漸加限制；據稱，行政的壓力祇限於絕對必需的範

圍內纔可採用，現正注意於立刻消除足以引起反感或誤會之點。但是，社會有用的公民活動之定義，需要採取紀律與報酬的辦法。又造成更特別的「反社會活動」的觀念，對此種活動採取相當的嚴格制裁或甚至壓迫的辦法。在此又引用階級的原則，重視階級的意志與階級特權的享受，而對任何出賣階級利益的行為加以懲罰。

各種工具與方法應用的效果都加以研究與考核，因為相信羣衆既在這革命局面中自己起來行動與作建設的努力，這種革命局面所有的各種條件，使對於人類的品性與對它所施的方法，有作更合於科學的研究的可能。對於公民活動的刺激所起的各種品性上的反應，都是注意到的，雖然在這問題上亦須按一般的習慣而注重階級的原則。成爲蘇維埃方法的特點之對一個問題取坦白的直接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特別表現出來。因爲在這裏各種不同的反應成爲革命過程的組成部分。相信在各種不同的階級裏有程度互異的政治傾向。新興資產階級之無選舉權，就是因爲這個階級特別易於作政治的組織與行動。至於工人與農民，則前者祇是相信其有組織與領導的能力，而後者卻視爲是政治上被動的。

在這些階級的區分中，個人品性的要素是加入共產黨時所注意到並予以承認的。藉此方法，自覺地與審慎地選出革命的活動分子，加以特殊的訓練，並以特殊的組織與方法來刺激，使它成爲建設者與煽動者。在這分等級的尺中之另一極端，則是抱着簡單住民態度的人，這種人是最被輕視而且多少是置之不理的。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承認有各種可能的與所期望的等級。在非黨員的羣衆間有活動分子與被動分子，而對它們所施的刺激亦

因此有所不同。除了須加強迫的被動分子之外，亦還有一種有條件的活動分子。各種集團，或甚至每一集團裏的個人，對於公民的反應，不是完全任其自由行動的。工人必須是活動的，私商人必須是被動的；在鄉區裏，貧農必須是活動的，且富農必須是被動的。農民的羣衆——中農——與勞動的知識分子，都希望他們能接受其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分子之政治領導。且在進行活動的每一階級集團中，有下列的主要分類：黨員，非黨員的活動分子，非黨員的被動分子，與對其階級利益沒有覺悟的簡單住民。

根據這些一般的說明，就可看出蘇聯的公民訓練怎樣利用各種在其擺佈下的技術以進行。蘇聯擁有從前俄羅斯帝國同樣的地理與經濟的統一性，雖然芬蘭的喪失與從前波蘭及波羅的海岸各省的喪失，使其出海面的通衢較不易得與略無保障。對於這擁有歐洲東部的大陸與其地理的引長橫貫亞洲北部之造成政治上統一完整的觀念——許多世紀以來的傳統——已仍舊實現。有一種蘇聯的郵票，以鮮明的紅色標出歐亞兩洲的地圖上這塊廣大與統一的地面。這塊地面的統一，是過去舊俄帝國力量的來源之一，這種地理上的統一，現在要歸功於蘇聯的政治統一。在經濟上各區稍有差異，但不甚明顯。經濟發展的水準，在這廣大地面的全部，以其主要的地帶說來，大體上是很多相同的。

種族的區分是很多的，但以其數目之多，與各小民族（差不多沒有例外）都在過去沒有強烈自覺的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使可不顧這種民族的紛歧而有造成統一的可能。這裏，某些蘇維埃的原則，例如與民族相反的

階級，與藉聯邦的形式以在某種限度內承認的民族原則，使蘇聯較諸採取強迫的俄羅斯化方法之舊俄帝國能得到更鞏固的統一。從前歸併於俄國的最有野心的民族集團，如波蘭人、芬蘭人、立沙尼亞人、與立陶宛人，都已退出去了；這些集團是舊俄帝國統一的最大障礙。足以加強種族區分的文化區別，在各小民族與這統治的民族集團間亦無顯著的現象。烏克蘭人在許多方面與俄羅斯人很接近。喬治亞人雖可稱為另一強烈自覺的民族集團，但他們遠處在該國一條山脈之外的一隅。

一切民族的集團，尤其是統治的俄羅斯民族集團，一向都有移民遍居這塊廣漠的與一式的平原。在西比利亞可遇到俄羅斯的工人或農民與在伏爾加（Volga）或在烏克蘭所看到的很相同，他們都與其他種族雜居一處，這些種族或許是原來的居民，或甚至是佔統治地位的地方集團。在蘇維埃制度之下，這種移民的趨勢仍在繼續。民族歧視最厲害的各區域大部分都在這平原的邊疆。高加索與克里米亞，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一方面是石油與其他礦產的富源所在地，與這經濟單位的勞動市場，而同時又是工人得在山區平原享受大陸氣候的療養所與休息及養身的地方之所在地。這些地方因種族不同而起的強烈衝突存在一天，則這種衝突是具有經濟形態的，是工業製造的利益與農業的利益間之衝突。各小民族主要的是從事於農業，而工業的發展則極大部分集中於俄羅斯的各大都市。工業化的計劃，為政治的與經濟的目的，要改正這方面的均衡關係。蘇維埃制度之政治統一的基礎，是工人與農民兩階級的聯盟。促進這兩個經濟集團的聯盟，是一切蘇維埃機關的共同目標，希望這

方面的成功可以解決種族歧視的問題，這方面能否成功，認為是蘇維埃主義的一種測驗。上面所說的移民，現在是按鄉村與城市間及區域與區域間進行，而且這種辦法有助於蘇維埃主義的發展，成爲工人與農民間政治統一的連鎖。

鄉土的留戀與愛好，卻沒有加以忽視，且利用之以作公民訓練的技術。蘇聯各民族集團的文化特點予以重視，而地方的區域研究則由自願的社團與學校加以提倡。但是這些政策並非希望提倡地方的民族主義。對於民族集團的文化成績之重視，加上對在蘇聯的政治制度之下民衆有文化自主的機會之更大的重視。對地方的天然形勢與文化狀況所感的興趣與引以自豪的心理，都指導之使其趨於共負全蘇聯的共同任務以建設新的社會制度之觀念。

土地與人口的喪失與未收回的問題，在蘇維埃主義之下採取雙重的形式。如以民族立國的國家所了解的同樣觀點說來，蘇聯祇有兩個土地未收回的問題。波蘭的東部國境分裂去了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的分子；而卑沙拉比亞（Bessarabia）的「竊案」則解釋爲對於莫爾達維亞蘇維埃共和國（Moldavian Soviet Republic）之不公平的事情，該共和國是蘇聯的一個單位。這小小的共和國建立起來以使所稱的不公正事情顯然露出。對於因革命而旅居外國的許多僑民，有一種願望欲使某種階級的分分子——工人與農民——能夠回來。其他各集團不需要回來，因爲有階級的或政治的關係。外國僑民的存在用以保障國內按階級與黨的基礎以求統

一與守法。至於未收回問題所包含的另一意義，則是蘇維埃主義之國際姿態而產生的。世界上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都認爲是蘇維埃主義的公民，須使之漸漸了解這種主義的原則。這種任務的意識用以促進對蘇維埃主義的原則之更大的信仰，並以保障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對這些原則之在蘇聯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中厲行的領導。

舊俄帝國是「神聖的正統教的俄羅斯」；而其政治統一的基礎之一是國家的教堂，即大多數人民的教堂。在舊統治之下對於宗教與教堂的政策，趨向於使其自己不能成爲造成統一的要素。教堂在俄國的傳統作用之一缺點，曾用政教完全分離與拒絕教堂參預教育的政策使之消除。信教自由爲新制度所許可，並在這個基礎上得作宗教的宣傳。與種族紛歧相當的宗教紛歧，現在使之盡可能地減少；而且這種政策以嚴格限制教堂或宗教團體或會社之活動而得具體的形式。但是，這祇是問題的一面。教堂與新制度間的衝突是革命的原則之一，並且這種衝突採取直接行動方法的形式。宗教是根據思想上的理由而受責備的，且教堂被宣佈爲剝削人民的一種武器。這些都是領導方面所宣示的觀點，對於政府的政策頗有影響。教堂被承認爲是競爭者，或用更直接的革命術語說，是「敵人」；並且宗教信仰之受攻擊，即根據於階級的利益而來的。同時，加重宣傳與提倡革命的信心，其所採的方法時常使旁觀者覺得是宗教運動的態度與方法。

對於各種經濟集團，蘇維埃制度所根據的階級原則，使一般地激發公民興趣問題與保證擁護新的政治傳

統問題得大大地簡單化了。現在已不須要均衡營業與勞動，或均衡地主與農民。地主的集團已被取消了，雖然所謂「富農」提示這集團尙有小規模出現。在商業與工業上的新資產階級與甚至這種富農都在被容忍與被利用之列，但不希望他們歡喜新制度。祇有工人與農民的利益是被照顧到的，而且在這兩者之間以工人的利益佔優勢。農民中的經濟分化是顧慮到的，而且半無產階級分子——貧農——成爲特別關懷的對象。各機關的職員與薪金勞動者組成第三集團，其利益亦是按照照顧到的；在這裏，例如在技術專家的小集團裏，有根據階級的分化，如一部分是資產階級出身的與另一部分是工農出身的。後者希望能保持其各自階級的態度。資產階級的技术專家，不論他從事於那一部門的工作，希望能以新制度所保障的建設工作之較廣闊的機會爲其職業興趣之所在。他的忠實，雖承認隨其生長與訓練的環境力量而轉移，卻是特別加以探求的，但欲保證其忠實，覺得對於某些經理或工程師的集團金錢上的報酬方法較爲便利，至若經常記在心目的則爲「奪取」中農，中農是代表農民階級而非工人階級。列寧於一九二一年以問話的形式對這問題下了定義說：誰能滿足農民，是站在獨裁地位與控制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部分之無產階級呢，還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發展的新的資產階級？

政策界的連續性祇是暫時被十月革命打斷。君主政體的傳統已於一代來迅速失了依據，並因最後君主的性格與政策而瓦解。舊的政府機構已在二月革命之下毀滅了，並且軍事的傳統已因戰爭的最後一年之失敗與因此而起的頹喪心理及革命最初幾個月的影響而削弱。十月革命即對準這些傳統來攻擊，並且負起積極打擊

其殘餘的任務，因這些傳統的性質與其具有建立一套新的傳統之技術，此種打擊實爲必要。這裏政府服務的問題認爲非常重要，且自始卽有自覺的企圖欲使政府服務具有新的性質，並建立一種能使新制度的原則日有進步的傳統。

相信有一種新的政府機關是在發展的過程中。現在所有的是「蘇維埃工作人員」不是「官吏」且在軍隊中以「公民戰鬥員」來代替「軍官與兵士」。工農民警就是普通的警察，而特種政治警察則爲「無產階級的露鋒寶劍」。一種工農檢察團把一切政府的事務都置於羣衆的控制之下，這種工作要革除官僚主義的精神與傾向。再則，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政府的事務多而且繁，其組織的方法是要使人人易於參加，並定期改組，使同時可作爲治國的學校。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祇須假以時日，國家是要「自歸消滅」的。在內政與軍事機關招收服役人員時，階級的原則便要應用到，以符合於各該機關的正式名稱。按階級的選擇法輔以特種統制制度，這是一個單獨的政黨之合法的專利權來實行的。這種情狀特別希望能在政府的服務中創立新的傳統，使這種服務具有新的蘇維埃德模克拉西的特點，並作爲激發工人與農民的政治興趣之一種技術。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政策使有設立繁雜的行政機關之必要；但藉各種自願發動的經濟團體，例如職工會與合作社的作用，相信能做到與發展有效的羣衆控制。用這種方法以抨擊從前對「政府」態度的舊習慣。馬克斯主義的國家理論有時以通俗的辭句述其概要，說明強迫的成分祇是到合作的平民政治之過渡時期的暫時的惡現象。

共產黨的獨特地位影響到蘇維埃制度的一切姿態；例如在政府的服務中，這種被選擇出來的集團中之成員享有特權的地位，並負起特殊的責任。這種黨在其自己的結構上也是奇特的，而且「黨」這個名詞用以稱呼這種團體，亦祇是以其變更了的意義來了解。加入這個黨是受種種形式與積極的限制所束縛，而且黨員須服從一種鐵的紀律，這種紀律現已有效地厲行。黨的定義可說是：有特殊訓練以在革命的特殊條件中作一種特殊的領導之特殊集團的組織；它在技術上是執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些特點造成了黨員對這種黨與該黨對之負完全領導責任的政治制度有高度的服從。在非黨員羣衆方面接受這種領導，宣稱是這新的政治制度之不可分離的成分。希望黨與一切羣衆團體的聯繫及這種領導的方法能使這種接受具有積極服從的性質。

一切種類的選舉是時常舉行並對一切集團舉行的，且藉這些選舉以使黨的領導能生效力而同時能適應於非黨員羣衆的利益。除了蘇維埃的選舉以外，還有工廠委員會與職工會的地方委員會的改選，以及合作社的地方辦事處與中央辦事處的改選。婦女則有她們自己的選舉與其代表會議的選舉。自願的公民團體正式的選舉較少。共產黨的黨員則有黨的選舉；而且黨的訓練學校即輔助黨的領導的共產青年團，也有定期的與正式的選舉。選舉是在選舉者的全體大會中舉行，其方法則爲舉手或歡呼。相信這種選舉的方法能引起更積極的與自覺的興趣；這種方法認爲是政治上有用的，而且不僅是便利的，蓋藉此可以公開的與直接的發表意見。被選者對

選舉區的全體選民作報告，亦藉這種選舉方法得以激勵與易於實行。代表是按職業選出，並且選舉是間接的；並相信蘇維埃制度的這些選舉的特點，能使選舉的行爲更自覺與有理性。選舉次數的數數與種類的繁多，希望能給非黨員的羣衆有與一個團體發生關係的意識，並可作爲於大多數選民對黨有確定好感的體系裏造成黨的尊嚴之技術的代替物。在蘇維埃體系裏祇有一個黨是否可能的問題，認爲是已經解決而成爲原則了的；祇有蘇維埃制度的本身將來會引起多黨制之這一問題應否提出，現在成爲爭論的問題。

職工會、合作社、與會員普及與自願的一套公民的或愛國的團體，都是蘇維埃制度設備起來以爲非黨員的工人、農民、或蘇維埃的工作人員表示經濟的與別的更普及的利益之捷徑。職工會已把絕對大多數的工資獲得者包羅進去，而合作運動亦已與很多的個別農戶及工資獲得者建立關係。該國的經濟政策與活動，由職工會與合作社促進之，並且據說控制之，蓋這兩個團體與政府的團體有特殊的與權威的關係。職工會稱爲「共產主義的學校」，而合作社則認爲是到社會主義的初階；這兩團體的經濟任務又輔以文化教育的工作。這種工作使它們的活動之政治姿態更爲確定。這兩者都稱爲「新制度的堡壘」。

學校與一切等級的教育機關之用於公民訓練，是特別加以沉思熟慮與有系統的。一切的教育都置於國家的控制與共產黨的指導之下。共產主義的訓練是一切教育共有的一部分；統一的學習大綱與教學法的集中監督與詳細規定，都是要助成這個目的之實現。學校是受最廣義的「政治化」了，要把革命的傳統授給後進的青年，

使革命承續，並訓練人民以有效地擁護革命的原則。普通的學校制度輔以政治教育與共產主義訓練的特種機關與組織；兒童先鋒運動與共產青年團對於學校與在學校內部都負有特殊的任務。又有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灌輸，視此種主義爲分析社會現象之唯一的科學方法。一切學校的課程表裏所定的蘇維埃公民科鐘點之多，使學校的體系成爲蘇聯公民訓練的基本單位之一。特種的「政治常識」學校，在工人俱樂部與鄉村讀書室裏的政治常識研究社，婦女的特種代表會議，在紅軍裏的政治研究，成年人的學校，與兒童學園，補充了普通的學校體系。

語言已利用爲在幾種饒有趣味的事情上激起反應的技術。政治界的統一觀念，已由俄語爲舊統治的官話性質，早在一切集團中通行以補充本地土語的事實，予以促進。在邏輯上，俄語亦已成爲蘇聯的正式語言；這種語言有時稱爲「革命的語言」。同時，每種小民族語言在本地應用，亦在積極提倡中。因此，藉廣大的與正式的採用地方土語，一般文化的與政治的覺悟得以發展。這些對於在蘇聯裏每種民族文化的傾向之讓步，希望使以階級爲基礎而不以種族利益爲基礎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統一能夠更加鞏固。文學與藝術，劇場與音樂，以及電影與無線電，都是在蘇維埃體制下所用的技術中之最主要的幾種。對於革命前在這些領域的作品與成績所感的興趣，都集中在它們的技術方法上；而在內容方面，祇是表示舊制度的缺點或工人與農民的革命傳統的纔予採用。凡所承認之舊制度的優點，現在都爲新制度所利用；而且這些自己表現的與文化成績的捷徑，都爲握得政權的新階

級所利用，以表現他們的階級意識與鬭爭的觀念。同樣的，科學亦爲他們所「征服」，以爲羣衆謀利益。對於這些領域的興趣，例如對於文學與科學的興趣，均以新制度保障更廣遠的與更自由的活動之權利來刺激。一切循着這些自由表現的路線之活動，都導之走向特定的方針，以反映新的生活狀況與加強國家政治的與經濟的政策。

定期刊物是發生政治影響的最有力工具之一，現已完全按照新的路線加以改組。蘇聯的刊物是官方出版的，所謂官方出版的意義即指一切報紙或定期刊物都是政府與黨的機關報，或是一種確定的團體，如職工會或合作社之類的機關報。這種刊物都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以服務於各階級或各特殊的集團——工人或農民，一般的職工會會員，或學校教師。政府與黨的機關報有特殊的任務，爲其他一切刊物的指導機關。因有各種新奇的組織，如非職業的卻是定期寫稿的通訊員，尤其在工人與農民中間，與在一切重要機關裏非正式的壁報。蘇維埃的刊物極其充分地利用於激起所希望的反應與激發維護新制度的興趣。

象徵主義在蘇維埃制度之下亦不免成爲一種技術。在廣予採用的革命的象徵主義中，有各種新觀念的表現，時常與各種舊觀念針鋒相對。代表專制政體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雙鷹，現在由斧頭與鐮刀來代替。紅旗是革命鬭爭的標記，而紅星則指示革命目的所在的地球上的五個大陸。在錢幣與郵票上，從前沙皇的肖像代以列寧及其他領袖（包括一個著名的科學家）的肖像，以及新的統治階級——工人與農民——各種姿態的圖形，或手持勞動的工具，或身穿紅軍兵士的制服。革命的口號都散佈在這些標記上。新的雕像與紀念碑，甚至新房子的

建築藝術，都象徵各種新觀念。在紀念會與羣衆示威中的儀式，都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並盡量利用這些機會加上裝飾的成分，以象徵這新制度的各種觀念。對於兒童，並以某種程度對於青年，各種儀式佈置起來以激動情感。但是現在所重視的是對於各種儀式與象徵之作合理化的與實事求是的應用，因為這樣能使這政治制度對農民的日常切身利益作更有效的密切聯繫。時常有一種宣傳，藉階級的意識與階級的應付方法以激起「建設努力的興奮精神」。

關於國際的態度，階級的原則決定了須激起何種興趣與要引起何種反應。對於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勞動者的尊重與對一切資本家與剝削者的相當的仇恨，就是這種國際態度的要點。這就是和平的政策，而同時又是防禦的準備政策；這是一種不侵略的政策，或按階級觀點的侵略政策。假借世界革命與國防兩者的名義，時常激動民意，以維護「勞工國」的外交政策。一切可以利用的技術之用於發展工農的國際態度，特別明晰地表示蘇聯公民訓練方法之深思遠慮與完備無缺的性質，且亦足以表示共產主義者的蘇維埃公民觀念的內容。

現在已進展到十年以上了的俄國革命，有它的所謂「文化戰線」，且在這方面的目的是要重新訓練全體的人民衆。在這第十一年頭中，政治的空氣仍是一種積極的鬭爭空氣——在共產黨領袖的主義之下的階級鬭爭的空氣。例如在鄉村區域，在農民內部各集團間的衝突，已經更加尖銳起來，這是有意地把它發展起來而當作一種政策看待的。因他們相信重新訓練民衆的任務，需要佈置一種積極的政治運動。階級鬭爭的原則，在經濟的活動

與發展的國家計劃中是到處離不了的，這是蘇維埃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因此，政治要素的影響加重說明是蘇維埃主義的原則。這樣對於政治的重視，給蘇聯公民活動的觀念以更大的內容，並給公民訓練的任務以更大的重要性。

革命的成績與共產黨領袖組織羣衆的政治活動與廣大的公民訓練所採用的各種方法的成績之一，就是農民與工人，尤其是青年的「積極性」有顯然的增進。所深思的「文化革命」策勵一切可能的施影響的方法之應用，以依照新思想而促進羣衆的活動。一切可能的技術之最充分的利用，是集中於一個特殊的集團——蘇維埃體制中獨一的黨之少數的被選的黨員。對於青年及兒童的公民訓練，還有各種特殊的組織。蘇維埃的政府形式，希望能夠促進一切種族集團的羣衆的政治興趣與政治活動，同時予以經常的與實際的訓練以造成有用的公民。定期刊物是官方出版的，其目的在於加強黨的政治領導，並以實際的政治訓練羣衆。職工會、合作社、與各種愛國的團體，都在政治教育方面負得特殊的任務。各種陳列館，藉參觀制度的廣大發展，以有組織的方法利用之以作公民訓練。革命的紀念日與宣傳運動，都在新制度的生活中佔有特殊地位。在各學校與大學裏，蘇維埃的公民學科視爲重要的功課，並給以一定的內容以把革命的原則灌輸於後進青年的頭腦中。「政治常識」的特別學校與在紅軍中的政治研究，補充與重視各特殊集團的公民訓練。文學、藝術、與劇場，與尤其是無線電、電影、與音樂，都有計劃地利用之以激起公民的反應與使公民的興趣易於表現。在一切這種激發公民興趣的刺激中，以

莫斯科爲中心的國際運動之促進與蘇聯之防衛，這兩個觀念是時常離不了的。

過了革命的英勇時期之最初幾年，較平凡的經濟改造任務已提到首要的位置，因此政治上的注重已有些減輕了。但是，非政治的態度是時常受抨擊的；做蘇維埃的公民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革命與其所產生的蘇維埃制度，在其公民訓練的設備上，可說是在這方面之大規模的與澈底的實驗。在階級鬭爭的學說之下，團體行動的態度顯然是受提倡的，並充分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技術以確定與促進這些團體行動的態度。握住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以在羣衆的日常生活中給「工農政府」這個正式名稱以實際的意義，並以指示這勞工國之特別的與新奇的特點。因爲革命時期的後進青年走入積極的生活，要確定該國所採用的各種方法之實效如何，與尤其蘇維埃制度在政治教育方面所施的熟籌的與經常擬訂的計劃之實效如何，將有可能。

參考書目

最重要的定期出版物，尤其與本書有關的報紙，均在這裏列出。有些報紙與定期刊物是作者數年來長期閱讀而毫無間斷的，而其他一些報紙雜誌則僅閱過少數的幾期，祇作樣本來研究。這裏所列的書籍，被利用的程度亦多不相同；所以幾種最通行的教科書，雖未曾對之作詳細的分析，但亦列在這書目裏面。一本書或一種定期刊物的小標題，沒有把它們按字面一一譯出，而祇將其大意譯在大標題裏面，以示明這種出版物的性質而已。有些書名是代表小冊性質在工農中間廣為流通的小本子。俄文書的出版，並不把出版者的名字指明；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出版事業的集中，使這種指明無論在出版物的來源與在訂購的關係上看來都沒有必要。這本書差不多完全根據俄文的材料。但有幾種被選的英文目錄亦附在這裏；選擇的根據是在可供拙著所欲研究的革命的特殊姿態作參考。

總論

Krisman, L. Goroi'cheskii Period Velikoi' Rusakoi' Revolutsii (俄國大革命的英勇時期)

1925.

Narodnoe Prosvetshenie v R. S. F. S. R. k 1925-26 Uchebnomu Godu (一九二五——二六

教育年度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教育) 教育人民委員會出版, 1926.

Sovetskaja Kultura (蘇維埃的文化) 伊士維太報館出版, 1926.

Voprosy Kultury pri Diktature Proletariata, Sbornik (在無產階級獨裁下的文化問題, 文集) 1925.

定期刊物

Bolshevik (布爾塞維克,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經濟雜誌) 週刊。

Izvestia (伊士維太,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工、農及紅軍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聞報) 日報。

Katalog Agitacionno-Propagandistskoj Literatury (鼓動·宣傳圖書目錄, 國家出版部的營業處出版) 版。

Kommunisticheskaja Revoliutsiia (共產主義革命,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鼓動宣傳部機關報) 月刊。

- Komsomolskaia Pravda (共產青年真理報, 共產青年中央委員會與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 日報。
- Krestianskaia Gazeta (農民報, 出版者: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週報。
- Krasnoe Studentcheskoe (赤色學生, 無產階級學生會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月刊。
- Na Putakh k Novoiu Shkole (到新式學校的途徑, 人民教育委員會國家科學參事會科學教授法組機關報) 月刊。
- Nasha Gazeta (我們的報紙, 職工會的全聯邦中央蘇維埃機關報) 日報。
- Pechat i Revoliutsiia (出版物與革命, 文學、藝術、評論, 與介紹新書的雜誌) 月刊。
- Pionerskaia Pravda (兒童先鋒真理報, 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出版) 週報。
- Pravda (真理報,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 日報。
- Proletarskii Sud (無產階級法庭, 莫斯科省政府法庭的機關報) 半月刊。
- Rabochaiia Gazeta (工人報,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紙) 日報。
- Selkor (鄉村通訊, 附屬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農民報館出版) 半月刊。
- Sputnik Agitatora (鼓動員指導書, 黨的中央委員會鼓動宣傳部的機關報) 半月刊。
- Uchitel'skaia Gazeta (教師新聞報, 蘇聯教育工作者人員聯合會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 週刊。

共產黨

Agitatsiia i Propaganda v Derevne (在鄉間的鼓動與宣傳；黨與青年團的鄉村細胞用的指導書，中央委員會出版) 1925.

Iaroslavskii, Em. Istoria V. K. P. (b) (蘇聯共產黨史) 1926.

Iaroslavskii, Em. (文集的編者) Kakim Dolzhen Byt Kommunist: Staraiia i Novaiia Moral'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舊的與新的道德) 1925.

Kaganovich, L. M. Kak Postroeva R. K. P. (b) (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的建設；黨員叢書中的一本小冊) 1926.

Kalendar Kommunistov na 1926 (一九二六年共產黨員的曆書)

Khataevich, M. M. Partnagruzka v Proizvodstvennykh Iacheikakh (在生產細胞黨員的工作負擔) 1925.

Lenin, V. I.: Organizatsionnye Osnovy Partii (黨的組織基礎；從黨員的列寧叢書中選出) 1926.

Mitrofanov, A. Kh.: Vydvizhenie Rabochikh i Krestsian (工人與農民的進步；從黨的地方監察

委員會的材料中選出) 1926.

Molotov, V.: Politika Partii v Derevne (黨在鄉間的政策) 1926.

Nevskii V.: Istoriia R. K. P. (b), Kratkii Ocherk (俄國共產黨簡史) 1926.

Partiia v Tsifrovom Osveshchenii (在數目字上所示的黨黨員的統計材料) 1925, 1926 (第二版)

Spravocchnik Partinogo Rabotnika (黨的工作人員指導書) 第三版, 1926.

Stalin, I.: Voprosy Leninizma (列寧主義問題) 1926.

Subbotin, A. A.: Kak Rabotnet Tsentralnaia Kontrolnaia Kommissiia i Rabochie-Krestianskaja Inspetsiia (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察團怎樣工作; 黨的第十四屆大會叢書中的小冊) 1926.

Svetlov, F. 與 Berdnikov, A.: Otko Dolzhen Znat Kazhdyi Rabochii Vstupaiushchii v Kommunisticheskuiu Partiinu (工人入黨須知) 1924.

Ustav V. K. P. (b)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黨章) 1926.

Volosevich, V.: Samma Kratkaiia Istoriia V. K. P. (b) (蘇聯共產黨最簡史, 第一二版) 1926.

共產青年團與共產主義的兒童先鋒

Bukharin, N. I.: Uchitelstvo i Komsomol (教師與共產青年, 在全聯邦教師代表大會中的報告) 1925.

Chaplin, N.: Leninki' Put Komsomola (共產青年的列寧道路) 1925.

Gesseu, Vladimir.: Komsomol i Iunye Pionery (共產青年與兒童先鋒) 1926.

Kastalskii, V.: Komsomolskii Ustav (共產青年團章程) 1926.

Komsomolskii Byt (共產青年的生活) 有 Iaroslavskii 序言的文集) 1926.

Komsomolskii Pesennik (共產青年團的唱歌集) 1926.

Komsomolstam o VII Sezde V. L. K. S. M. (爲全聯邦列寧的共產青年團第七屆代表大會告共產青年) 1926.

Krupskaja, N.: Vospitanie Molodezhi v Leninsko n Dukhe (列寧精神的青年訓練) 1925.

Nashi Sezdy (我們的各屆代表大會) 共產青年團各屆大會的決議彙編) 1925.

Politicheskoe Vospitanie Komsomola (共產青年的政治教育) 1925.

- VII Sezd V. L. K. S. M. (共產青年團第七屆代表大會) 1926.
- Shokhin, Andrei.: Komsomoli Shkola (共產青年團與學校) 1926.
- Sputnik Innogo Pionera (兒童先鋒指導書) 1926.
- Vitin, V. 與 Slepkov, A.: Azбука Komsomolisa (共產青年初階) 1926.
- Volkov, A.: Sputnik Vozhatogo (兒童先鋒領袖的指導書選文集) 1926.
- Zalkind, A. B.: Pionerskoe Detskoe Dvizhenie (兒童先鋒的兒童運動) 1924.
- Zalkind, A. B.: Revoliutria i Molodezh (革命與青年) 1924.
- Zorin, V.: Sputnik Pionera (兒童先鋒指南) 1926.

贈
閱

84. 10. 13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34182)

公民教育叢書 蘇聯公民教育一冊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amuel Northrup Harper

譯述者 馬曹王 復建

主編者 王雲 王雲 王雲

發行人 王雲 王雲 王雲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上海各埠 上海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五六三上

鎮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



國史館藏書



0106246